

看见过去 知道未来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少林少林!

【当我们谈论少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如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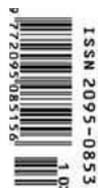
【魔鬼的大炮：美苏冷战中的疯狂兵器】

【香港抗日保卫战：74年前的战争遗迹】

【吉田茂：日本的丘吉尔】

【近代西药入华史】

10
2015/OCT



ISSN 2095-0853
定RMB 20元
价HK\$ 30元
邮发代号：62-313

请问，您有什么要当的？

文 | 浦顿

家名叫“成都华茂典当商行”的新型——当铺，于1987年10月13日，在成都都市西御街悄然成立。这个典当行属集体所有，面向个人或小型企业开展业务，规模并不大，但在当时，却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消失了30多年的当铺，终于回来了。在历史上，当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汉代时，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司马相如就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成都集市上阳昌家里去赎酒，有了钱以后再回去把它赎回来，这可能就是当铺的萌芽。经济史家认为，至少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规范经营的当铺。

中国古代的当铺，以“蝠鼠吊金钱”为符号，蝠与“福”谐音，而金钱象征利润。当铺的柜台高于借款者，故后者需要举起抵押品，故接待员称为“朝奉”。在大门与柜台间有一木板称为“遮羞板”，另外有“票台”和“折货床”以进行交接手续。当铺为多层楼房，用以储存抵押品，而又因为典当业属高风险行业，当铺建筑亦有其特别的要求。

2014年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中，文学青年萧军缺钱了，还去当了一件棉袄。1919年后出现的新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在写贫困的生活时，当铺是必不可少的空间。他们去当铺当掉的，往往是衣物，这几乎是人所能拥有的最低限度的“财物”了。在夏天当掉皮袄，换点钱买吃的；到冬天，再想办法把皮袄赎回来。小时候读这些故事，我往往有一个疑问：这衣物最后赎回没有呢？但是，很多故事都是残缺的，并没有写到冬天。这种缺失造成人们对当铺的片面理解，要知道，当铺的核心其实就是

信用，这是任何金融行为得以产生的基础。

去当铺当财物的人，往往是走投无路，或者是债务压身，最终，当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这样固化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当铺成为一种“阶级压迫”的象征。它是冷漠的、凄凉的，那高高的柜台，仿佛就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革命，就是要拆除这些屏障。因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铺就作为旧社会阶级压迫的象征而被取缔了。

事实上，当铺不仅收穷人的东西，它也收富人的东西。今年股市火爆，在成都，有一些市民到典当行当了自己的汽车或者房产，从而获得一笔进入股市的资金。典当行，不止是饥饿时最后的选择，也是人们从好生活到更好生活的选择。作为一种金融服务，它是银行的有益补充。

典当行的重生，是一个很好的关于时代的隐喻。经济行为有其客观规律，我们不应该只从道德层面来看待，也应该从法律和效率的角度来认识。如今，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出典当行，不用再担心“上当”了，也不用为此感到羞愧。①

信用，这是任何金融行为得以产生的基础。

去当铺当财物的人，往往是走投无路，或者是债务压身，最终，当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这样固化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当铺成为一种“阶级压迫”的象征。它是冷漠的、凄凉的，那高高的柜台，仿佛就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革命，就是要拆除这些屏障。因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铺就作为旧社会阶级压迫的象征而被取缔了。

事实上，当铺不仅收穷人的东西，它也收富人的东西。今年股市火爆，在成都，有一些市民到典当行当了自己的汽车或者房产，从而获得一笔进入股市的资金。典当行，不止是饥饿时最后的选择，也是人们从好生活到更好生活的选择。作为一种金融服务，它是银行的有益补充。

典当行的重生，是一个很好的关于时代的隐喻。经济行为有其客观规律，我们不应该只从道德层面来看待，也应该从法律和效率的角度来认识。如今，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出典当行，不用再担心“上当”了，也不用为此感到羞愧。①

Tips

成都华茂典当商行在1987年10月13日成立，同年12月正式挂牌营业，成为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典当行。1988年，辽宁、山西、广州、上海等地均陆续出现了典当行，而北京第一家典当行“金宝典当行”到1992年底也开始试营业。

叶圣陶、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

文 | 梁晓菲

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颁布注重——**▲**道德教育的教育方针，叶圣陶、丰子恺等肩负编撰小学国语课本的重任。1915年，叶圣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小学国语课本。5年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共出版12套新式国语课本。

1926年，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开办开明书店。1928年，由丰子恺等人发起，次年开明书店改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叶圣陶、丰子恺等担任书店的编辑，出版有关文学、艺术、史地、科技的刊物以及教科书和工具书。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规定，国语教学的目标之一是“欣赏相当的儿童文学，以扩充想象，启发思想，涵养感情，并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教材的选择要“使儿童由兴感而欣赏，由理解而记忆”，“合于儿童学习心理，便于教学”。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国语）》规定，国语教学的目标之一是“指导儿童学习平易的语体文，并欣赏儿童文学，以培养其阅读的能力和兴趣”，教材的编选要“依据增长儿童阅读趣味的原则，尽量使教材富有艺术兴趣”，“依据儿童心理，尽量使教材切于儿童生活”。

在这样的课程标准的指导下，1932年，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画，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以儿童生活为中心的《开明国语课本》，作为初等小学国语课本，共8册。1934年，叶圣陶、丰子恺完成了高等小学国语课本的编写，共4册。这12册小学国语课本，共400多篇课文，约一半是创作，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开明书店的总店和印刷厂毁于战火，很多书籍被迫停印，包括《开明国语课本》在内的所有小学教科书。上海沦陷后，张元济等人成立合众图书馆保存抗战中流散的书籍。后来，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开明国语课本》成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书籍。而开明书店，1941年在桂林设总办事处，后来迁至重庆，1946年迁回上海。自初版至1949年，《开明国语课本》共印行40余版次。

《开明国语课本》的课文内容以儿童的口吻，叙说儿童身边的生活小事。例如：“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柳条长。桃花开。蝴蝶都飞来。菜花黄。菜花香。蝴蝶飞过墙。飞，飞，飞，看不见，蝴蝶飞上天。”“泉水到了河里，许多朋友欢迎他。太阳光拍拍他的背。小鱼和他游戏。白鹅到河里看他。岸上的麦叶和豆花都对他点头。泉水说：‘这里好朋友很多，我在这里住一下吧。’”此外，还有寓言故事、笑话趣闻、历史传说和儿童歌谣等，课文的编写取材丰富，涉及众多方面。

《开明国语课本》出版后，虽然有少数人士非议其语言过于直白，但因其内容紧密联系儿童的生活，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且插图精美，能够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该课本在当时受到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赞誉。

晚清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优秀的国语课本，如《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课本》等，这些老课本对于现今的语文课堂教学乃至教材编写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①

01

《邪恶的战争》

(英)《今日历史》2015年9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曾经一厢情愿地认为伊斯兰军队是他们战争中的盟友，然而，伊斯兰世界显然并不情愿被其所左右。

1942年12月19日，这天是古尔邦节，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此前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已被迫从突尼斯撤离。在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纳粹德国的大将、希特勒亲自指派的北非战场的第五装甲集团的最高指挥官冯·阿尼姆准备去拜访突尼斯名义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七世·蒙西夫。在这场对话中，冯·阿尼姆表示德国民众都十分尊重伊斯兰教，并承诺将尽其所能使战争远离突尼斯，希望得到突尼斯穆斯林的支持。

然而，在一年之后的突尼斯战役中，纳粹德国全线落败，最终被赶出了突尼斯，突尼斯的领导者 and 人民选择站在了法国殖民当局那一方，支持了同盟国的军事行动。

03

《发明了医疗设备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

(美)《史密森学会会刊》2015年9月

查尔斯·林德伯格是备受尊敬的航空英雄，曾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他不仅是首位驾驶单引擎飞机跨越大西洋，从纽约飞到巴黎，期间并无着陆的飞行员，还发明了医学上使用的玻璃灌注泵。

林德伯格总是尝试自己修理飞机，后来他又将自己在机械方面的天赋运用到了医学上。他的嫂子伊丽莎白因罹患心脏疾病而饱受煎熬。为了救治嫂子，他与法国外科医生里克西·卡莱尔合作，终于在1935年发明了一种由耐热玻璃制成的灌注泵，能够将空气和维持生命必须的液体灌注到人体器官，使其能保持正常的器官机能且不会发生二次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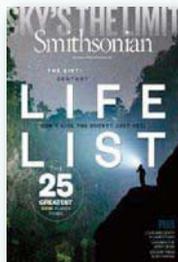
虽然，最后林德伯格仍然未能挽回嫂子的生命，而他们发明的这种设备很快就被新的医疗手段所取代，但他们的创新意识，无疑是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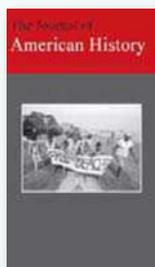
01.



02.



03.



04.

02

《罗马帝国的金宫》

(美)《考古学》2015年09/10月

古罗马皇帝尼禄(54年—68年在位)建造的“金宫”恐怕是史上最奢侈的工程之一。这座宫殿从帕拉提诺山绵延至埃斯奎利诺山，尼禄称其为“金宫”。“金宫”建了好几年，其中最漂亮的大厅建在奥庇耶维丘岗上。宫殿大厅的内部装潢富丽堂皇得超乎想象。所有房屋的墙都镶有不同种类的大理石，大理石表面镀着一层黄金，因此宫殿获得了“金屋”的称号。餐厅天花板上有象牙做成的管道，可让鲜花和香水从屋顶倾洒下来。公元68年，宫殿建成时，它的建筑总面积达到了80万平方米，比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中国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当尼禄以这种极致奢华的方式将这座宫殿打造完成时，他对自己说，终于开始觉得活得像个人。

04

《早期美国民族主义扩张：1812年爆发的战争、战争的后果及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英)《美国历史》2015年9月

1812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爆发。为了撇开英国在加拿大的势力影响，结束英法对美国航运的骚扰，并达到自身拓疆的目的，美国向英国宣战。

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1811年的年度国会工作报告上进行了战争军事动员，并提出美国在这一战争节点上，除了考虑其在北美洲的利益，还必须关注到南美洲的局势。

麦迪逊清楚，在拿破仑发动全面战争的这个时期，美洲大陆及大西洋沿岸的地区都出现了许多变数，而美国绝不是有利益诉求的唯一国家。在1808年，法国入侵西班牙，拿破仑俘获了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和其子费迪南七世，并立他的长兄约瑟夫·波拿巴为王。对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来说，此时西班牙国内的自顾不暇给了他们进行独立斗争的最好时机。乱局之中，利益的重新分配的确给美国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文 | 雷颐

在 2006年6月，我到德国参加了一个史学的国际学术会。会议结束后只有一天的游览时间，这仅有的一天德国东道主只能安排来自各国的学者参观两个“景点”：一个是风景优美、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魏玛；另一个则是魏玛附近的布切沃尔特集中营。虽然大家从历史著作、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对纳粹的“集中营”已有相当详细的了解，但身临其境，还是给每个人以强烈的震撼。向“客人”展示本国一段罪恶史、展示自己的“疮疤”，说明了德国对那段历史反思的深刻。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而如果掩盖、涂抹历史，竭力遗忘历史，心灵必定在黑暗中行走。正是为了正视历史、牢记过去，为了不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柏林市政府为了与遗忘作斗争，在二战结束50周年后的1995年，建立起一座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 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为了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1933年4月初，纳粹掌权不久，希特勒发表了“德国文化成果决不能再从异族中产生，只能由深受雅利安和德意志精神鼓舞的人来创造”的演讲。此话一出，法兰克福市率先行动，立即禁止犹太人在大学里教书、在舞台上表演和在音乐厅演奏。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排犹、反犹浪潮，犹太银行家和一些社团领袖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准备向国家大量捐款来表示对德国的忠诚。但此举毫无用处，就在他们宣布要捐款以示爱国热情的当天，柏林的大学校园里就挂出大幅标语，强调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只能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要是他们说自己是德国人，那他是在撒谎；德国人认为犹

太人是叛徒！

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手持火炬，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来到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广场上，一堆堆搜缴来的禁书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带队的冲锋队员号令下，情绪激昂的学生们把火炬扔到书堆上，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二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

此次烧书以德国人特有的精确，作了细心安排，委托一家烟火公司作了非常专业的精心准备，不仅备置了八堆长达数米的劈柴堆，还做了防止烧坏地面的处理！但是，更重要、更精心的准备是，纳粹的“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戈培尔开始并未出面，当烧书进入高潮后才突然现身。他的出现，令现场更加疯狂。最后，他向烧书者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戈培尔只到“中场”才出现，是想表明这些行动是民众自发的，毕竟纳粹掌权才短短几个月。对此伎俩，茨威格分析说：“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一旦发现无人反对或反对力量弱小，纳粹的行为便迅速升级，更加激烈、极端。“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

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同样无法面对未来。



在这种纵容、支持、挑动下，民众“自发”烧书。（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与柏林焚书同时，德国其他一些城市、大学也发生了烧书活动。一些学者、作家、诗人等也参加了焚书活动，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由于有此强大“民意”基础、反对者不敢公开反对，纳粹迅速增大“剂量”，随后，开始了一系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更加严厉的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随之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残酷的法规法律。对异己思想的迫害，成为国家法律。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茨威格沉重地写道：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重要的因素是当烧书还是一种试探性的半官方行为时，“公众却没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点儿的教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昨日的世界》）对犹太人大规模集体屠杀的煤气室，正是从烧书这类事情逐步升级而成的，由“烧书”，发展为“烧人”。

62年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1995年，柏林市政府在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现在改名为倍倍尔广场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自己民族耻辱的历史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二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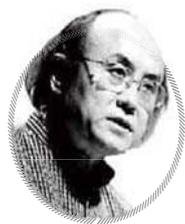
❖ 正视历史、牢记过去

德国对纳粹时期罪恶反思的深度有目共睹，赢得举世敬重。但德国人认为做得还不够，负责监管纳粹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所属机构前些年宣布，组成这一机构的11个国家一直在与德国谈判，要求德

国完全公开纳粹的大屠杀档案。其实，纳粹大屠杀档案并非完全“封闭”，对大屠杀幸存的受害者及其直系亲属就完全开放，历史学家得到这些受害者或家属书面授权也可查阅。但多年来，人们认为这种“有限开放”非常不够，仍会对历史形成某种程度的遮蔽，不断要求德国完全公开这些档案，特别是美国、以色列等国一直与德方具体交涉此事。但德国方面则一直以保护受害者隐私、避免给他们造成再次伤害为由拒绝完全开放。

经过长期谈判，在二战结束60年后的2005年，双方终于就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达成共识，德国决定正式完全公开纳粹大屠杀档案。从劳工伙食到集中营大批犹太人的死亡过程，这批档案都有十分翔实的记载。虽然德国对本国的那一段罪恶史一直勇于展示于人、引为殷鉴，但60年的时光流逝毕竟会使记忆稀释，因此近年来德国的“新纳粹”势力有所抬头，特别是遇到经济不景气、外来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时，总有某些人会被“新纳粹”吸引。尽管“新纳粹”只是少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却引起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决定完全开放这批档案，与遗忘作斗争，作为提醒人们警惕“新纳粹”的重要手段。

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但如果过去曾经罪孽深重，忘记过去就是拒不悔罪。要记住光荣传统并不困难，而要面对历史的罪过，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而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的。的确，只有记住过去，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①



雷颐 +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著有《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理性解剖日本这个特殊的邻居（下）

文 | 章夫

日本人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三年前我去过日本，对这个有着深切的体会。日本给你的全部印象可谓“日本社会是一个有教养的社会”，眼前的这一切让你很难想象到其过往的历程，一本《菊花与刀》十分形象地刻画了日本人这种矛盾的性格。带着种种求证和不解，我特地逛了逛日本的书店，从有限的看得懂的书籍里发现，关于中国的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研究介绍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第二类则是唱衰现代中国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 在变与不变中匍匐前行

70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在变与不变中匍匐前行。有着“考现学”之称的《冰眼看日本》（在日华人俞天任所著）一书，通过大量鲜活的事例，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日本人的良心”——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南京市民每年清明还只是去雨花台送花圈纪念中共先烈时，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就开始报道当年日本侵华罪行，让“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国民的历史选修课，并为中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是最早研究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学者，这位被日本右翼斥责为“非国民”的历史学者，多年来耗时耗力，收集整理大量证据，只为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并要求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归还中国。

●●
日本最繁华的国际化大城市，诸如东京，有高楼也有大厦，但根植于城市深处与人最为亲近的，还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古建筑。
●●

还有“让731魔鬼暴露于阳光”的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作家森村诚一以及主张“每个日本人都罪”的家永三郎……这让我联想到不久前日本学术界新闻发布会上，超过3000名日本学者明确反对安倍政权的“和平安保法案”，并指出安倍这一做法严重违宪。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认识的学者唐辛子不由心生感慨：在老龄化的日本，日本知识分子的风骨依旧顽固地健在。

一个民族的本色，更多是从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反应出来的。这一点，我在日本的一次旅游中感受颇深。

说实话，我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审视日本的，短短十多天，来去匆匆，仔细深思，恍然间觉得我心里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多年来耳濡目染看不见的日本；一个是活生生摆在眼前的日本。两个日本差距很大，恍如梦中，以至我都不敢承认——我眼里看到的那熟悉的一切，是真正的日本吗？

日本最繁华的国际化大城市，诸如东京，有大量高楼大厦，但根植于城市深处与人最为亲近的，还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古建筑，特别每座城市都有让日本自豪的众多神社（京都就有1400多座神社），几乎都是仿唐古建筑，看上去古朴而又时尚。四处的中国字，遍地的中式建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根本感觉不到身处日本。

旅日归来，我买了一些日本人和西方人撰写日本的书籍，从中有了更丰富的感受。他们可不是专门为日本说好话的。

行走在很多游客趋之若鹜的世界级奢侈品集

中消费地——银座的大街上，能感受到日本的历史感。更让我欣喜的是，当行至银座五街时，无意之中看到一个书道展的广告。我顺着广告的指引来到第6层楼，那里有4个书法展览，一个展览挨着一个展览，门口都写有展览者的信息，信息旁摆放着鲜花，前去参观者都身着正装，当你在参观簿上签下自己姓名的时候，会收到一件与书展有关的小礼物。

自小喜爱书法，每每看到这样的展览都喜出望外，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花了三个多钟头一览4个书道展，收获良多。虽然也有飞龙走笔的现代派意象书法，但更多的是尊重传统，且大多有深厚的功底，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书者的作品。

恍然间，我方悟出日本为何称“书道”，而我们谓之“书法”之差异。展览的整个过程，都有极强的仪式感，前来参观的人都像出席重大活动一样认真。在电梯里，我看见一对老年夫妇不断地在整理衣服，丈夫不停地打理妻子和服背面的皱褶。不论你何时前往，对每一位参观者而言，布展的主人都是兴高采烈，发自内心地鞠躬欢迎。

整个展场极其肃穆而安静，展览期间，还会有书者表演书道，当一幅作品写好后，大家才轻声鼓掌以示尊重。在国内我常常参观书法展览，这样的“仪式感”我之前从未感受过。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为这样的场面深深感动。他们是真正以“道”的礼仪和规格，去尊重延绵不绝的传统文化，这种仪式感很容易升华为崇拜感。

我不仅为汉字诞生在中国而自豪，更为日本人如此虔诚般守护而动容。

这或许是我在银座的巧遇，我敢说，这样的巧遇于我而言，比银座任何高档的消费品都要珍贵。

这就是文化，这就是延绵千年割不断的根。如果说中华文化是棵大树的话，我们都在不分国界地守护并发扬光大。

❖ 日本人正在听从内心的呼声

有意思的是，正值我们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一个日本新闻机构开设了“写给未来的信”专栏，邀请各界人士诉说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心声。信中只提两个简单问题：“对你来说，战争是什么”，“什么时候，你感受到和平？”

答案可谓五花八门。生于1934年的田原总一郎是日本著名媒体人、评论家和新闻主播，他的回答不乏批判的锋芒：何谓战争？人们一般会把思想方法和兴趣志向不同的人和国家认定为“敌人”，于是憎恨“敌人”，把承认“敌人”的存在认为是“正义”。何谓和平？能够自由地批判或评价日本当政的权力者。

而生于1978年的菊川怜没有战争经历，她的答案却也有代表性：古希腊哲学家伊拉斯谟说过：“杀一个人就是杀人者，杀百万人就是英雄，杀人行为因人数而被神圣化。”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与战争经历者谈过话，从书本、电影中学习了历史，了解到战争的恐怖。

更多的普通日本民众对于这个话题，则显现出生活味十足且具有诗情画意的一面：我喜欢路面电车，喜欢它融入街道场景的谦虚的外形，喜欢那种控制有度的行驶速度，喜欢能够马上看到下一个车站就在那里的亲切感……我喜欢毫不着急的悠闲旅程。不必在意时刻表，随便乘上一辆驶来的车辆。零钱投币的声音，车辆提速时引擎的声音，与母亲说话的孩子的声音，车内广播的声音……所有的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轻柔和谐。

中国有句古语，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是上天安排，无法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与日本处好关系。

2007年白岩松从日本回来后，写了一本名叫《岩松看日本》的书，其中有这样几句我很是认同，兹抄录如下——

爱和恨之前，先了解。日本依然了解我们，可我们并不了解日本。面对未来，这是很危险的。把爱恨放在一边，去了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解得多了，一切皆有可能。①

“8·29特赦”与历史上的大赦

文 | 唐博

习 近平主席于8月29日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第8次特赦。

大赦与特赦，历史上早有先例。和我国古代帝王时期出于显示皇权、启发社会善性和协调上下关系的大赦不同，“8·29特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时期的一种人道主义体现，加之这次特赦是我国在1978年修宪后启动的第一次特赦，因此更有着鲜明的法治意义。

细察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大赦，不难看出和今天的特赦的本质区别。

周朝设“司刺”之官，其职能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其中的“三赦”，明确为“赦幼弱，赦老旻，赦蠢愚”，就是对小孩子、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智力有缺陷者犯罪予以赦免，不进行处罚。由此可看出周皇室用刑之宽和人性尺度，其大赦已经有了一定的法治雏形。

继而下的秦二世，奉行暴力政治，虽在胡亥执政时赦免了20万骊山刑徒，但也是迫于形势所压，并非出于宽简用刑的本心。

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大赦、特赦、减赎三类赦免并用不息。其中，高祖朝赦免9次、武帝朝赦免18次、东汉光武朝赦免19次。到了政局动荡的东汉末年，赦令几乎是一年一次甚至一年数次。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赦频密，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东晋期间颁布的83次赦令，可能是目前可考的大赦之最。

比及隋以前的各种赦免，唐朝的赦免制度则已经有了成熟的法治精神。《唐律疏议》对责任年龄及能力问题、不得赦免等问题，已经有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成为赦免制度最成熟和最健全的历史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在贞观四年、贞观九年两次下诏大赦天下，赦令中都特别申明：官吏枉法受财者不在赦免之列。之后唐宋诸朝历代赦令，亦都强调这一规定。

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滥赦效果不一样，宋朝也滥赦，但宋的滥赦对启发社会善性作用积极，宋朝皇帝的开明和用刑的宽简柔性，使皇权的稳定和频密的大赦达到了高度的协调统一。最高3年的徒刑，使社会底层的刑事案件并未爆发，反使底层感戴、行事温和。即使偶有作恶杀人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者，也是选择出去避风头，然后老老实实地等天下大赦。

受耶律楚材的影响，元帝后来同意以办佛教仪式的名义释放重囚。但这样的赦免，也因为法律的不够谨严、条件的过于宽松、有人从中包庇弄权舞弊而渐变为姑息养奸的代名词，被赦免的僧徒重囚竟有“上午出狱，晚上杀人”的现象。

朱元璋立明后，严厉推行“重典治乱世”原则，并明确告诫后代子孙，必须对官民犯罪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因此，明朝统治200多年内，很少实行赦免，大约是平均5年多才来一次大赦。不过也有例外，公元1385年，朱元璋震怒于因郭桓案对明朝政权的影响，一怒之下处死了牵连此案的数万人，由此导致举国大怨，不得已，朱元璋才下诏大赦天下。其后的胡惟庸、蓝玉两案也辗转牵连了不少人，朱元璋又特地下诏大赦。

清朝统治时期，大赦非常少，据统计，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其法条更加完备、大赦方式也有变化，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新帝登基、册封皇后皇子、皇室大丧、改年号和尊号，是帝制时期大赦的几个主要理由，大赦可以“免刑免罪”双免，它们无一例外地烙上了皇室的威权和恩义，是皇帝或者皇室的个体施恩，少见法治精神；今天的特赦，如“8·29特赦”，作为我国修宪后第一次特赦，遵循的是更为谨严的法律程序和依法治国理念，大赦只能减或免刑罚而不能消除罪犯所犯之罪，这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只有特赦、没有大赦的原因。

一段3000年的赦免史，照见的不仅是时代的进步，更曲折递进地表达了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尊重，而对法治精神的高扬，才是从大赦演变为特赦最终极的意义。①



史叔下午茶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话题： 《富春山居图》流浪记

/读杂志/ 曾经有两幅《富春山居图》摆在乾隆皇帝面前，他深思熟虑了一整天，最终把假的当成了真的。乾隆喜欢在画上题字，在伪造的《富春山居图》上题了55处，真《富春山居图》因此幸免。

史叔：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辗转世间600多年，几经易手。被藏匿、被焚烧、被调包……最后一分为二来到乾隆手中又被认错。这兜兜转转的“剧情”在网友们的评论中却有着颠覆三观的雷点。史叔只能说，网友们的脑洞，真不是一般的大！



“玩坏”乾隆派

梁州观堂：乾隆果真是弹幕高手。

克里斯 DE 斯_：谢主不题之恩。

小肥脸爱好者：放到现在应该惩罚他看一百遍《富春山居图》。

冷观鱼：也许乾隆是故意的，在假的上面乱涂乱画！

中流击楫 hjts：乾隆那水准乱题字，也不知毁坏了多少古物！

神游派

聆听心的音乐 soul：难道现在辨别这幅画的真假，就是看哪幅有乾隆题字吗？

钟涛 cyu：乾隆能不知道哪幅是真的？大臣也会告诉他吧，我就想知道题字的那幅在哪？

我本无意入凡尘：“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御笔一题，谁敢说那是假？何况，既然能以假乱真，笔力想来也不差。莫非，当时也有版权之说？

tomoloo：怎么能用“幸免”这个词呢，现在很多艺术品也是因为有了乾隆帝题字而价值更高的啊。





评论最火微信
(2015年8月)



最火微信榜
(2015年8月)



从两幅画 看乾隆帝的香妃长啥样

推送时间: 2015-08-29

阅读人数: 2119788

史叔:说起香妃,想必人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还珠格格》里那位美人起舞引蝶的画面。香妃确有其人,乾隆继位第二十五年,平定南疆有功的维吾尔族和卓氏图尔都之妹入宫,成为乾隆的贵人,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史叔带你们看图说话,至于香妃是不是美女,诸位自行判断吧。



郎世宁《塞宴四事图》局部。



郎世宁《威弧获鹿图》局部。



小阿肥:

觉得画上每个人都长得差不多……

重拳上勾:清朝后宫那些女人们放到现在,那个丑呀……皇帝的口味太重了。

独步天涯:

乾隆香妃美如花,招影蝴蝶入窗纱。闻音起舞惹君爱,羞得美人如花开。

人生若只如初见:

据说香妃的体香其实就是狐臭……

如我:

清朝祖训,选德不选容。

夏冰执雨:

这画风,画出来的都像小纸人,看着就瘆人。

no.1

《西游记》里的女儿国真的存在吗?

推送时间: 2015-08-30

阅读人数: 1174032

史叔推荐:这是个困惑史叔多年的问题。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在女儿国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而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录了一个由女性做国王的神奇国度——东女国。这两部著作中的女儿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no.2

去世30年才曝光的潜伏者阎又文

推送时间: 2015-08-25

阅读人数: 316229

史叔推荐:他叫阎又文,解放前,他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他是特工中的精英。解放后,他的身份继续保密,直到去世30年之后才彻底解密,他的子女才终于认识了自己的父亲。

no.3

汉武帝丈母娘,一个改变历史的老太太

推送时间: 2015-08-16

阅读人数: 180445

史叔推荐:这是一位与西汉历史息息相关的老太太。卫老太太是西汉名将卫青之母。你以为这就完了?她还有三个女儿,三女儿叫卫子夫,耳熟是吧?汉武帝的皇后是也。而且,霍去病是卫老太太的外孙。史叔不由感叹,真是太会生了。

no.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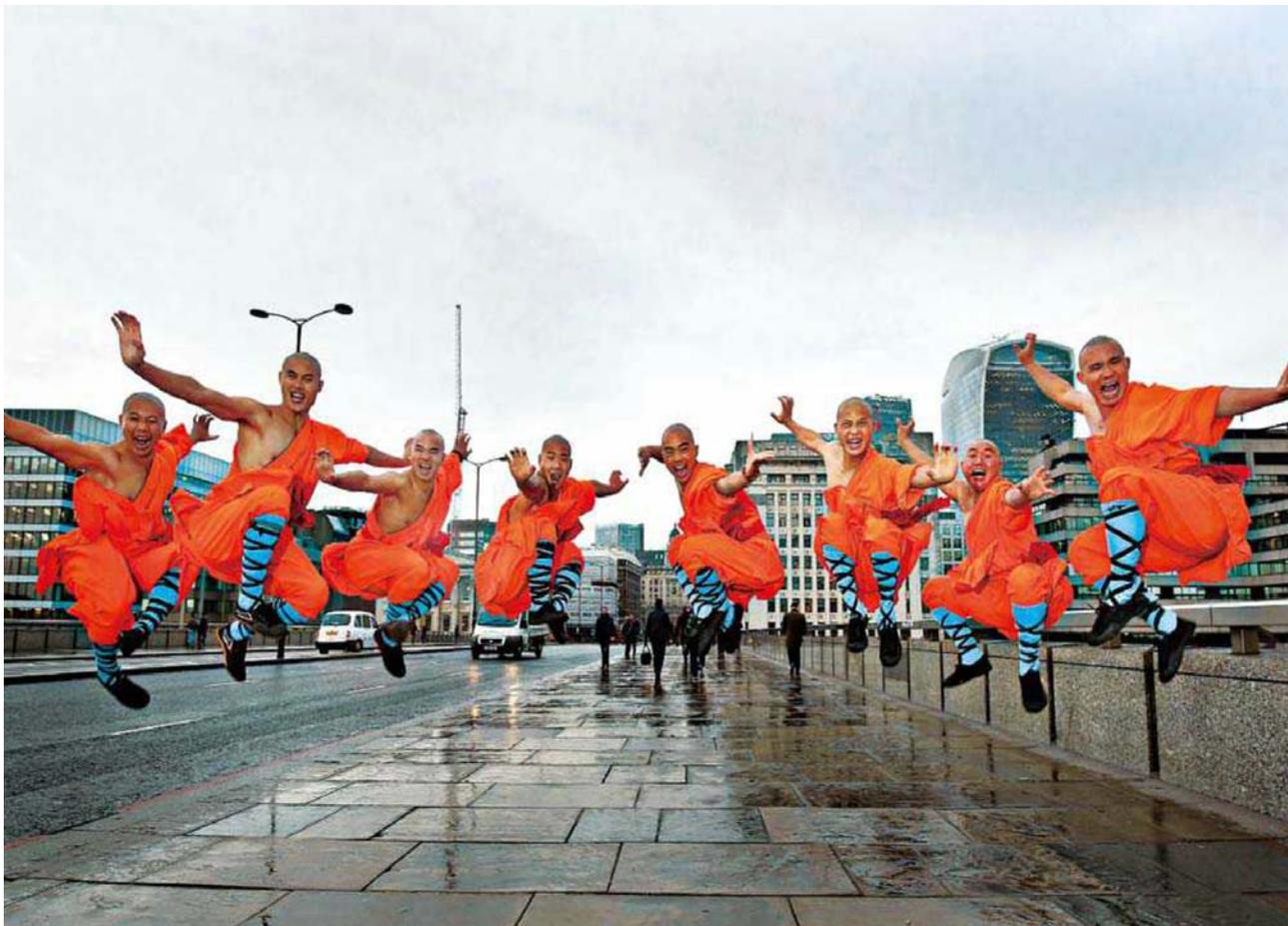
尘封的“中国潜艇官司”

推送时间: 2015-08-4

阅读人数: 157986

史叔推荐:二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曾与纳粹德国达成一项军火买卖,国民政府将巨款打入德国国家汇兑银行账户,订造2艘德国IIB型潜艇,最后交易因中日战争爆发而中止。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财政窘迫,欲追回这笔款项,却颇费周折,真可谓一桩“打不清的官司”。

* 阅读人数为微信推送一周内的点击量。如您感兴趣,请关注《看历史》微信公众号 EYEONHISTORY 查阅。



嵩岳寺，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图/FOTOE

026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少林，少林

随着影视业的大发展，少林寺日渐和大众流行文化相结合。少林寺的精神传统，比如武术和修行，都已得到新的阐释；武术，成为了亚运会的项目，这样的影响力，是少林寺在过去一千多年都没有过的；随着对外开放走向深入，少林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了越来越多的洋弟子修行少林禅宗。

当我们谈论少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如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

微历史 Microfilm History

- 001 请问，您有什么要当的？
- 002 叶圣陶、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
- 003 新闻
- 004 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 006 理性解剖日本这个特殊的邻居（下）
- 008 “8·29特赦”与历史上的大赦
- 010 微言

京张铁路 百年沧桑

时至今日，京张铁路的蒸汽机车早已开进博物馆。老京张铁路也基本结束了其功能性的运营，转变成了集民族性、历史性、文化性、景观性、纪念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物质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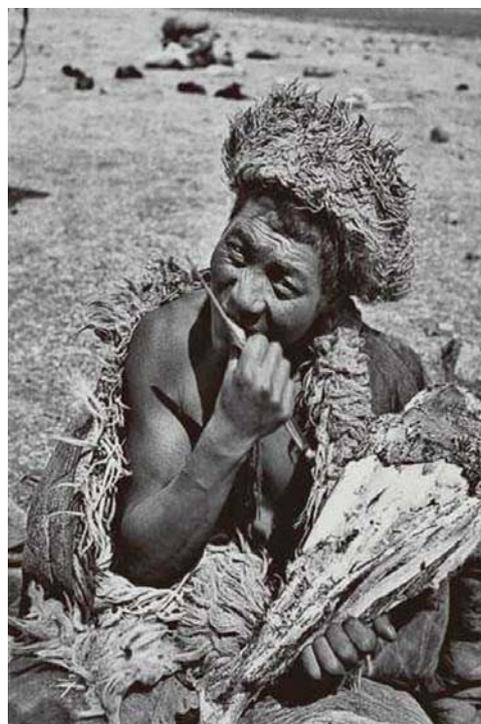


018

024

百步穿杨

热历史 Hot History



056

80年前的 “西康”光影

曾经与世隔绝的西康让世人充满好奇，一大批学者加入到了对西康的考察和研究中。20世纪30至40年代，我国早期的摄影家庄学本和孙明经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先后地进入了大横断山区，开始沿途考察和记录西康、川西的风土人情。

- 近代西药入华史 062
- 乱世幕僚赵烈文 070
- 智利伊基克，
为何有20万太平军后裔？ 076
- 立德夫妇：
扁舟过三峡 080

清朝邮政的光影记忆

清代后期，封建统治日趋衰落，传统的邮传制度也面临崩溃，王韬、郑观应、冯桂芬等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立西式的邮政制度。迫于形势，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并诞生了中国第一张邮票——龙票，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086

- 092 吉田茂：日本的丘吉尔
- 096 活跃在东北的近代海军武装
- 102 魔鬼的大炮
——美苏冷战中的疯狂兵器
- 108 香港抗日保卫战：
74年前的战争遗迹

厚历史
Thick
History



116

酷历史
Cool
History

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

随着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确立，体育开始由学校向社会渗透，现代体育文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不仅有更多的社会精英分子关注中国体育的发展，而且有更多的民众开始关注大大小小的体育运动会。

- 建水紫陶的锅中乾坤 122
- 有魔力的卡片：以信用之名 128
- 川北第一庄：丁家大院 132
- 古代官场如何看“相貌” 138
- 唐朝人为何以胖为美 140
- 波斯人眼中的中国 142
- 蜀道如诗 144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5-0853
国内统一刊号
CN51-1732/k
广告经营许可证
5101034000361
邮发代号 62-313

主管主办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 看历史杂志编辑部

运营机构
成都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局发行
四川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本刊法律顾问
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

印制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图片合作
CFP、东方 IC、人民网、新
华社、FOTOE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成都日报报业大厦2203室
电话/传真 028-86621481
邮编 610017

出品人 严光辉

总编辑 苑海辰

采编总监 柯菁

编辑 吴蔚 黄鑫 凌波
蔡丽萍 黄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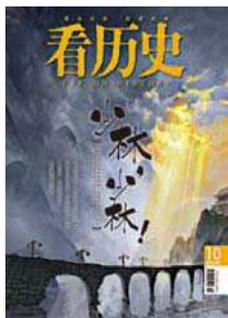
新媒体运营 毛瑞 孙琿

美术编辑 闫星 王珏菲
编务 范若青

运营总监 罗荣敏
发行总监 叶翔
发行经理 陈锐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本刊声明

本刊所有文字图片的版权，均
归本刊所有。未经本刊书面明
确许可，不得转载。否则本刊
必将追究侵权责任。

凡向本刊投稿并采用，均视为
作者同意授权本刊通过网络、
电子杂志、结集出版等方式使
用该作品，如有例外，请书面
声明。本刊所付稿酬包括刊物
内容及其他使用报酬，不再
另付。未署名图片、文字作者
请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杜绝虚假报道

举报电话：028-86625451

读者对本期杂志有任何
意见、建议、讨论或
咨询，都欢迎来信至
klstougao@163.com。
评刊栏目将定期选登一些
读者来信，并赠新一期《看
历史》杂志。各位读者如
发现本刊内有缺页、错误、
装订错误等问题，请与本
刊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86624841

欢迎联系我们

《封面故事》编辑邮箱：1602651769@qq.com
《微历史》《厚历史》编辑邮箱：2010025743@qq.com
《热历史》《酷历史》编辑邮箱：klsbjhy@163.com
新媒体编辑邮箱：27330889@qq.com

投稿邮箱：klstougao@163.com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
《看历史》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uoqialishi
《看历史》腾讯微博：http://t.qq.com/history0799

广告热线
028-86621481 (传真)

发行订阅电话：
028-86763285
028-86624841

在以下城市可以买到《看历史》

成都	尚和书店	028-86667805/18908079206
重庆	尚和书店	023-86359611/13883585088
昆明	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13808715581
贵阳	尚和书店	0851-5661974/13078514533
遵义	尚和书店	0852-8715679/13984201585
西安	尚和书店	029-82100992/15902924011
太原	尚和书店	0351-5625806/13934583130
南宁	尚和书店	0771-2624534/13617715181
桂林	尚和书店	0773-2834966/13217732489
南昌	尚和书店	0791-88592700/13576955788
柳州	尚和书店	0772-2176764/13132720066
长沙	尚和书店	0731-2810105/15074927150
武汉	春秋书店	027-85493562
哈尔滨	翔宇书店	0451-88341807
沈阳	小门书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24-62500517
石家庄	兵行天下书店	13633313388
济南	联合书社	0531-82052662
郑州	大河期刊	0371-67647276
苏州	和缘书店	0512-65188163
南京	星与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5-83327129
兰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2
乌鲁木齐	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广州	卓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0-32723429
深圳	新宏博发展有限公司	0755-22203426
温州	华鸿有限公司	0577-81707629
杭州	华鸿有限公司	0571-88256120
北京	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	010-83158388
大连	天天期刊	0411-8522978
天津	新兴书店	022-27694099



《看历史》微信公众账号



《看历史》淘宝店



《看历史》腾讯微博



《看历史》新浪微博



先锋公司官方网站好事 100 网址：
<http://www.house100.cn>



微历史 Microfilm History

影像纪年

京张铁路 百年沧桑

文 | 石磊

微历史版块编辑：蔡丽萍
邮箱：2010025743@qq.com

谈及清朝邮传部二等顾问官詹天佑，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提起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几乎无人不晓。因为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干线——京张铁路。

京张铁路的起点在北京丰台柳村，与京汉铁路接轨，终点在河北张家口，全长 201.2 公里。1905 年，清政府不顾西方列强的阻挠，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该条铁路。消息传出，举国轰动，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因为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工程之艰巨，自然环境之恶劣，使得西方知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

但詹天佑毅然接受任务，他亲自勘察，选定路线，同时集思广益，攻坚克难：在北京青龙桥东沟，采用“人”字形轨道，用两台大马力机车调头互相推挽的办法，解决坡度大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又与工人一起，用两端凿进法开凿居庸关，使得施工量大为减少。京张铁路于 1909 年竣工，总费用只有列强索价的五分之一。

抗战时期，它曾历经激烈的战火，日军进占华北后，曾利用它疯狂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20 世纪 50 年代，因清华大学扩建，附近的线路曾东移数百米。60 年代，北京市内的京张线路得到修复和完善，其余路段的线路保存基本完整。

时至今日，京张铁路的蒸汽机车早已开进博物馆。老京张铁路也基本结束了其功能性的运营，转变成了集民族性、历史性、文化性、景观性、纪念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物质文化遗产。①



清末，京张铁路居庸关新添道岔施工场面。图/FOTOE



01	02
	03
	04 05

01

1909年9月，京张铁路（北京至河北张家口）修成时，詹天佑（车前右三）与同事们合影。北京，中国铁道博物馆。图 / FOTOE



02

旧时，列车驶过 1091 米的京张铁路八达岭山洞。詹天佑采用“之”字形修建的。图 / FOTOE



03

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京张铁路会办。北京，中国铁道博物馆。图 / FOTOE

04

詹天佑。

05

着官服的詹天佑。





01	03
02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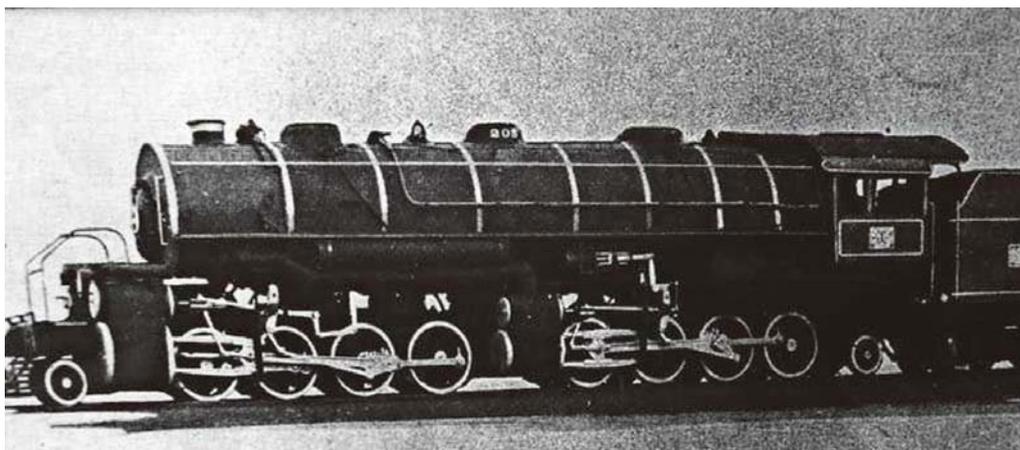
1909年9月，京张铁路起点：
广安门车站。图 / 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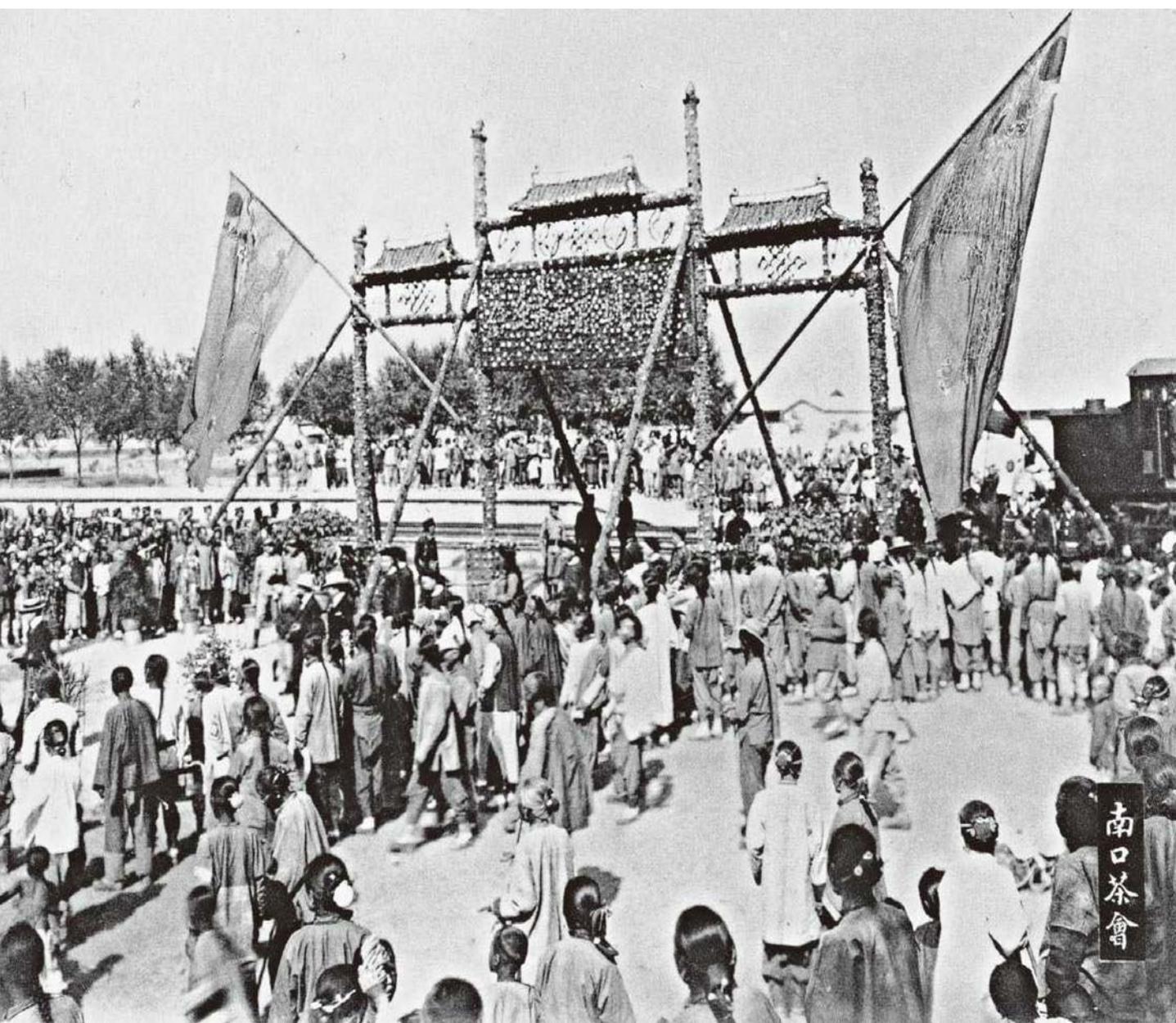
02

1922年从美国购进的大马力马
莱形机车，运行于京张铁路。
北京，中国铁道博物馆。
图 / FOTOE

03

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
通车典礼：南口茶会专车入站
的场景。
图 / FOTOE





百步穿杨

神射手养由基传奇

文 | 匡己

百步穿杨，意为射中百步距离外柳树的叶子。此语的相关人物，便是楚国著名的神射手养由基。“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战国策·西周策》）

或许有人会想，按照成年人一步距离为 0.5 到 0.7 米计算，一百步不过 50 米到 70 米的距离，养由基能在这个距离上射中柳树的叶子，诚然算厉害，但也不能为此称之为神射手吧。

这种想法看似颇有道理，实则是既不知道射箭与打枪的难度高低之分，又不清楚春秋战国时期的“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 百步有多远

打枪，无论是打步枪、手枪，还是机枪，都是利用火药燃烧的强大化学能推动弹丸，射向目标。除了用来发射子弹的枪管、枪膛之外，枪还配有各种瞄准器具，从简单的准星，到精密的光学瞄准镜，再到激光瞄准系统，足以让一个接受过基本射击训练的人，较为准确地射杀数百米内的目标（手枪除外）。至于专用的狙击步枪，在经过高强度训练的狙击手操作下，更是可以达到两千多米外一枪爆头的恐怖程度。

而射箭，那就难得多了。首先，能否成为优秀的弓箭手，必须是注意力、耐性、力量、敏捷度等素质的高度融合统一。千百人中找一群拿大刀片子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要找一两个眼神很好，



养由基射箭力度奇大。《左传》记载称，养由基能射穿七层铠甲。《吕氏春秋》记载，他曾弯弓去射一种名叫“兕”的动物，未射中，射到石头里面去了，而且整枝箭都射进石头里面了。



力量又不错，反应还很快，而且能长时间一动不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人，就难上加难了。

这些素质之中，力量应该是最难以理解之处，射箭需要那么大的力气吗？

《宋史·岳飞传》称岳飞：“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此处的“斤”，按照宋朝度量衡，约等于今天 600 克。也就是说，岳飞还未成年时

便能拉开 360 斤的弓。

而据宋朝兵书《翠微北征录》记载，宋朝军队步弓“合用九斗、八斗、七斗”，马弓“合用八斗、七斗、六斗”。彼时一斗约等于现在 11 斤多，也就是说一般的弓箭手，要射箭的话至少都得使出六七十斤的力气。

而即便某某天赋异禀，集诸多素质于一身，要成为神射手，还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古代诸军，骑兵难度最高，弓箭手稍逊，但神射手的训练难度则是远超骑兵。《荀子》有云：“百发失一，不足善射”——只要有一次没射中，便不能称为“神射手”。

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步”，宽度远非今天一个成年人踏出一步可相提并论。

《春秋·谷梁传》记载称，“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又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称，“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可知，养由基百步穿杨中一步的距离，至少应该是商周时期一里的三分之一，而按一步为六尺，尺为汉尺（约为 0.231 米）计算，则一步当为 1.386 米左右。

现代军用手枪要做到如此精确，也得在六七十米距离内，而非狙击用步枪的高精度射击，也就是 150 米上下的样子，而名扬天下的 AK47 在 100 米距离上的平均命中精度还不到 40%（AK47 发明者卡拉什尼科夫回忆录《我和您同路而行》）。

更夸张的是，养由基射箭力度奇大。《左传》记载称：“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说养由基能射穿七层铠甲。《吕氏春秋》的记载更是骇人：“养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养由基弯弓去射一种名叫“兕”的动物，没想到未射中，射到石头里面去了。“矢乃饮羽”意为整个箭都射进石头里面了。

汉代飞将军李广也曾有此神技，但那是李将军偶尔一次的超常发挥，“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 楚国名将养由基

如此传奇的神射手，自然也不会因为在表演了几次高超的射箭技艺之后，就从历史中隐退了——他，乃楚国名将，是要上战场的。

关于养由基征战沙场的事迹，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只是在明朝冯梦龙所著《东周列国志》中有大段大段的描写。

依据冯梦龙的描写，养由基在楚庄王（春秋时期楚国最有能耐的君主之一）时期出山，先是帮楚庄王干掉了权臣斗榭椒，接着又于两军阵前射杀了晋国悍将魏錡（此君亦善射，射伤了楚王）。当晋国大军追击败退的楚军时，养由基一个人断后，只把那弓箭挥了挥，晋国大军就不敢前进了，“却说晋兵追逐楚兵至紧，养由基抽矢控弦，立于阵前，追者辄射杀之，晋兵乃不敢逼”。最后，神箭将军养由基因为误入敌阵，被吴国精心设计的铁叶车困住，然后被万箭射死。

冯梦龙写的是小说，与史实有出入，但颇有意味的是在写到养由基之死后，他说：“楚王曾言其特艺必死，验于此矣。息桓收拾败军，回报屈建，建叹曰：养叔之死，乃自取也！”颇有艺高人胆大，胆大易送命的警示之意。

而从另一个角度论证养由基乃中国古代神射手的材料，便是自他以后，那一个又一个以他来自诩、他诩的历代神射手了。

唐朝名将薛仁贵，以三箭定天山而闻名天下，唐高宗曾考验其箭术，“将行，高宗内出甲，令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古之善射，射穿七层铠甲者，便是养由基了，只是唐高宗没说出曹操称赞猛将典韦“古之恶来”一类的话。

陈康肃公，宋朝神射手，那个卖油翁教育“熟能生巧”之道理的故事便是说的他，而此君在当时的名号，便是“小由基”。

《水浒传》中方腊手下那个射杀梁山七条好汉的庞万春，也是被施耐庵冠以“小养由基”的名号。^①





少林
S h a o l i n

【当我们谈论少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如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

少林
S h a o l i n

当我们谈论少林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 / 浦顿



最近，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再度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这让人们对少林寺这座千年古刹再度充满好奇。少林寺已经建寺超过 1500 周年。如果我们追溯它的历史，会发现少林寺有几个传统。

少林寺的初创者是北魏孝文帝时期的跋陀禅师。在建寺之始，少林寺就受到孝文帝的供养。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少林寺非常重视，武则天和乾隆，都亲自到过少林寺。可以说，千年古刹少林寺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兴衰：每到一个朝代末期，战乱四起，少林寺的日子就会动荡艰难，而在和平时期，少林寺就会兴旺繁盛。

如果说跋陀代表的是与封建王朝和谐相处的外在传统，那么自达摩祖师入寺以来，少林寺还有一个艰苦修行的传统。达摩是禅宗的初祖，同时也被认为是少林武术的开创者，或许正是这一传统，让舆论对现任少林方丈释永信的生活方式看法颇多。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不提到“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隋末，少林寺受到“山贼”骚扰，搬到山外，但是又受到王世充侄子王仁则的欺侮，少林武僧审时度势，活捉王仁则，给正在历史关头的李世民以很大帮助。“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除了让少林武术声名远扬之外，还把武术与正义、历史的演进联系起来。

少林寺与时代的关系紧密，使其与众不同。现代少林寺的形成，已远非建造寺庙、弘扬武术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少林精神的生命力。

最近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转型，少林寺也不例外。1928 年，军阀在中原混战，少林寺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劫难，几乎被烧光。稍后，抗战爆发，少林寺一度淡出人们的视线。等到改革开放，少林寺重新开张，1989 年，河南省正式建设了少林寺旅游中心。

我们可以断言，过去的三十年，是少林寺最好的时期之一。少林寺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从文化意义上，少林寺一直处于相对的静态，而最近三十年，少林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不但在国内妇孺皆知，也开始走向世界——少林寺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形象越来越有新意。

随着影视业的大发展，少林寺日渐和大众流行文化相结合。少林寺的精神传统，比如武术和修行，都已得到新的阐释：武术，成为了亚运会的项目，这样的影响力，是少林寺在过去一千多年都没有过的；随着对外开放走向深入，少林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了越来越多的洋弟子修行少林禅宗。

当我们谈论少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1997年4月，少林寺武僧。
图 / 单晓刚 / CTPphoto/FOTOE

千年少林：

寂寞与喧嚣

文 / 黄小凡

少林寺的开创者跋陀曾说：‘少林寺一自建立之后，永远不会被灭’。1995年，少林寺庆祝了自己1500岁的生日，证明了跋陀的话是一句很好的预言。但是，在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少林寺并非一直处于风平浪静之中，它经历了多次劫难，就建筑实体来说，一千年以上的遗迹非常少，甚至清代的大修，也已经难觅踪影。如今围绕方丈释永信的舆论漩涡，在少林寺漫长的历史中，实在算不上什么。



❖ 创立：皇室与达摩

少林寺初创的时间，权威的说法是北魏太和 20 年，也就是公元 496 年，这也是少林寺在 1995 年庆祝建寺 1500 周年的缘由。《魏书·释老志》在讲述徐州白塔寺道登法师的故事时，有这样的表述：“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时沙门道登，稚有义业，为高祖所眷顾，恒侍讲说，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仰，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

这是有关少林寺最早的文字记载。尽管跋陀的故事，只是出现在对道登法师的追忆中，但是这段故事还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少林寺最初的创立，是和魏孝文帝有关。跋陀和皇帝的关系很好，而且，在最初，少林寺就获得了皇室的供养。

根据《续高僧传》的说法，跋陀是天竺人，在天竺时交了六个朋友，一起修习禅法，其余五人都成功了，只有他处于进退维谷之中。后有人告诉他，他的机缘应该在中国，“到中国去，度两个弟子，应该大有好处”。跋陀来到中国，中原正是北魏孝文帝的天下，孝文帝是个佛教徒，非常欣赏跋陀，在云冈石窟开了一窟，专门让他修行，一切费用由朝廷供养。从云冈石窟到少林寺，跋陀的事业都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少林寺建立后，跋陀声名远播，求教者络绎不绝，听他讲佛者常常有数百人，但是这些人，甚至包括跋陀本人，都不太为人所知。

在少林寺的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其实是达摩。如今，在少林寺的山门两侧，赫然写着 8 个大字：“大乘胜地，禅宗祖庭”，它告诉人们，

在中国传承了一千多年的禅宗，其祖庭就在这座寺庙里。佛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禅宗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注重冥想、顿悟和苦行的流派，也是最有魅力的流派之一。

禅宗的初祖，被认为是达摩。如果说跋陀是少林寺物质意义上的创立者，达摩则是少林寺精神意义上的创立者。

达摩的故事，在少林寺可谓人人皆知：达摩渡海来到中国，先在广州落脚，后来到南京见到了推崇佛教的梁武帝，但是未能得到欣赏，双方谈不到一起。达摩踏着一枝芦苇渡过长江，在少室山五乳峰下的山洞里面壁九年，最终成就一代宗师。尽管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已经有关于达摩的记载，杨衒之还声称见过达摩本人，但是他见到的达摩，“自云年一百五十岁”，明显不符合现代科学所认可的人的寿命。

如今看来，达摩的形象，是一种文化创造的结果，从唐到北宋，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苦行”和“神功”一直是最核心的要素。这种对苦行的强调，还体现在禅宗二祖慧可的身上。慧可在山洞外拜达摩为师，达摩最初并不答应，慧可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砍下自己的一条手臂，达摩才答应收他为徒。

如果说跋陀代表的是一种和朝廷合作、得到朝廷支持的传统的的话，达摩代表的则是强调修行的吃苦传统。少林寺把自己的武术传统追溯到达摩那里，据比较科学的看法，是因为达摩在山洞修行时，为了保证自己身体的健康，自己创了一些体操，经过演化，就成为少林武术的种种招式。少林武术套路多样，但大都要求在狭小的面积（比如一匹马的阴影）内完成，或许和当初达摩祖师所在的山洞空间狭小有关，这些体操都是在非常局促的环境中操练而成的。





❖ 十三棍僧救唐王：武术的道德升华

如果你去少林寺参观，导游一定会领你到钟鼓楼旁边的一座巨碑前，碑上刻着李世民给少林僧人的嘉奖令：

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众及军民首领士庶等：

比者天下丧乱，万方乏主，世界倾沦，三乘道绝。遂使闾浮荡覆，戎马载驰，神州糜沸，群魔竞起。我国家膺图受箓，护持正谛，驭鸟飞轮，光临大宝。故能德通黎首，化阐缙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王世充叨窃非据，敢逆天常，窥觐法境，肆行悖业。今仁风远扇，慧炬照临，开八正之途，复九字之迹。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

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奉顺输忠之效，方著阙庭；证果修真之道，更宏像观。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供养优赏，理殊恒数。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各安旧业，永保休祐。

故遣上柱国德广郡开国公安远往彼指宣所怀，可令一二首领立功者来此相见，不复多悉。四月三十日。

这段碑文的背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唐朝建立，而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废掉隋越王杨侗，自称“大郑皇帝”，盘踞在山东一带的窦建德和王世充遥相呼应。李渊父子要统一全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敌人，就是王世充。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包围洛阳城。王世充守御极严，李世民久攻不下。洛阳城被围

1999年，河南省登封市中岳嵩山少林寺白衣殿内的“拳谱图”壁画。
图/周沁军/FOTOE

困很久，城内的人们陷入饥饿之中，王世充焦急地等待窦建德援军的到来。

此时的少林寺，已在隋末的动乱中陷入困境，遭到山贼的抢掠，塔院被焚，其他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寺僧只好到少林寺西北的柏谷坞居住，这里有隋文帝赐给少林的一百顷地，是一个庄园。

柏谷坞在少林寺背面的山后，属于偃师县，在当时，这是一个战略要地。王世充废掉隋越王后，派自己的侄子王仁则占领柏谷坞，筑城设防。少林寺的僧人在此也受到王仁则的欺侮，唐军的到来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四月二十七日夜，少林僧在上座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瑒和大将军僧昙宗的组织和带领下，联系王仁则手下的官兵作为内应，对王仁则突然袭击，大获全胜，并捉住了王仁则，归顺了唐军。正在虎牢关前线指挥作战的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因为除去王仁则就除去了一个后顾之忧，而且这对守卫洛阳的王世充的士气不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世民马上（四月三十日）给少林寺写了一封信，就是本节开头的嘉奖令。

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窦建德正率兵增援王世充。五月一日，也就是写完信的第二天，李世民放出一千匹马引诱窦建德，待窦建德追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正中李世民的埋伏，虎牢关大战，李世民打败并活捉了窦建德。王世充陷入绝望，一周后就投降了。因此，少林寺僧人救唐王的故事，后来在文学作品中虽然多有演绎，但其核心事实是成立的，少林寺的出手，确实在历史的关头给予李世民以很大的帮助。

李世民在给少林寺写信后，还许诺有一些奖励，但当时忙于战事，并没有兑现落实。第二年，少林寺还因为曾属于王世充的地盘，被地方政府要求“僧徒还俗，各从徭役”。少林寺僧人不服，



“不肯服减，上表申诉”。武德8年（公元625年）二月二十日，京都秦王府下牒，“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并申明过去没收的隋文帝所赐之地及水碾“一并奉还”。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在贞观6年（公元632年），再次评价少林寺说：“若论少林寺功绩，与武牢不殊”，就是说他们活捉王仁则的功绩，和活捉窦建德是一样的。这样，少林寺的功绩，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十三棍僧救唐王，成为少林寺又一精神支柱之源，这就是深悟机变、护国佑民、行道报国的精神。在这个故事中，习武与正义结合起来，把武术这一强身健体的体操升华了。

十三棍僧救唐王，成为少林寺又一精神支柱之源，这就是深悟机变、护国佑民、行道报国的精神。在这个故事中，习武与正义结合起来，把武术这一强身健体的体操升华了。

❖ 皇恩浩荡：到过少林寺的皇帝

从创立开始，少林寺就和皇帝联系紧密，因此少林寺的命运，也和朝代更迭的大势联系在一起。国泰民安的时候，少林寺往往兴旺，而天下动荡的时候，尽管有武僧护法，少林寺也难逃厄运。

元末，少林寺经受战乱的洗劫，许多寺僧外逃避难，寺院建筑遭到部分损坏，佛像上的饰金也被人刮去。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也写到这一时期的少林，明教教主张无忌在少林寺和破坏少林的恶人成昆有几场恶战。但是，历史的真相看起来就没那么传奇了，正是起义军红巾军的骚扰，让少林寺陷入了困境。这一时期的少林寺的恢复，靠老僧觉定艰难维持，率领僧众白天耕田，夜晚参禅，逃走的僧人后来又慢慢重新回来，少林寺才逐渐恢复元气。明末，天下再次大乱，起义军占领了南山，一些人想强占少林寺，当时的住持海宽法师积极应变，做了不少工作，起义军才未能入寺破坏。

武则天的生母杨氏礼佛，这对她的影响很大。公元671年，91岁的母亲去世，武则天非常悲痛，她把自己的住宅捐出，设太原寺。武则天的地位随着唐高宗一步步上升，公元674年，唐高宗被尊为“天皇”，武则天也就成了“天后”。唐高宗崇信道教，当时著名的道士潘师正在嵩山逍遥谷修炼，公元680年，唐高宗带着武则天和太子到逍遥谷拜见潘师正，之后到少林寺参观，武则天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她在少林寺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当即提出要为父母在少林寺建两座塔。但在立碑的过程中，可能进度较慢，武则天又一次路过这里时，看到塔还没有建成，有些着急，回去后就派武三思拿着她亲笔写的一封信，带着黄金和绢丝到了少林寺。3年后，武则天又随高宗去已经建成的隋唐观拜见潘师正后，回途中又来到少林寺，看到塔已经建成，



就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武则天后来当了皇帝，到少林寺的次数比任何一位皇帝都多。值得关注的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分别喜欢道教和佛教，但能一视同仁，互相包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盛唐气象，其统治者开阔的胸怀，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

从对少林寺的重视程度来讲，清朝皇帝并不亚于武则天。康熙皇帝为少林寺题写的匾额，至今仍悬在少林寺的山门。从顺治到康熙的数十年间，少林寺许多殿堂屋舍在风雨中遭侵，战乱中破坏的房舍也未完全修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官员张思明来祭中岳，他看到的是：少林寺“已久经劫火，法堂草长，宗徒雨散矣。慨然久之。偶步千佛殿西，见榛莽荒秽中，散瓦数椽，风雨不蔽。僧允石咨叹，指余曰：‘此白衣大士殿也，昔创于魏孝文帝，规制宏敞，中更寇乱，荒废至此！’”

这白衣大士殿，在清代已算文物，但残破至此，不禁令人唏嘘。张思明当即提出要捐建重修，得到不少官员支持，到第二年冬天就宣告完工。当时，去少林寺参观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参与了募资修缮。到了雍正时期，朝廷组织对少林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现在少林寺的全部建筑形式，就是雍正十三年重建后的格局。

18世纪中叶，少林寺最值得一书的，是乾隆皇帝到少林寺一住，这是唐高宗、武则天以来，又一个来到少林寺的皇帝，其间相距已千余年。1750年9月30日，乾隆皇帝和皇太后一行，浩浩荡荡登上嵩山，参观、祭祀山川，乾隆在少林寺方丈室住了一个晚上，批阅奏章，并为少林寺题写了几幅匾额。在封建时代，这是少林寺与朝廷关系最后达到的高峰。

乾隆之后，清王朝走向衰落，而少林寺的走势曲线图，也和国势相吻合。

❖ 两场辩论

少林寺有两种意义上的存在：作为物质意义的寺庙，和作为精神传统的少林文化。少林寺能超越其他寺庙，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和它在精神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少林武术天下尽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林寺为了捍卫自己的精神地位，有过两次大型的辩论。

第一次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南北朝时期崇尚佛教，南方、北方竞相建寺，耗尽资财，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有在诗人的眼中才是浪漫的。当时，大量的劳动者为避赋税入寺为僧为尼，大量的土地被寺院所占，已经影响了国家的财力、人力、兵力。据《释老志》所记，当时全国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人数占全国的十六分之一，这还可能只是北朝的情况。如此，反佛之声不断响起。北周武帝要统一北方，富国强兵，自然要打寺庙的主意，他采取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决于塔庙之下”的政策。当时的名



士卫元嵩向武帝进言，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平延大寺”，把资源集中起来。

北周武帝要削弱宗教力量，也想尽量取得合法性，他多次举行儒、释、道的辩论大会，从天河二年（公元567年）起，一共7次，在有意无意的安排下，佛教和道教开始针锋相对。公元573年，周武帝直接为三教定了座次，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第二年，又让佛道两家辩论，这次佛教赢了，但是周武帝已经没有耐心，在第二天就宣布佛教道教都属非法，下令取缔，并命沙门、道士还俗。

在几次大辩论中，少林寺的慧远（523-592年）在大殿上与周武帝曾进行了抗旨争辩，虽然未能挽回周武帝灭佛的决心，但却得到了“护法菩萨”的美誉。在周武帝的废佛运动中，少林也在毁坏之列，但毁到什么程度，则缺乏有效的记载。一直到公元578年，周武帝死去，毁寺现象才得以停止。

第二次辩论是在元朝，当时，少林寺一代名僧福裕和尚，因为和忽必烈的特殊关系，力挫道教。

福裕自幼父母双亡，拜当时的著名僧人休林为师，而休林和耶律楚材、元好问等都是好友，正是这一层关系，让福裕得以结识忽必烈，1245年，忽必烈成为太子，立即起用福裕，让他到少林寺主持超大规模的法会，后来，又授予他都僧省之职，相当于全国佛教事务的总管。福裕提出恢复和修缮战时毁坏的寺庙237所，这让他在全国佛教界威望大增。福裕成为少林寺、万寿寺等几座著名寺庙的住持，其声势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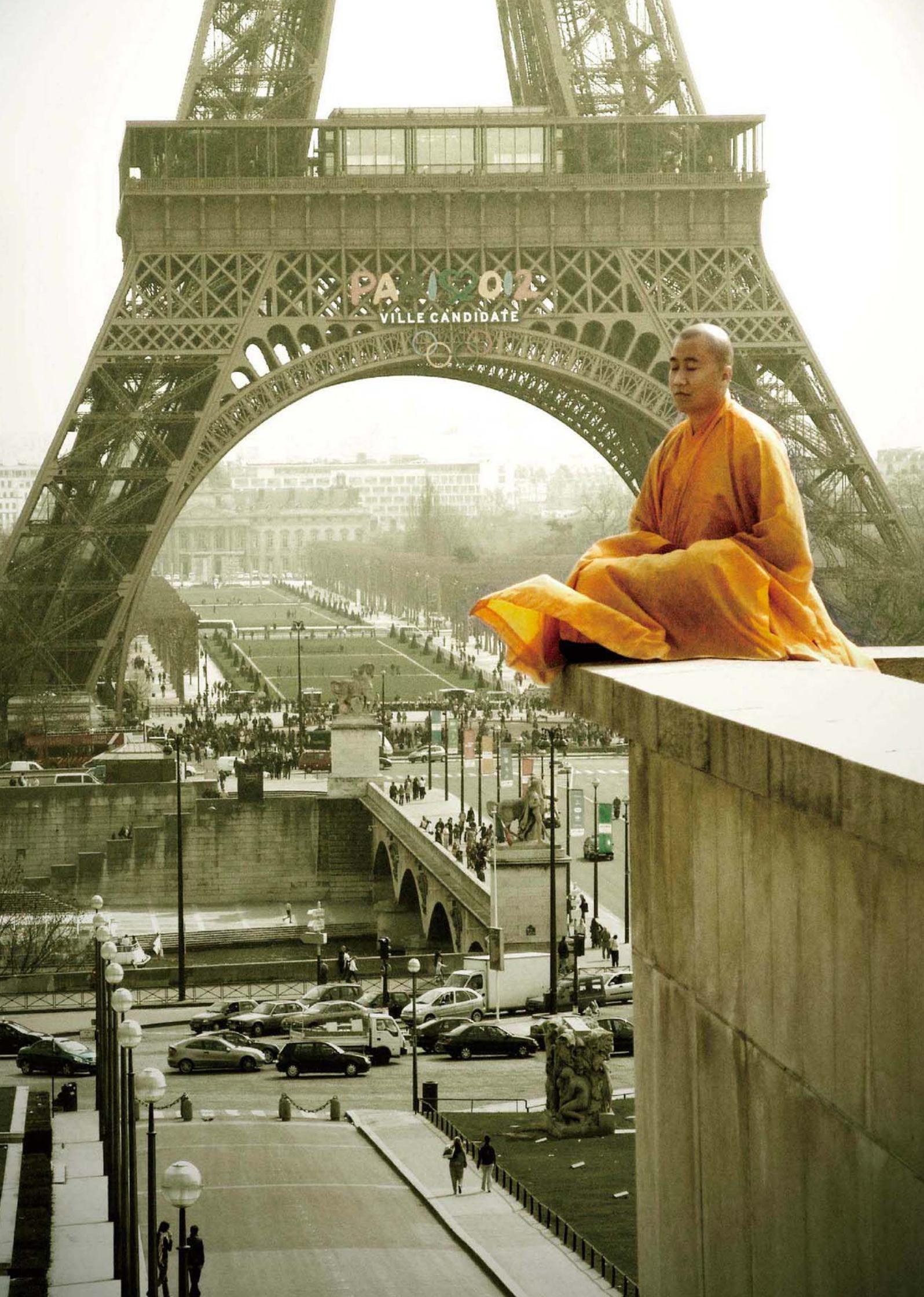
1258年，忽必烈召集僧人、道士聚集京师，进行了佛道大辩论，福裕此时是少林寺主，又是全国佛教领袖，他以皇室为后盾，成功说服了朝廷。忽必烈在1280年下诏，焚毁道教经义，佛教在10余年的争辩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样的辩论，不仅仅是为佛教而辩，还是为寺庙的生死存亡辩论，为经济利益和财产辩论，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佛教的地位一直很高，这和福裕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①

（本文参考资料有《少林历史与文化》等）



2009年6月14日，嵩山少林寺塔林。
图/严向群/FOTOF



少林很忙：

一个洋弟子眼中的少林

文 / 浦顿

九九二年，21岁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生马修·波利（Matthew Polly）陷入精神困境，他希望通过一场苦行来改变自己的性格：到少林寺学习中国功夫。那时，河南郑州的外国人还很少，少林寺外面的小卖部，只有一家可以买到可口可乐，还是放了好几个月的。

马修在少林寺待了两年，取中文名包默斯，和他一起习武的和尚，都开心地称他为“老包”。马修学习了套路，并跟随一个全国散打冠军练习了几个月的散打。当他回到美国时，他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人。2003年，在北京非典期间，他再次来到中国，重访少林寺。和中国所有的地方一样，10年时间，少林寺发生了巨变，它已经从一个破败的并有点混乱的习武场所，变成了一个规范现代的旅游景区。

这一年，马修开始为美国《在线》杂志写有关中国旅行、文化的专栏，少林寺成为最主要的主题。2007年，他出版了《American Shaolin》一书，2014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推出，当时这本书有个很长的书名《和尚、飞腿与铁裆功：一个美国人在新中国的奥德赛》，这样的书名有哗众取宠的味道，显示出出版社要极力讨好读者的态度。但从2003到2014，又是一个10年，在当代中国，10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时代，因为其变化的丰富性，往往会让人感到陌生。

最终，正式的书名为《少林很忙》。这是一个不准确的翻译，却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少林寺最近30年的历史。30多年来，少林寺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从寺庙的修缮和僧众生活的改善来看，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最终，正式的书名为《少林很忙》。这是一个不准确的翻译，却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少林寺最近30年的历史。30多年来，少林寺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从寺庙的修缮和僧众生活的改善来看，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2005年，中国武僧，巴黎授课。图为释恒君法师，祖籍山东曲阜，6、7岁就开始习武。18岁时正式入河南嵩山少林寺，少林寺武僧十八罗汉之一。图/CFP

忆少林寺习武生涯的时候，已经离开少林寺 10 年了，很多事情未必完全真实，但是他选择的细节，即使有一些再创造的成分，仍然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高材生眼中或心中的少林，这样的少林形象，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一个结果。

❖ 从普林斯顿到少林寺

1992 年，马修乘坐大巴车从郑州赶往少林寺，他最害怕的不是陌生的环境，而是中国公路混乱的交通状况。拖拉机、半拖挂车和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在路上同场竞技，为了超车司机可以随时逆行。到了少林寺，他看到的景象是：

轿车和旅游大巴堵在通往停车场的大门前。几十家小饭馆密密麻麻排在路的两边，都是些简

陋的危房，四壁都是裂缝的水泥和支离破碎的灰泥。还有几十家屋顶是波浪状石棉瓦的小屋，专门贩卖功夫饰品。驴车在停车场的门口等着招揽买卖，拉游客去八九百米外的寺院。那儿有更多当地企业家编造出来的创造性景点：一架二战时用过的拉货飞机；或者能看见一具至今已有两千年的木乃伊，其实不过是只死猴子……

这样的景象，如今可能只能在一些县级城市新开发的所谓景点才能看到，但是在当时，却是少林寺周围环境的真实写照。上世纪 80 年代，少林寺重新修缮，一些文革中被毁坏的建筑物得到重建，到了 1989 年，作为一个旅游中心，少林寺重生了。在当时，普通中国人还没有旅游的观念，当地政府也没有旅游管理的经验。少林寺外杂乱的场景，是 80、90 年代小商品经济最初发展的真实写照，做生意的都是少林寺附近的村民。但是，

2014 年 11 月 25 日，伦敦，少林功夫伦敦塔桥一展英姿，登陆孔雀剧院美名远扬。图/CFP



少林寺外有不少教武术的机构，这些机构和少林寺的关系都比较复杂，教练多半是出自少林寺，也借重少林寺的品牌效应，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属于少林寺管辖，不管是在行政或经济上，都是独立的民营企业。

在最初起步的时候，少林寺还是有一点国际眼光，马修要去学武术的武术中心，专门有一个“国际事务办公室”，他们知道，随着影视文化的普及，不少外国人将来这里消费。

少林寺外有不少教武术的机构，少林功夫大学、少林武术学院、少林武术和功夫学校等等，这些机构和少林寺的关系都比较复杂，教练多半是出自少林寺，也借重少林寺的品牌效应，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属于少林寺管辖，不管是在行政或经济上，都是独立的民营企业。在当时，这些机构总共训练着一万多名中国男孩，只有极少数女生。每人一年要交 800 元左右的学费，全天练习功夫，每周休息一天。

马修选择的是“少林武术中心”，因为他观察到，这里有少林和尚在进行精湛的功夫表演，显得更为“正规”，作为外国人，他被要求一个月支付一千三百美元，包括宾馆房间和单独的伙食费，这几乎是他身上所带的全部现金，因此他只好要求按月支付。“少林武术中心”的建筑，看起来很像旅游中心，比起别的功夫学校，更宏伟也更正式。事实上，武术中心就是河南省政府在 1989 年开发的旅游中心，负责武术表演和对外交流，并有包括宾馆和餐厅在内的一系列服务设施。武术中心的领导，也是少林寺出身，如今他们成了政府工作人员，这里的教练们都从政府那里领取工资。10 年后，马修再访少林寺，别的武术学校都被清理了，但是少林武术中心仍然还在那儿，甚至规模更大，它拥有几个表演团队。

对学武术的人来说，即使在地理的意义上，少林寺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沿着少林寺外的路往东走，一直走到小路与公路的连接处，有一个塔沟武术学校。马修去看的时候，那儿只有一排瓦房，连院子和大门都没有。这所学校是塔沟村的老拳师刘宝山于 1978 年创办，如今已是可以颁



发学历的正规学校，并拥有自己的官网，它的学员还几次参加了央视的春晚。马修在练习散打的时候，塔沟武校的一个师傅曾经上门挑战，但是被马修击败。

当时的少林寺，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生态。1992年，释永信还没做方丈，但已是少林寺的实权人物，下一任的方丈人选。释永信组建了少林寺自己的武僧团队，打造正规的、货真价实的少林武术表演，他面对的就是山门外江湖的挑战。当时的少林寺，已经有意和这些“杂牌军”保持距离，一个证据是，即使是少林武术中心的学员，想进入少林寺参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负责把门的工作人员，仍要求他们出示门票。

1993年，经过两年的艰苦训练，马修已经成为散打高手。他的师父，书中称为“承师傅”，是少林寺出身的全国散打冠军。师父发现，这位身高1米92、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洋弟子，领悟和学习能力比一般学员要高很多。他总结出，这是文化的力量：一个有文化高智商的人，学武也是很快的。最终，他让马修参加于1993年秋举行的郑州国际武术邀请赛。非常有趣的是，马修不能代表武术中心比赛，政府希望他能作为外国人参赛，这样能凸显比赛的国际性。于是，也许是运动会中最奇葩的一幕出现了：马修代表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代表队”，并举着这样的牌子入场了。这个代表团，只有马修一个人，毫无疑问，他也没有征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同意。

马修参加的项目是国际散打比赛，比赛只有三轮，一个韩国选手和一个日本选手比，韩国选手取胜，和马修比赛。马修轻松击倒韩国人，他接下来的对手是来自武汉的中国散打冠军。他必须失败，因为冠军的水平本来就高于马修，而比赛的性质，也要求中国选手必须赢。这让人想起现代历史上，那些和外国人比赛的拳师，比如霍

于是，也许是运动会中最奇葩的一幕出现了：马修代表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代表队”，并举着这样的牌子入场了。这个代表团，只有马修一个人，毫无疑问，他也没有征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同意。

元甲，但即便是到了1992年，中国人和老外对打，仍然让观众兴奋异常。全场响起“打死他”“打死他”的吼声，马修的汉语水平很高，他听得懂这些声音背后的东西。他拼尽全力，最后仍然失败了，获得了亚军，当地报纸还刊登了他举起银牌的照片。对马修而言，这失败仍然是一种成功，因为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惧，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那个从小害怕和同伴打架的马修，因这样一场比赛而彻底消失了。



❖ 移民

在到少林寺的第二天晚上，马修到演出大厅考察，成浩、德清两位武僧在那组织大家练功，后来他们成为马修在少林寺最好的朋友。看到马修，大家马上围了过来。因为马修是美国人，他们要问马修一个敏感的问题。

国外的生活，是一个敏感话题，也让这些和尚充满好奇。不久之后，德清就来找马修咨询，到日本演出，顺便卖几把剑是否可行？定价多少才是合适的？这样的话题让马修吃惊，和尚怎能想挣钱的事？事实上，像成浩和德清这样的佼佼

者，一直向往移民，到国外创出一片天，或者“弘扬少林文化”。

马修再度来到少林寺的2003年，成浩已经移民去了休斯顿，在那里开了一家武术工作室。原来队里的另外两个稍逊他一筹的队员和他一起，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在这三个少林和尚的努力下，休斯顿成为了和纽约相媲美的少林文化的代表城市。1992年“出走”的严明和郭林，在纽约曼哈顿的闹市区和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分别开了各自的武术学校。当时，少林武术中心唯一能做二指禅表演的礼鹏也在纽约做武术教练，他先是到了荷兰，在那里建了一所很大

📌 1996年4月，河南郑州登封，欧洲少林弟子在嵩山。图/单晓刚/CTPhoto/FOTOE

的学校，后来和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女士结了婚，便到了纽约。武术中心的经理感叹：“竟然娶了一个比他大的美国女人……乖乖。”

马修最好的朋友德清，当时是武术中心的偶像级人物，他的移民之路比较曲折。他用尽浑身解数，只移民到了匈牙利，在那里为特种部队做武术指导。2000年的时候，他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海外少林文化专题片的拍摄，剧组允许他带两名嘉宾，他就带自己的母亲去美国玩了一圈，“多少也算是不坏的慰藉了”。

1992年，当马修向这些和尚学习功夫时，这些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尽管是少林和尚，他们仍然像普通人一样有着各式各样的梦想。据说，有一个漂亮姑娘，特别爱德清，但是最终只能哭着离去，因为德清不能给她什么承诺。在德清的心目中，一直渴望能像李连杰一样，成

为功夫巨星。虽然他最终也没有成功，但是为此而走过的旅程，却也不是毫无意义。

僧人的移民，可以说是少林寺走向国际化的一个侧影。2000年后的少林寺，到外国表演和推广的次数越来越多，而到少林寺来旅游参观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从郑州到少林寺，已经通了高速公路——和别的著名景点一样，少林寺景区的旅游管理和秩序也越来越规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少林的国际化也是中国经济文化开放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的《北京人在纽约》中所反映的那种艰辛的打工生活，到如今的国人到世界各地疯狂扫货，对普通人来说，出国成了件普通的事情。

❖ 马修眼中的释永信：强人与争议

马修的书里写了这样一件事儿：

一天，一个叫云飞的俗家弟子告诉马修：“你应该拜个师父，成为一名少林弟子。”

“承师傅就是我师父。”马修答道。

“他是你的教练，但他已经不是和尚了，你应该从寺里找个和尚，然后拜他为师。”

“那我选谁好呢？”

“我的师父是永信大师。”

在马修眼中，释永信是寺里最有能耐的和尚，但也是最惹人非议的。马修这样写道：他（永信）有辆奔驰轿车，还雇了私人司机，这辆车是北京一位大人物送给他的。永信一离开少林寺就是好几个月，忙着在外建立关系网。只要有北京的贵宾来到少林寺，都是永信作陪。他最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他找了一群会武术的和尚组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想与武术中心竞争去国外巡演的业务。

云飞告诉马修：“等到永信当了方丈，他就会利用‘关系’，把少林寺的管理权夺过来。”马修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



拜师的经过,马修写得很详细。核心的一点是,按照当时的“潜规则”,他给了释永信一个红包,里面有1111元人民币:

“他(释永信)请我坐下,我按照云飞(介绍人,释永信弟子)的指示,事先准备了一个红包。云飞告诉过我,要给师父红包以表敬意,钱的数目随意,但中国的迷信观念认为一些特殊数字预示大吉大利,特别是888和1111,然而云飞却让我自个儿决定是给美元还是人民币。我不禁有些窘迫,我在中国这么久了,知道一美元可以换八块人民币,于是我便在红包里装了1111元人民币(约合一百四十美元)。永信接过红包,往桌子上一扔,好像红包是令人不快的多此一举。传言说他腰缠万贯,等打开红包时,他肯定会觉得这点小钱微不足道……”

马修心中的释永信,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强人,

2003年他重回少林,这样感叹:“与其他人不同,永信有独断的决心和密集的关系网来进行必要的革新,在过去几年中,他找来一些人做他的标靶兵(有传闻说他们是花重金请来的),这些人只听命于永信一个,他们来到村子里,驱赶当地的商人,拆除他们的房产。”

马修这样的叙述,很可能来自于村民的道听途说或夸张演绎,但是,2003年的少林寺和1993年确实大为不同:“除了寺庙,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所有为游客提供餐饮的搭建建筑,所有屋顶用铁瓦楞搭起来并销售功夫主题小玩意的棚户区,以及几乎所有的私立武术学校,都已不复存在”。1999年,老方丈去世,如众人所料,释永信接替了他的位置。“释永信认可当地人的想法,少林的名誉深受旅游业所害,市场经济当然更适合少林寺,但也太过俗气。”



这是一个悖论。如今，人们对释永信的非议，恰恰是少林寺过度的商业化造成的，但是在马修的叙述中，释永信却是反对过度商业化的。或许，马修的理解还比较肤浅，90年代初的少林寺商业化，是小商品经济，那种混乱的、不正规的小商贩，其实阻碍了少林寺的发展。如今，人们经常讨论的是，少林寺是否会上市等等，是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商业化，而且，少林寺作为一种资产进行运营，是历史上就有的事，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2014年，马修的《少林很忙》中文版推出后，有媒体报道了马修是释永信的弟子。但少林寺官方曾对此予以否认，说马修既不是释永信的弟子，释永信也没有教过他武功。

少林寺的否认，说明少林寺在应对新闻热点方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办法。^①

(本文参考资料《少林很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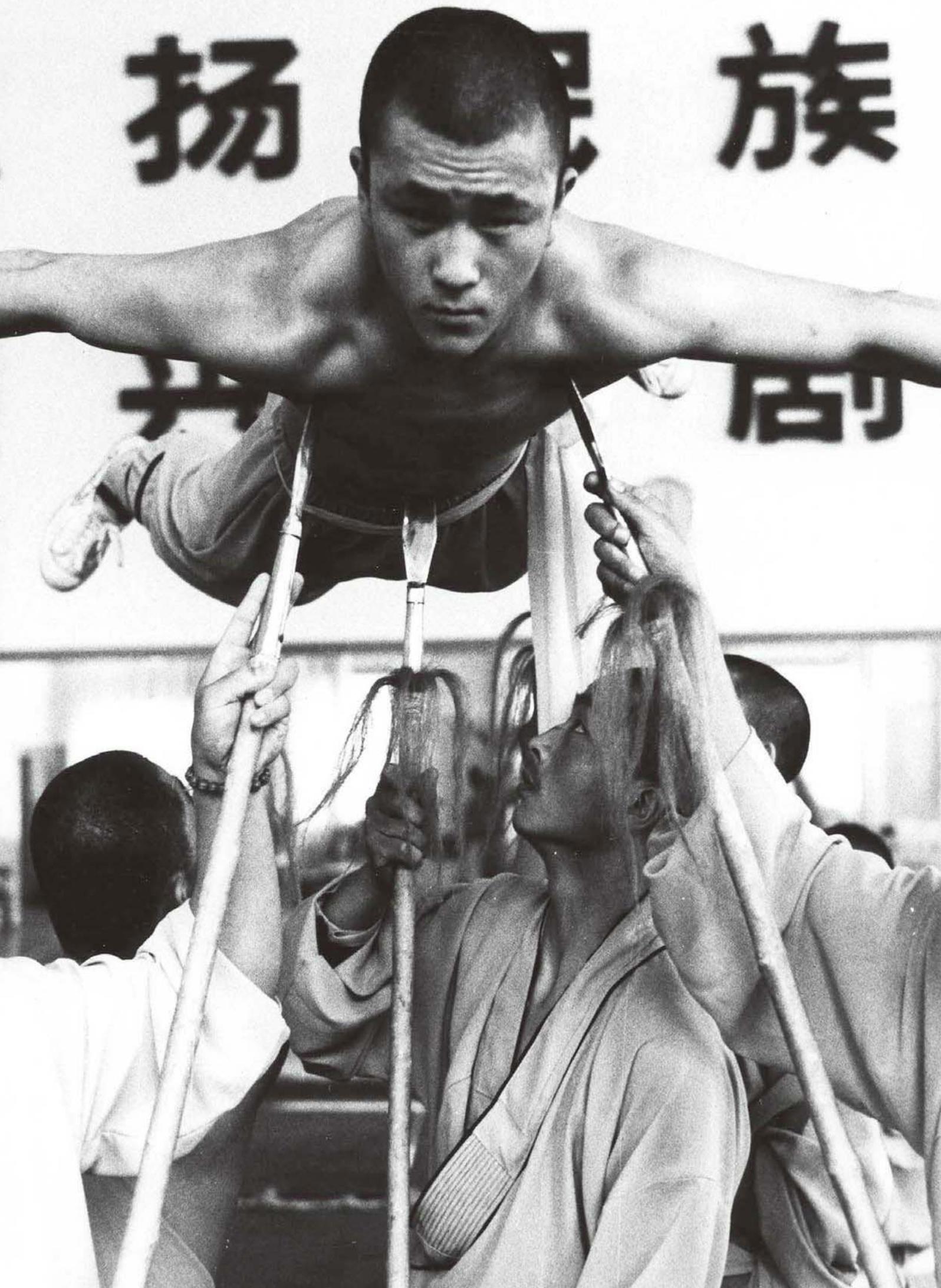
2009年11月21日，少林寺武术总教头释德扬和小选手一起观看比赛。当日，第二届国际传统功夫和竞技武术锦标赛，由国际禅武联盟总会主办，匈牙利布达佩斯国家体育馆(Nemzeti Sportcsarnok)。图/顺戈/FOTOE

1996年4月，河南郑州登封，少林寺武僧练武。图/单晓刚/CTPphoto/FOTOE

如今，人们经常讨论的是，少林寺是否会上市等等，是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商业化，而且，少林寺作为一种资产进行运营，是历史上就有的事，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扬 族



史上最大劫难· 1928年火烧少林

文 / 黄小凡

民国初年，少林寺有僧众200多人，土地1370余亩，但是，迫于当时形势，少林寺仍日趋衰落，度日艰难。军阀混战，土匪肆虐，当时的恒林和尚为保护少林寺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因此种下了祸根。

在长达1500年的历史中，少林寺遭遇过很多次劫难。封建时代，每逢一个朝代没落，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减弱，民不聊生，少林寺就很难独善其身。少林武术很难抵挡“山贼”的骚扰，如果碰到大规模的流寇，寺里的僧众往往会逃散，建筑被毁，也是常有的事。

少林寺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毁、不断重生的历史，当然，这是指物质意义上的建筑而言。少林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精神力量，却是时局难以斩断的。所以，等到局势缓和，僧众又会回来，天下太平，政府有余力，又会帮助修缮，于是，少林寺就又恢复了生机。

在所有的劫难中，1928年军阀石友三火烧少林寺，或许是最严重的一次。1928年，中原地区正处于军阀混战，枪炮日渐普及，冷兵器时代的功夫，很难阻止军阀粗人的恶行。这一次劫难，也是最典型的：一些少林弟子加入了军阀的部队，想通过武功建立功业，最后却为少林寺带来了空前的劫难。这让人想起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事迹，如果不参透历史大势，不站在正义的一方，武术也很难带来善果的。

恒林

民国初年，少林寺有僧众200多人，土地1370余亩，但是，迫于当时形势，少林寺仍日趋衰落，度日艰难。军阀混战，土匪肆虐，当时的恒林和尚为保护少林寺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因此种下了祸根。

恒林（1865-1923），武艺高强，民国初年，由于政府很弱，无暇顾及少林寺，就任命他为“少林寺保卫团团总”，属于地方民团性质，恒林只好购置枪械，训练僧兵，以备不虞。这实际上是

少林武僧的武装化，从练武术到操枪械，实力当然是大大增强，对抗小股土匪是绰绰有余，但是如果卷入大规模军事冲突，就非常危险了。

1920年，豫西大旱，土匪横行，恒林在登封县城、白玉沟等地与土匪激战数十次，打落“肉票”多人，这些战斗缴获的枪支弹药，都运回少林寺储存。恒林因为善战而威名远播，土匪不敢来战，也为少林寺周边地区争取了一小段和平日子，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张凤台授予恒林奖状、奖章，并对少林寺送匾以示谢意。1923年，恒林病逝，第二年，附近有300民众捐资为他立碑。至此，可以说恒林武师生涯，得到了民间的肯定。

恒林死后，他的弟子妙兴接替少林寺保卫团团总的职务。恒林还有一个徒弟叫樊钟秀，也是一个奇人。妙兴和樊钟秀，最终让少林寺陷入一场大劫。

樊钟秀

樊钟秀原名铎，别号醒民，河南宝丰人。少年时代即进少林寺，拜在恒林方丈门下学习武艺。清末河南土匪横行，学习武艺是当地人们自我保护的一种必要手段。稍后，樊家为避匪患迁到陕北洛川。陕北从清末左宗棠西征之后，迭经战事，人烟稀少，豫西人民多有迁徙至此，在电影《1942》中，饥饿的河南人，迁徙目的地也是陕北，即使在现在，陕北也有很多人祖籍是河南。樊钟秀身怀武艺，年轻气盛，因练民团成为新移民中的头目，得到陕西督军陆建章的赏识，他又团结陕西豫籍军人会党，与靖国军合作，独树一帜，号为靖国二军，护法成功，樊钟秀声名鹊起，孙中山先生招他到广州，亲自嘉奖他，并委任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北伐之中，建国豫军是革命同盟者，与国民联军的石友三部，本是战友。冯玉祥由陕入豫，

在樊钟秀看来，他资格很老，不但石友三不配作为他的对手，即使冯玉祥、蒋介石也算是后生小子。而豫西宛洛之间，本来应该是樊钟秀的地盘，他的子弟兵，基本全是宝丰、郟县、鲁山、汝州一带的土著。

率先派人和樊钟秀联系，意在收编。那时候的冯玉祥，挟武力逼退三任北洋总统，且占有陕、甘、豫大部分地盘，又新从苏联归来，获得了大量武器补充，兵强马壮，有雄兵四十万，而樊钟秀虽然领有建国豫军的招牌，所属皆陕北豫西的河南老乡，人马不过万人。但樊钟秀自恃是靖国功臣，建国豫军的招牌又是中山先生亲赐，无意归附，最终，这种意气之争让他倒向了军阀吴佩孚。所以建国豫军和冯玉祥国民联军石友三部，首先围绕着豫西宛洛的归属，弹矢相向了。

（左图）1984年8月15日，少林寺德禅法师（1907年—1993年），幼年家贫，七岁出家少林寺，曾目睹军阀石友三焚烧少林寺，并亲手抢救出很多少林寺典藏书籍。曾任全国佛协理事、河南省佛协副会长，少林寺名誉方丈。图/重力男/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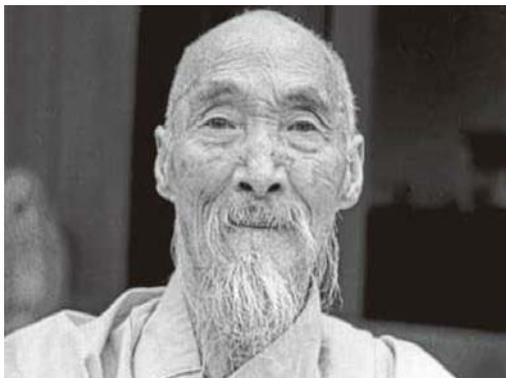
妙兴

妙兴（1891-1927），家境贫寒，8岁就到少林寺拜恒林为师，苦练武艺，人送外号“金罗汉”。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师长张玉山到登封，想收编陈青云、任应岐的部队。这时，樊钟秀在张玉山手下做团长，他路过少林寺，看到大雄宝殿残破，便承诺修缮，因为军务繁忙，他先捐了400元购买物资，少林寺的人对他很有好感。1923年，吴佩孚受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玉山奉命在河南招兵买马，

似乎有某种必然性，他发现了妙兴。妙兴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有人有枪，妙兴成为张玉山麾下第一旅第一团团长，正式加入了吴佩孚的军事集团。

1926年，广州革命军开始北伐，冯玉祥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革命军。吴佩孚联合张作霖，攻打冯玉祥，但是被冯和北伐军击败。1927年，冯玉祥占领西安，配合北伐军攻打河南，妙兴所在的吴佩孚手下第一团，奉命调往郑州，又转战舞阳，3月6日，在与冯玉祥的部队交战时身亡，年仅37岁，妙兴的遗体由弟子运回少林寺，葬于寺东北的山坡上。



1928, 大火

那时候北伐战争炮火刚熄，石友三部作为西北军驻防宛洛，并兼任洛阳警备司令。石友三属于冯玉祥国民联军编制。在河南，它的主要敌人是直系吴佩孚部队，奉系张昌宗部，以及在冯玉祥和吴佩孚之间摇摆不定的镇嵩军。

若要对比兵力，樊钟秀本不足与石友三颉颃。石友三国民联军第五路，人马近6万，久经沙场，而且又刚刚战胜奉军，锐气不可当，连冯玉祥对

石部的骄兵，都紫执乏术。樊部兵马不过万人，除了骨干之外，多数还是新招的豫西土匪。那么樊钟秀为什么要以卵击石呢？

在樊钟秀看来，他资格很老，不但石友三不配作为他的对手，即使冯玉祥、蒋介石也算是后生小子。当初樊钟秀崛起陕北，树立靖国军旗帜的时候，北洋军和镇嵩军都非其对手。而豫西宛洛之间，本来应该是樊钟秀的地盘，他的子弟兵，基本全是宝丰、郟县、鲁山、汝州一带的土著。

除此之外，樊钟秀还有地利之便。当时在河

（右图）石友三（1891 - 1940），字汉章，吉林长春农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称为“倒戈将军”。图/FOTOE

南的军事地图上，还活跃着三种不可小觑的地方势力。第一种就是豫西深山的土匪，第二种是地方民团，第三种是民众组织的红枪会、金钟罩等带着迷信组织的会党。红枪会宗旨在自保，其武器装备可以不论，其他的地方势力，与樊钟秀部皆是友非敌。樊钟秀的部下，多半出身豫西深山，他们本无特别的宗旨，当兵或者为匪，全凭利害形势决定；至于民团，樊钟秀的师父——少林方丈恒林，就是登封地方民团的团总，恒林死后，继任的妙兴、妙全都是樊钟秀的师弟，在地方民团中更有莫大影响力。

1928年3月，樊钟秀与石友三开战之前，樊钟秀把指挥部驻扎在少林寺内，此处久为地方武力的中心，通讯和指挥皆方便顺畅，更可以得到民团的协调合作，自然是理想的司令部了。在少林寺方面而言，樊钟秀既出本门，又是能够在全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叫得响的人物，能引为护法，光大宗门，当然再好不过了。

占尽了地利的樊钟秀，尽管有民团的协助，也不是石友三的对手。除了众寡不敌之外，关键的因素是石友三部队武器精良，都是从苏联新运回的枪炮。樊钟秀部队的装备，多系汉阳造和土制枪炮，根本不是对手。双方激战正酣，少林寺僧在嵩山之南十八盘，借助地势阻击石友三部，樊钟秀退往嵩县深山。

3月15日，得胜的石友三进驻樊钟秀设在少林寺的指挥部，纵火焚烧法堂。次日，驻防登封的国民军苏明启旅，命军士抬煤油至少林寺中，将整个少林寺付之一炬。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钟楼鼓楼等重要建筑，都陷入火海之中，大火烧了四十天，只剩下几根石柱遥望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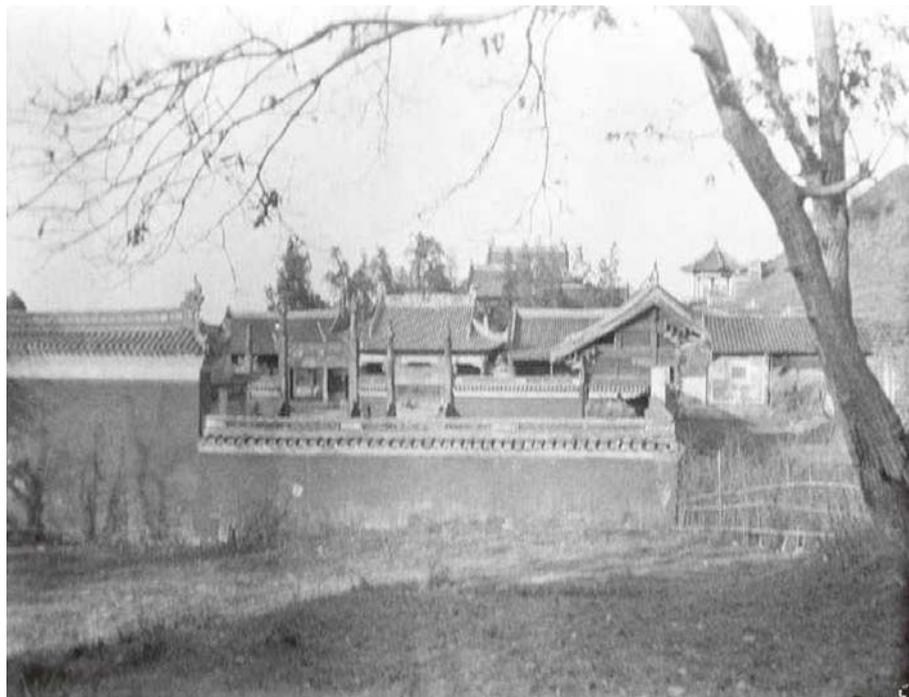
在那样的时代，樊钟秀和石友三，作为大军阀的马前卒，不管多么英勇善战，最终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抗战之前，他们都死于军阀的混战，他们的死，无法和民族正义联系起来，最

终湮没无闻。1936年，蒋介石到少林寺参观，随行的登封县长毛汝采向他介绍了少林寺被烧的事情，蒋介石说：“石友三也够坏了”——这话耐人寻味，因为有证据表明，石友三虽然也算是国民革命军出身，但始终摇摆在各种势力之间，最终被蒋介石派人除去。

1928年少林寺的大火，可以理解为少林寺的一次转折。单个人的武术再强大，也不是现代枪炮的对手，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下，人命如草芥，少林僧众也不能例外。作为个人，如果不能看清历史大势，急于跟随军阀建功立业，最终得到的只是毁灭。对一个寺庙来说，可以从这场劫难中得到一些教训，但是，少林寺要迎来自己真正的涅槃，则是几十年后的事了。^①

（本文参考《当代少林十讲》《少林历史与文化》）

① 1917年 - 1919年，河南登封，少林寺。
图 / 西德尼·甘博 (Sidney Gamble) / FOTOE





我们知道的少林寺，大多来自金庸小说。作为武林中最有存在感的门派，少林有扫地僧，有藏经阁，有神乎其神的佛家武学，也是名门正派，天下武林大会的主持者。那么，武林至尊，是如何养成的呢？

少林的价值··

武林至尊·养成记

文/王月

2001年，河南登封，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参观少林寺时与僧人们合影。图/萧律/FOTOE

❖ 少林寺“中兴”：电影《少林寺》

少林的故事，从“十三棍僧救唐王”开始。李连杰的《少林寺》，正是以此延展开。上世纪80年代，大家还没看过金庸，身怀绝技的少林和尚李连杰一出，所有人都觉得，少林武功真是太神奇了。

电影《少林寺》有多火呢？当时电影票价还是一毛钱一张，《少林寺》的累计票房就高达一亿以上。而作为第一部在香港地区上映的内地功夫片，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少林寺》也在香港创下了1616万港币的超高记录，一举打破香港功夫片历史最高卖座记录。

于是，少林寺也火了。在电影放映之前，少林寺已沉寂数年，甚至在登封，很多人也不知道这里还有座叫少林寺的寺庙。但很快，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就登上少室山，踏破了少林寺这座千年古刹的门槛——它，已经衰落很久了。



少林寺的“中兴”，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不过，对于港台地区观众而言，少林寺这个名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事实上，在这部电影之前，已经有太多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刻画过少林寺了，他们对少林寺真是闻名已久了。

在电影中，李连杰进入少林寺，削发为僧，法名“觉远”。觉远这个和尚确实很神奇，他最早载于1915年出版的《少林拳术秘诀》。书中说，他是宋末元初的少林寺僧人，参考了当时中国的各种武功，尤其是拳法，加以吸收整理，并制定了少林习武的戒律，被称作南少林拳法的中兴之祖。

不过，这本看似是武功秘籍的书，却更像是本小说。觉远和尚并没有出现在历史中，应该只是虚构人物。从清朝末年开，各种以少林寺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出现在南方，少林的名气，就开始在普通民众中越传越大了。

❖ 神秘的藏经阁

十九世纪的中国，还没有“武林”这个概念。自古以来，“武林”要么是山名，要么是地名，别无他指。要说跟江湖相关的，只有个“绿林”。但绿林只有盗，没有侠，这便有武侠小说家官白羽从“文林”（泛指文化界）获得灵感，创出了“武林”这个新词，用以通称武术界。

武侠小说于是兴起。在众多武侠小说中，少林寺存在感比较强，虽然没有一统江湖，但也算得上一个头号门派。卧龙生首先给出了“武林九大门派”的设定，第一就是少林。这在古龙小说中又变成了“七大门派”，还是以少林为首，金庸则是“六大门派”，少林为首。

由少林来当这个领头羊，主要有两点考虑。首先，少林武功出名，家大业大。其次少林位于中原，被各大门派环绕，算是武林正统。不过，在很多武侠小说里，少林地位虽然崇高，但戏份



并不多，多半是个重要的配角。可能是受和尚没办法谈恋爱的限制，梁羽生甚至就不爱写少林，而喜欢找武当的俗家弟子来当主角。

少林寺真正封神，是在金庸这里。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天龙八部》中那个著名的扫地僧。一个隐居于少林藏经阁，日常功课是扫地的老僧，在少室山上的武林大会上，轻松收服老妖怪萧远山、慕容博，并且能识破各人练功的破绽，所以能在各大网友评选的金庸武侠人物武功排行榜名列第一。

随着金庸小说被翻拍成各种电影、电视剧，人们越来越热衷谈论少林寺的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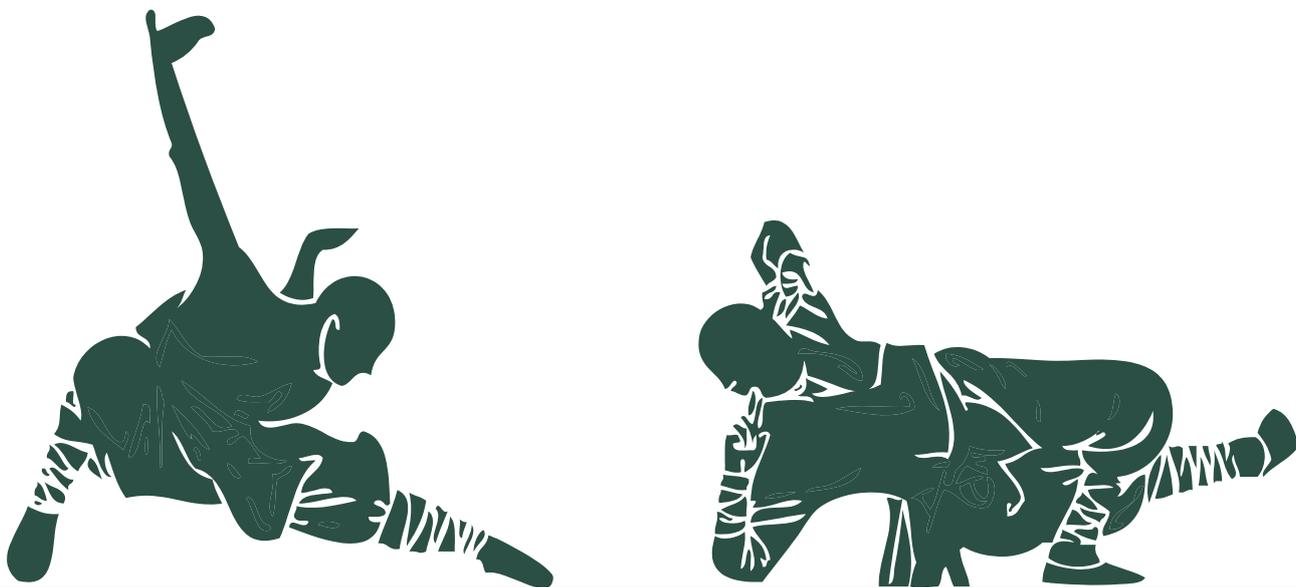
《易筋经》不必说，只要学会就能稳稳排进江湖前十。少林七十二绝技也不用说，几乎成为了武功高低的量化标准。少林七十二绝技传说为达摩所创，达摩自然就是古今天下功夫第一人，其次就是扫地僧了，他整天在藏经阁扫地，看了几十年武功秘籍，会的绝技自然不少。

金庸笔下的觉远，也是藏经阁的受益者。在《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里，书中的觉远，是少林寺藏经阁中管书的和尚，也是张三丰的师父。

注意了，金庸小说中的藏经阁，是收藏各种神奇武功秘籍的地方。所以觉远在这里管书，真是美差，哪怕他甚至不会最基本的武功，但每天背经，都能在无意中练就了深厚的内功，打败“昆仑三圣”何足道。而觉远在圆寂之前背诵的《楞伽经》的内容，也成为了峨眉、武当的镇派绝学。

在各种有关少林的影视作品中，也在极力渲染少林寺的武功。《少林足球》里的少林足球队，凭借功夫勇夺冠军；《方世玉》里的方世玉，凭借南少林的武功独闯刑场，救出老妈老爸；甚至在看似和少林关系不大的《食神》中，少林寺十八铜人也会出场，暴打男主角之后，还要教会他高深的武功，用来做菜……

于是，在人们的眼中，武功就成了少林寺的大部分。



❖ 少林僧兵

历史中的少林寺，首先应该是一个僧人在此生活的地方。

世人以为，寺庙这么清静高雅的地方，每天念经参禅就好了。殊不知僧人也是要吃饭的。饭从哪里来？只靠信徒捐献，并不能保证顿顿有饭吃。但僧人去种田，又不够专业，也没有时间。所以最初，寺院是享受国家免税政策的，种地很划算，自己不种，也可以找佃户来种。

《天龙八部》中，乔峰的养父乔三槐就是少林寺的佃户，他们一家住在少室山，租种少林寺的地，所以跟少林寺关系紧密，所以当年少林寺要把乔峰送给他们收养。

既然免税，除了让佃户种地，操作空间还很大。寺院周边有地的人会来把地“寄放”在寺院里，定期给寺院钱，这些地就不用上税了。寺院拿到钱，有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买地，买商铺等等。所以说，僧人练武，既是为了强身健体，也是为了保护寺产。

“十三棍僧救唐王”之后，李世民赏赐了大量田产扩建少林寺。少林寺的地产越多，武僧也就越多。当时寺内僧人有两千之多，其中武僧就有五百余名，被民间传说为“五百罗汉”。

唐代以后，寺庙要么是只免地税，或者只免丁税（每个成年男子必须缴纳的人身税），总之限制多。所以，少林寺的僧兵，最多的时候也就500人，相比日本比睿山的2万僧兵，实在不多。

不过，以上这些，不够浪漫，太现实了，所以也就被影视作品直接忽略掉了。影视作品这样做，也无非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

试想，你愿意看一个青年满世界打架斗殴，勾搭妹子，结交损友，在各种地方搅局，成为一代大侠，还是愿意看到一个和尚在寺院里念经诵

佛，生火做饭，面壁独思，与人论禅，用慈悲化解武林矛盾，当上主持，功德圆满呢？

❖ 被忽略的禅意

禅，也被影视作品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少林寺被誉为中国佛教的禅宗祖庭。公元527年，印度高僧达摩大师到少林寺后山面壁九年，首倡禅宗，并广召信徒，弘扬禅法。

其他的寺院，很多人认为练武就是练武，参禅就是参禅，但少林寺主张禅拳合一。对于少林僧众而言，修炼武术其实是一种修行方式，亦是明心见性。



这段少林僧兵南下抗倭的历史，跟立雪断臂、衣钵传慧可、六祖慧能、木棉袈裟这类，有禅意的故事一样，也被大多数影视作品忽略了。

但可惜的是，在绝大多数影视作品里，少林只有武功，没有这层“禅意”。最喜欢谈佛的金庸，在谈佛最深的《天龙八部》里的表述与此也有些出入。书中的扫地僧武功高强的原因，是因为他佛法高深，练武功有戾气，只能用佛法化解。那么，练一项绝技，就要多读几本“纯粹”的经书。

既然练武是为修行，不为与人打斗，所以可以理解，少林武僧的实战水平，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高。在明朝以前，少林以棍法闻名天下。不过，后来抗倭名将俞大猷路过少林，观看寺僧练棍，就觉得其棍法实战性不强，“传久而讹，其诀皆失矣”。他便挑了两位僧人跟他到军中习艺，要他们“转授寺僧，以永其传”。

随之便是少林僧兵南下抗倭。此前少林僧兵实战机会并不多，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入侵，少林僧兵就有了抵抗外侮的机会。嘉靖三十二年，倭寇从海上进犯杭州，少林天真、天池和尚率领僧兵四十人，大破倭寇，其后，又有少林天员和尚在苏州率领僧兵八十四名、月空和尚在杭州率领僧兵十八名参与了几次战役，有胜有败，战果不算辉煌。

这样，这段少林僧兵南下抗倭的历史，跟立雪断臂、衣钵传慧可、六祖慧能、木棉袈裟这类“有禅意”的故事一样，也被大多数影视作品忽略了。

而后，内家拳开始兴起。内家拳是导引运气理论与武术的结合，简单来说就是注重内功，要练气。最早这是一些民间教派的发明，发展开来大家就一起来练气功了。

这时的少林寺，也从注重棍法转向，开始研究拳法。他们吸收了道教的气运学说，形成了一套配合少林刚猛拳风的内壮理论与内功功法，又将很多地方性的拳法收集起来，归纳整理成一套完整的少林拳谱系。这便有了“天下武功出少林”。

这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南拳北腿”中的南

少林拳法。而有关少林的影视作品，多半与南少林有关。

拍得最多的，就是火烧南少林的故事。据传清朝皇帝就派兵将少林寺焚毁，众僧大多惨死，仅仅逃出了五个人，其后便投入反清复明的洪流中。这五个人，被称为“少林五祖”，而在天地会（也称洪门）内部，则尊称为“洪门五祖”。

光是以《火烧少林寺》为题的电影前后就有三部。而开创中国武侠片之先河的《火烧红莲寺》，也是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展开——清廷借口少林寺造反，派铁甲兵火烧寺院，俗家弟子方世玉救出师叔仓促逃亡……

不过，这个被火烧掉的南少林寺究竟在哪里，目前还没有定论。有的说在福清，有的则说其实在莆田。但这些地方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一带正好是天地会的发源地。

天地会（也称洪门）起初的性质是社会下层人士异姓结拜搞起来的秘密结社，因后来遭官府严酷镇压，反清才色彩日趋浓烈。

天地会想要壮大，就正好拿少林武功做宣传，便极力渲染少林武功的神奇。随着天地会以及其各种分支在南方沿海地区的扩散，从小说到电影，关于少林的故事便越来越多。

譬如方世玉的故事。这个最早出现在《少林小英雄》《万年青》《乾隆游江南》等清代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修炼的就是南少林五行拳，传说14岁就打死了恶霸雷老虎，后来经过各种小说、电影的演绎，功夫更是有增无减，最后直接成了“功夫皇帝”。

在影视文化造成的这种印象中，少林寺的各种武僧团，少室山下的武术学校也应运而生。多少人怀着武侠梦来到这里，而禅意，却被有意无意的弱化掉了。不能不说，这是“尚武崇德”的少林精神在传播中的一个遗憾。^①



热历史

Hot History

80年前的 “西康”光影

热历史版块编辑：黄弋
邮箱：klsbjhy@163.com

西康省，中国旧省名，是在现今中国行政地图上消失了一个省份。它设置于1939年，省东界四川，南界云南、印度，西界西藏，北界青海。

1929年8月17日，西康民众公呈当时的国民政府：“为西康警报频来，危亡已在眉睫，特恳迅派负责人员组织西康省政府，以图挽救事。”然而此后几年，西康建省一事仍无着落，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终于把长期以来的建省计划提上了日程。1938年12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撤消建省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刘文辉任主席。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成立。这时的刘文辉已不是昔日的“四川王”，与刘湘一战，他退守到川西，一度消沉，但却为西康建省颇为努力。

曾经与世隔绝的西康地区让世人充满好奇，一大批学者加入到了对西康的考察和研究中。20世纪30至40年代，我国早期的摄影家庄学本和孙明经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先后地进入了大横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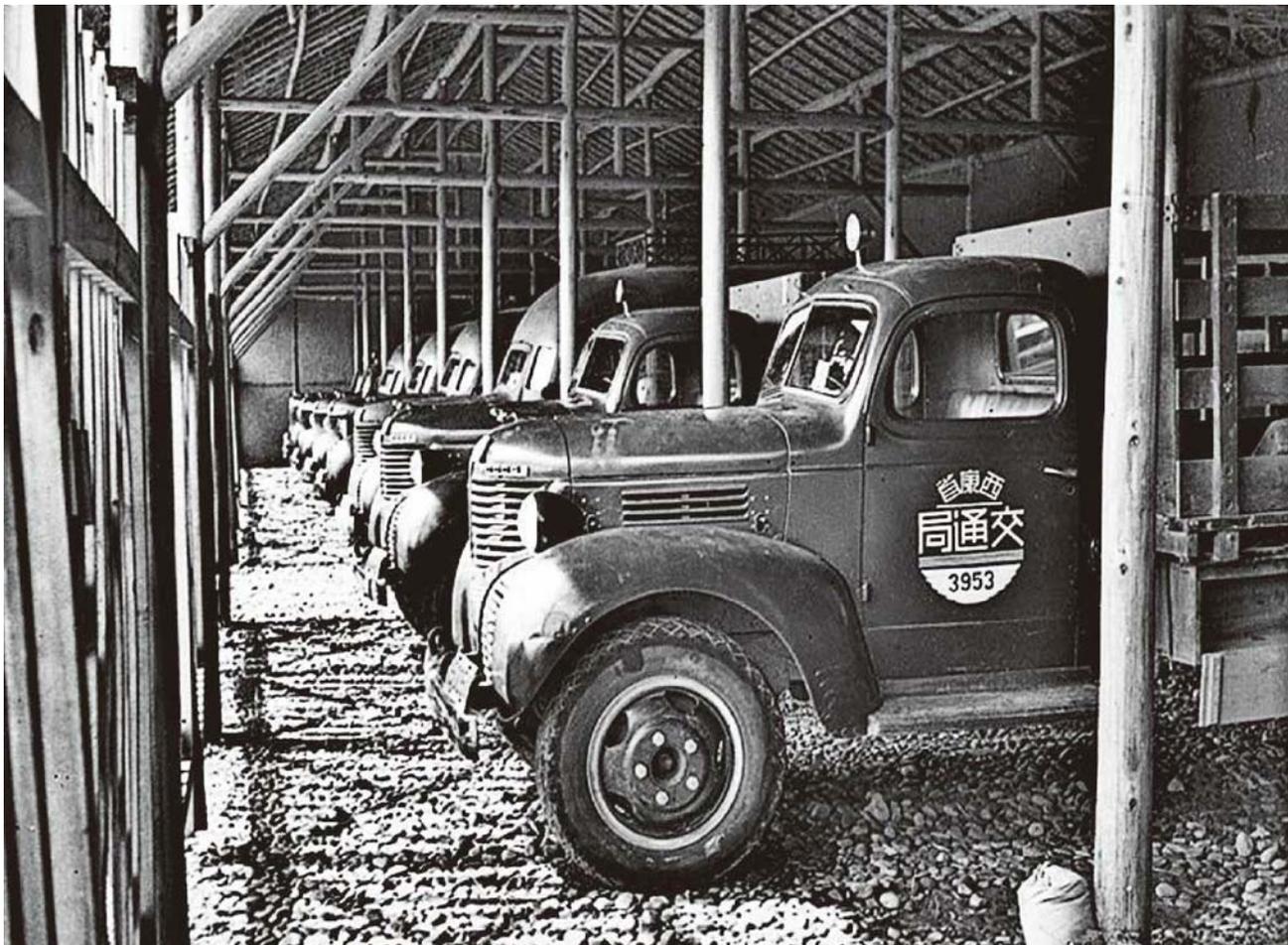
山区，开始沿途考察和记录西康、川西的风土人情。

庄学本，上海人，于1934至1942年间，在西康以及周围的川藏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察，拍摄了万余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1941年，庄学本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市举办《西康影展》，参观的人次达20万。山川、地理、民族、物产等，神秘的西康以最直观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孙明经，山东人，后来成为中国电影的开创者之一。1939年，受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之邀，孙明经作为摄影师随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西康。孙明经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纪录片，后来在“文革”中不幸遗失很大一部分。

1939年，在原西康省义敦县，考察团里的孙明经遇上正在此地考察的庄学本。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有怎样的对话，我们或不可知。然而，从他们留下的影像记录中，我们更加贴近地看到了那个时代、那片土地、那时的人们。①

① 1934年，川西与青海边界地区，吃着生肉的牧民。图/庄学本/FOTOE



01	02	04
	03	05

01

1938年，西康省交通局的汽车。图 / 庄学本 / FOTOE

02

1939年11月孙明经与庄学本在西康考察中不期而遇。摄影家自拍合影，左为庄学本，右为孙明经。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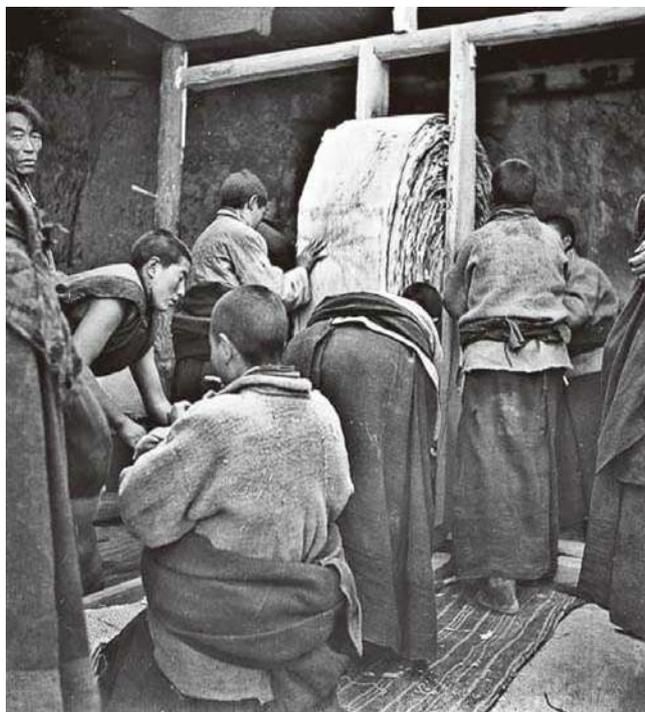
1937年，四川甘孜（后曾属西康省），藏族聚居区佛教徒为悼念九世班禅圆寂赶制转经筒。图 / 庄学本 / FOTOE

04

1936年，西康地区，边弹边唱的藏族贵族妇女。图 / 庄学本 / FOTOE

05

1939年，受“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之邀，孙明经作为摄影师随川康科学考察团在西康进行考察。图为川康科学考察团地理组在泸定桥上的留影，左五为孙明经。





01	
02	04
03	

01

1939年前后，四川巴塘县（曾属西康省），藏族姑娘合影。图 / 庄学本 / FOTOE

02

1939年，四川甘孜。戴着本教喇嘛跳神用的骷髅面具的藏族人。本教是藏族地区的原始宗教之一。图 / 庄学本 / FOTOE

03

1935年前后，西康地区藏族群众换新神箭献至山神前。图 / 庄学本 / FOTOE

04

1930年，巴塘藏族群众跳弦子。西康“巴塘弦子”在藏族聚居区非常受欢迎。以善拉胡琴男子为前导，随后男女青年列队，歌唱起舞。琴声歌声，抑扬顿挫，长袖翩翩，婀娜多姿。图 / 庄学本 / FOTOE



近代西药入华史

文 | 匡济

明朝末年，随着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华，西方近代医学也开始传入，但此时西方医学受制于其整体文明水平，并无太多引人注目之处，这些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影响力也十分微弱。即便清朝康熙皇帝因为服食传教士献上的药物，治好了让太医们束手无策的疟疾，也未能突破这一状况。直到工业革命开始，西方文明在科学的力量下高歌猛进，医学领域也连带出现了一连串发明发现，方才有了些大的改变。只不过这一改变是伴随着洋枪洋炮“打”过来的。

清朝末年，上海福州路的中西大药房招牌。
图 / 吴雅 / FOTOE



枪炮与病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一些西医便以葡萄牙人攫取的中国澳门为基地，开设诊所，售卖西药，施行手术，并通过招收中国学徒的方式，向中国内地传播西方医学。这些西医之中有不少服务于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自然不免也会干些贩卖鸦片的勾当。

在这些西医之中，有一位名叫马礼逊，他也是来到中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其于1820年在澳门开设一家诊所，合伙人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敦，并为诊所配套开设了一间药房。

这便是如今一著名品牌“屈臣氏”的直系先祖。在这个很有些年头的老店背后，则隐有一段西药入华的跌宕起伏的故事。

这个药房大约存在了五年时间，因为马礼逊回国和李文斯敦亡故而关闭，直到两年后另一东印度医生郭雷枢来华，才得以恢复。

当时广州为清朝指定的唯一合法外贸口岸，每年5月到10月容许一定量的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指定外贸机构即是十三行（十三行，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之总称）。西医如郭雷枢也会随商人前来，偶尔也给十三行的富商们看看病，久而久之，积累了些好感，得到了富商们的支持。

郭雷枢遂在1828年将诊所开到了广州，药房也随之有了第一个内地分店，按照当地习俗，号为广州大药房。

有史料称郭雷枢还在广州建了一座小型汽水厂，成为后来畅销的屈臣氏苏打水之肇始。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中华凉茶始祖王泽邦也在广州创立王老吉品牌。

虽然颇有进展，但受制于清朝的外贸规矩，这些药房诊所都局限于澳门、广州，而且在广州限制尤其大，必须打着只给外国人服务的幌子。

洋枪洋炮打过来后就不一样了。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国门大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而上。各地的教堂拔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国门大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而上。各地的教堂拔地而起，往往不远处就是教会医院，西药也开始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



地而起，往往不远处就是教会医院，西药也开始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

奇怪的是，屈臣氏的先祖不趁此机会，北上内地拓展市场，却转而南下去了香港，时间是1841年。

原来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大批军队、商人、冒险家、传教士涌入，造成人口爆炸的同时，更带来许多新型病菌，再加上香港气候炎热潮湿，卫生状况十分糟糕。

这些病菌就不是洋枪洋炮对付得了的。

当地中医也极为罕见。危机中，西药商机出现了。

屈臣氏的先祖便将分店开到了香港，那座汽水工厂也随之之迁来，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尚未习惯饮用此物，最大客户群体还是外国人。

与此同时，屈臣氏也来了。

所谓屈臣氏，其所指人物英文名为 Thomas Boswell Watson，若以汉语普通话音译，当为托马斯·博思维·华森，但按粤语发音，则将“华森”二字译作“屈臣”。

这位屈臣先生祖籍苏格兰，职业为医生，在1845年来华，并于澳门开设诊所，或许是生意状况不佳，又或许是香港市场更大，十年后他卖掉诊所，渡海入港。在这里他的生意十分成功，不仅开设了一家规模可观的诊所，还在繁华的黄金地段买下店铺开设药房，并因此得以强势加入屈臣氏先祖的业务中。

这家药房名号为香港大药房。

当时香港大药房的股东很多，即便屈臣先生强势，也不太可能让这个药房立马随他改姓，何况他自己的生意也不错。不料此时刚刚年过三十的他，身体状况欠佳，大约是水土不服，呆了没几年，就撑不下去，卖掉产业，匆匆回国。

临走之前，他将自己在香港大药房的股份留给了一个专攻药学的侄子。

此人名为 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缩写为 A.S. Watson。

不错，正是后来屈臣氏的英文缩写。

依靠专业所长，他很快成为药房首席药剂师，短短几年时间后，就得以与两名药剂师同伴接管了整家药房。在1862年，他叔叔去世两年后，打着A.S. Watson标签的药物便出现在了市面上。

随着业务的繁荣，A.S. Watson标签在香港成为知名商标，这位屈臣先生便趁势将香港大药房的名号在1871年改为了A.S. Watson & Company，粤语翻译即是屈臣氏大药房。

就在精明强干的这位屈臣先生正欲大展宏图之际，他却突然放弃了这份锦绣事业，将其转让给了两个医生，约翰·汉弗莱与阿瑟·亨特。

原因不明。

不过约翰·汉弗莱与阿瑟·亨特倒是经商的奇才。接手之后，独具慧眼的他们发现这年头卖得最好的不是西药，而是汽水，遂大手笔投资在今香港中环士丹利街置地，建立一座新的汽水工厂，产品多达六类，屈臣氏汽水从此扬名天下。

在主打汽水的同时，他们还开始扩张屈臣氏的事业范围，方向则有两个，一为中国内地，一为海外。

1883年，屈臣氏在外国人甚多的菲律宾马尼拉开设了分店，主卖汽水。一年后又在当地建立一座汽水工厂。在中国内地扩张更是迅速，许多大城市都开设了分店，到19世纪末，数目已多达30余家。其中以上海分店规模最大，有一座位于今四川北路一带的汽水工厂，产量颇大。至于名下售卖物品，更是丰富，除了药品、汽水之外，化妆品等后来世屈臣氏的主营产品也大量上市，甚至还卖起了时髦的照相机等物，俨然一个百货商店，而并非只是药店。

这也绝非屈臣氏一家所为，纵观当时入华的西药房，数量不少，仅上海一地到19世纪末便已多达十余家。但观其贩卖物品，除了西药外，更多的都是些化妆品、医疗器械、照相机、饮料、食物。甚至还有一些利欲熏心的西药房，为了谋财，利用许多中国瘾君子的痛苦心理，炮制诸如“包戒洋烟断瘾散”一类的假药乃至毒药，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信与迷信

西药房一家接着一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当时的国人对此有何反应？

最初，国人的态度与对待一切洋玩意一样，极度排斥，更遑论信赖与接受了。这种态度的理论根据，也与排斥其他洋物一样，在于“华夷有别”，即洋人制造的西药，与传统中药差别甚大，多为“神仙难识”的药粉药丸，可能适用于洋人的身体体质，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显得过于猛烈了，甚至还有人认为国人吃西药等于服毒自杀。如《申报》在1872年刊登文章，称“彼时海禁初开，国人之视西药竟有甚于鸩毒者，相戒勿服”，又称西药“其名既异、其性复殊，且研末炼水，更无从而知其形，故国人不敢服，诚恐服了有误而无术以救之”。

事实上，此时尚未真正打开中国市场的西药房，也大多是依附于教会医院而存在。彼时主要业务是给这些医院提供药品，以及供应在华的外国人。由此看来，当年屈臣氏的先祖不北上内地，而是南下入港，去抢夺在华最大外国人聚居地的市场，还真是颇具眼光的。

当然这只是初期的生存策略，站住脚后，这些西药房就想方设法要发展中国客户群体，在这方面他们采取了多管齐下或者说上下通吃的经营手段。

一是大做广告。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同时印刷大量海报进行推广，其广告画面设计与广告语的提炼，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很有水平，只是有时显然吹得过了头，以至于屡屡出现“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字眼。不过对于国人而言，这却是从未见过的阵仗，此前的中医哪一个这样干的？其冲击力可想而知。

大做广告的同时进行低价销售。因为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福利”，洋人开办的西药房不需缴纳关税，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得低价推广成为了可能。西药房的许多老板还开动商业头脑，大量贩卖一些廉价特效药，如治疗眼病的硼酸、治癩

疥的硫磺膏等等，而屈臣氏药房更是专注于“脱鸡眼水”“光鲜嫩面水”“涂面花露水”“去花柳水”等等特效药品。

同时，大量教会医院的免费诊治、免费送药，更是帮了西药房的大忙，如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的教会医院，一天免费诊治病人超过千人。即便到了后来由于接诊病人太多，许多教会医院出现财务问题，这种免费模式还是在维持。由此而来的好感与信赖，是一笔无形的巨大资产，更是扭转国人心理的一股绵绵之力。

对当时中国境况很有些洞见的西药商们，深知打动那些官员尤其是大官员的心，是多么重要。故而早在鸦片战争前，伯驾就专程前去给林则徐看病，虽然因为相关规定未能见面一诊，却将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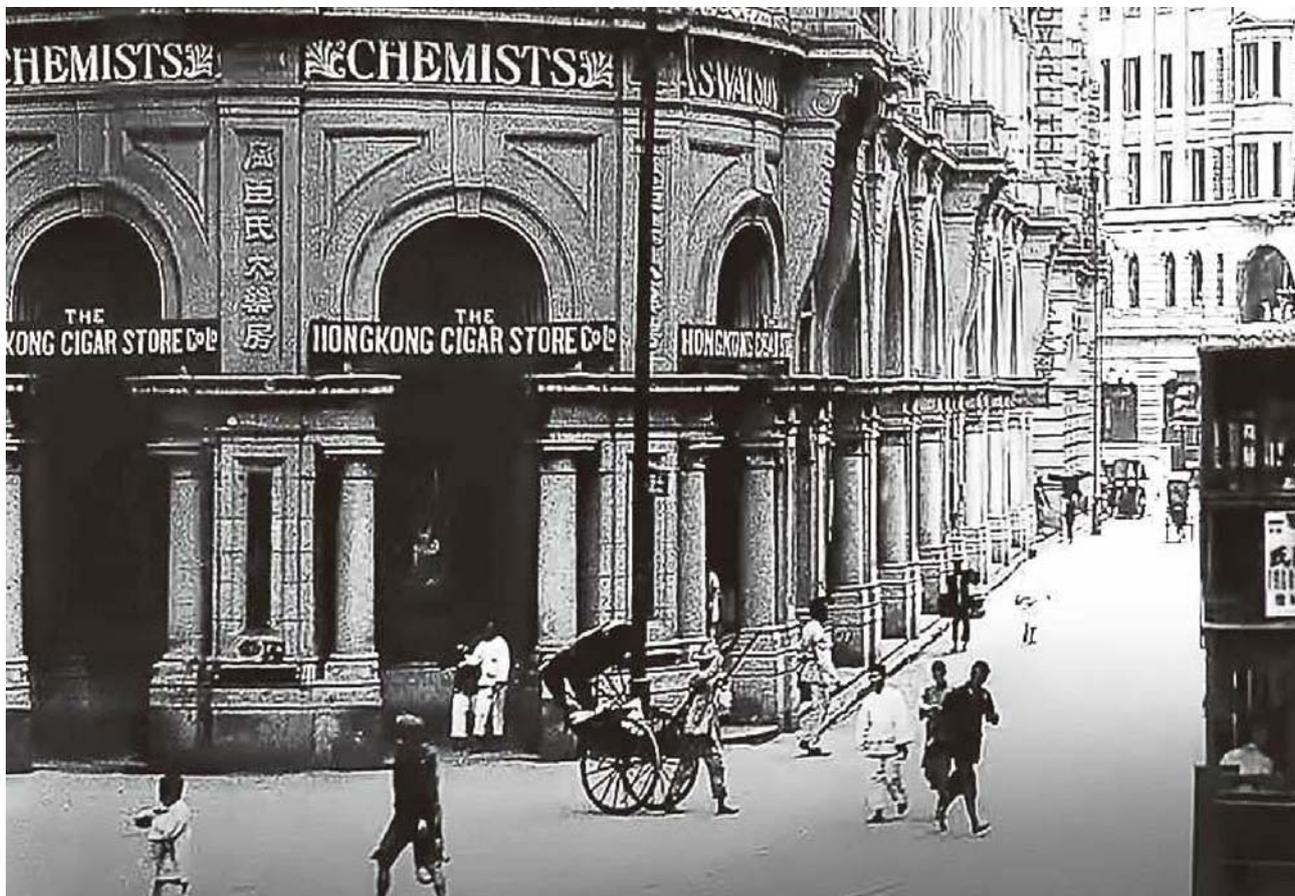
包西药送了过去，史称大有奇效。

屈臣氏的经营者更是用心良苦，上海分店开业之后，他们通过大力活动，得到了当时许多清朝大员的支持——至少“纸面”上支持。证据则是一块块题赠的匾额。1883年，上海分店出了一本广告册，名为《惠济全书》，其中重点并非宣传贩卖药物的奇效，而是刊印十七位清朝大员题赠给西药房的匾额。哪些清朝大员呢？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沈葆楨……

且看那李鸿章所题匾额，四个大字为“妙手回春”；左宗棠则为“仙术佛心”；沈葆楨为“慧心仁术”；曾国荃为“海西仙药”……

与下面的一招比较起来，其实上面谈到的这些都只能算是辅助动力，做不得主要动力。

1871年，香港大药房更名为屈臣氏大药房。随后，屈臣氏药房陆续在菲律宾、马尼拉及中国内地开设多家分店。



这一招却是国人发出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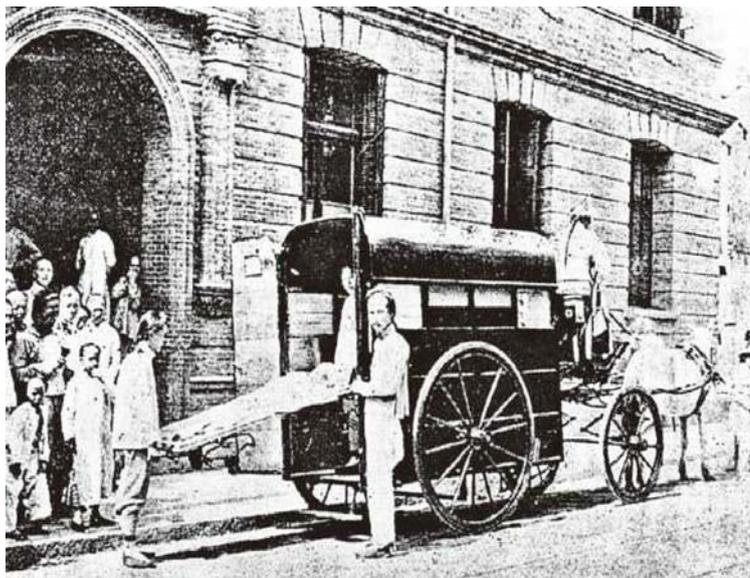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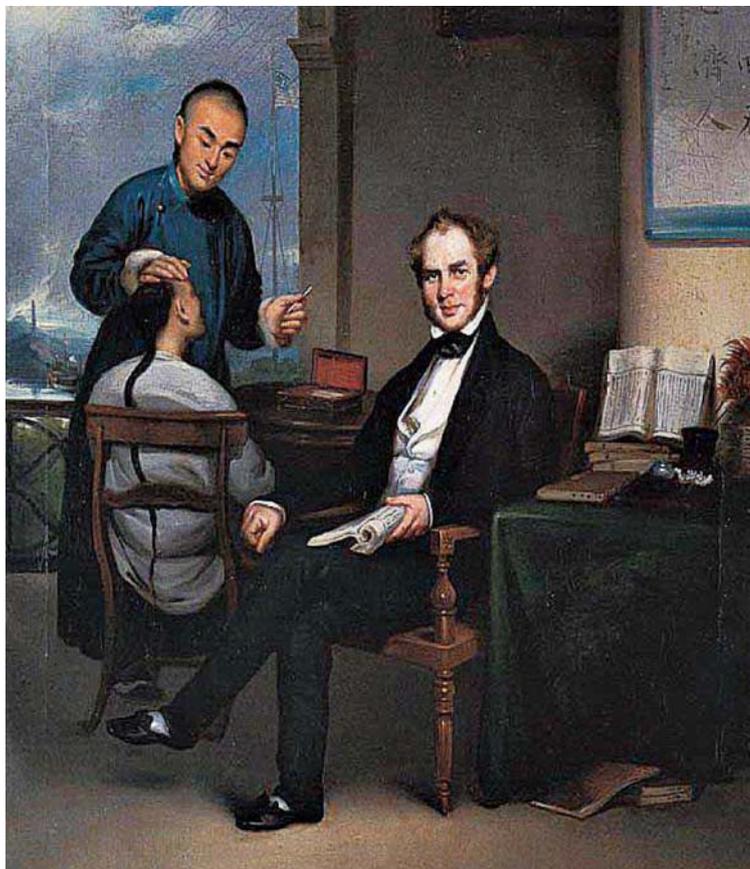
在此七字指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洋务运动，其内容绝非只学洋人造洋枪洋炮洋船，学洋医、造洋药也是一大重点。其中突出者乃是李鸿章于1881年创立于天津的北洋西医学馆，大量聘请西医为教师，按照西方医学院模式授课，以为北洋水师培养军医。史称此校曾因单招广东一省学生，引起天津当地人士抗议，在官方强力推动下的西方医学之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要不然这些当地人士就不会起来抗议招生不公了。

官方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普通国人对西药的怀疑与抗拒心理也在逐渐消解，何况还有广告、免费等等“诱惑”，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许多西药房，抓住鸦片上瘾者的痛苦心理，大肆推销所谓的戒烟良药，进一步提升市场影响力，如屈臣氏上海分店之所以能获得李鸿章等人的亲笔匾额，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宣称自制的“戒烟精粉”能帮助百万瘾君子脱离苦海，引得清朝大员一片赞赏之声。

发展到后来，竟然还有著名中医站出来为西药现身说法，如当时四川有名中医江锡堂，号称经方派大家，结果在年迈之际，时常头昏目眩，无法自医，后来听人劝服食了一些西药，大有好转，遂公开出来广告：“除目眩的毛病没了以外，更感觉神清气爽，好似年轻了十岁，我看这就是补品中的极品，同行中如有和老夫一样身体不适又不能自医者，还不速速去买点这类西药服食？”

进口与国产

西药逐渐为国人所接收之后，市场规模剧增，以中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利润空间相当可观，各大西药房很是发了一笔横财，如在各地大开分店的屈臣氏在19世纪最后几年里，年利润以白银计算，就突破了十万两。虽然和清朝官员的腐败收入相比不值一提，但对于当时的商业而言，就不是个小数字了。



自然有国人心动。

原本就有一些国人在教会医院或者西药房做学徒，历练一段时间后，目睹西药市场的红火，也有了出来开西药房的念头。

这方面的先驱乃是名为罗开泰的华侨，1882年他在教会医院的帮助下，于广州开设了历史上首家中资西药房——泰安大药房，业务发展颇为顺利，不久便开分店一家，并正式挂出“华人首创泰安大药房”的招牌。

蒸蒸日上的屈臣氏上海分店也遇到了中国对手，那是由顾松泉在1888年所创立的中西大药房。这位顾松泉十多岁便进入英国药房当学徒，经过近二十年训练，在专业程度方面不亚于当年的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感觉条件成熟后，他便与几个朋友合资创办药房，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本药房……自运泰西各药材发客，精选灵验良方，秘制诸般药水、药膏及丸散膏丹，讲究精求，无不尽至……”。其创业资本不过几千元，却因为发展顺利，数年后资本总额即达到十余万元，年销售额已破二十万元，是为屈臣氏上海分店一大劲敌也。

但纵观晚清西药房之格局，总体来讲仍是由洋人主导，华商实力十分微弱。如上海一地，虽有中医大药房对屈臣氏造成强烈竞争，但大多数华商西药房都是资本总额不到万元的“小微企业”，根本无法与那些动辄资本就上四五十万的洋人西药房抗衡。

原因很简单。

药从哪儿来？

进口。

从哪儿进口？从西方进口。

同样是卖，西方的药厂卖给西方人，自然要比卖给中国人的价格低了。

进货成本一高，自然价格也就高，何况洋人西药房还有关税的豁免，华商西药房却是该缴的一样不能少，不该缴的还要看清朝官员的脸色全数奉上。

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华商药房也学洋人药房，

广开销路，什么都卖，甚至还买来几本国外出版的药学典籍，照着上面的说明，进口一些廉价的原材料，自己生产起了药品来，名为“本牌成药”。这种很有些山寨味道的经营方式，也折射出当时华商药房生存之不易，他们可没有屈臣氏的财大气粗，能直接盖一座汽水工厂出来。

后来一些西方药商干脆将制药厂直接开到中国来。第一家乃是英国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开设的耀华施德之药厂，其药物自然是优先供应洋商西药房，华商西药房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到清朝灭亡前，上海有华商西药房近30家，却无一家华商药厂支撑。而洋商西药房有22家，看似数量不占优势却是在资本上有压倒性优势，在他们身后还有6家洋商药厂支撑。

就在华商西药房举步维艰之际，却有逆转发生。

一战爆发了。

这场号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其实主要战场局限于欧洲地区。由于机枪、战壕战等战争因素的影响，列强均是大伤元气。人员伤亡巨大，需要的西药自然也就多。本土都还不够用，哪来的出口到中国？就连洋商在中国开设的药厂出品的药，也要优先运回去支援他们的国家！

大约也是受战争阴影影响，或者是再一次眼光独到，在一战爆发前，屈臣氏便匆匆关闭了在中国内地和菲律宾的所有分店、分厂，集中业务于中国香港。

洋人西药房和药厂如同釜底抽薪一般急剧萎缩，一些资金雄厚的华商趁机入市，建立起大批药厂来。不过这些药厂的投机性质太大，加上原料来源依然是西方，因此并未发展壮大，反而随着一战结束，进口西药卷土重来而失去竞争力，纷纷破产，一度到了残存十几家的境地。

不过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民族资本产业的发展，在西药领域，经历了许多曲折的华商，还是逐渐站了起来。尤其是在当年“抵制日货、支持国货”的运动下，华商在西药的生产 and 销售市

01
02

01

1840年，美国首位来华医疗宣教士伯驾画像。

02

清朝末期，上海某教会医院最早使用的救护车。图 / FOTOE

市场占有率得到了很大提升，一些资本雄厚的华商西药房也顺势开办药厂。相比于此前那些投机分子所设药厂，此时的这些药厂都是依托于药房的产业，根基稳固，成长健康，如上海到1936年末，华商药厂多达58家，西药房则多达166家，其中多有开设分店于全国者。

之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刚刚有些起色的华商西药业再遇打击。许多药厂内迁，更有不少药厂毁于战火，残存者也成了日军的战利品，被横加掠夺。随着枪炮而来的日本药商则在占领区建立起一大批药厂，强征中国劳工，所作所为截然不同于当年也随着枪炮而来的传教士。与此同时，日军更对药物实行严密的管制，因为这是与战争相关的重要物资，影视剧中抗日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入城购药的情节并非虚构。

退于香港的屈臣氏，就能幸免？

1941年12月13日，在日军的炮火声下，屈臣氏为其百年诞辰“庆生”，看来其自认为的正统先祖当是1841年从广州大药房开到香港的那家分店。差不多两周之后，香港守军投降，日军进驻。就在屈臣氏的经营者同许多英国人，还在幻想日军按照国际法对待他们的时候，这些侵略者已经以飞快的速度强行接管了屈臣氏的药房与工厂，其中那家以生产汽水和蒸馏水而闻名的“屈臣氏非酒精饮料制造厂”，被划到了日本海军名下，改称为“日本海军饮料制造厂”，不知后来在太平洋上逞凶的日本水兵，是否“享用”过这里的产品？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屈臣氏的原东家才收回产业，并在同年9月1日正式重新开张，只不过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这家英籍外企的命运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朗。直到后来出现了一个华商李嘉诚于1963年收购了屈臣氏公司……①

(除标注外，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西药入华年表 +



1820年，澳门出现西药房



1828年，西医在广州开办西药房



1841年，香港大药房创立



1845年，屈臣氏先生来华



1862年，屈臣氏商标出现



1883年，菲律宾马尼拉分店创立



1871年，香港大药房更名为屈臣氏大药房



19世纪末，内地多家分店创立



20世纪初，内地、马尼拉分店关闭，屈臣氏退居香港



1941年12月26日，日军强行接管屈臣氏



1945年9月1日，屈臣氏重新开张

还有诗和远方。

不仅有眼前，

生活，

书香

C
H
E
N
G
D
U

成都



乱世幕僚赵烈文

文 | 赵立波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心腹、最亲近的幕僚，但在旁人看来不过是围绕在曾国藩身边的小角色一个。然而，这个小人物不仅洞察了当时的大势，甚至还精准预言了清朝覆亡的时间。



赵烈文。

同 治六年（1867年）是曾国藩谈古论今、臧否人物、判断时局最频繁的时期。此时的曾国藩常常与他的下属和幕僚谈论时事，其中他最看重的是一个青年才俊——赵烈文。二人后来以师徒相称，感情非常真挚。赵烈文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在历史大变局下，用极具冷静的视角对晚清的政局的变数和历史的趋势做出了准确而深刻的判断。

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教育，但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

曾国藩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大批当时影响晚清政治格局的能人，比如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等。这些人后来都曾独当一面，也对晚清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都是值得一书的人物。赵烈文与他们相比，则显得籍籍无名，一生的作为和成就都跟曾国藩有所关联。

❖ 与曾国藩的初识

曾国藩与赵烈文认识极早，咸丰五年（1855年）是曾国藩最难熬的日子，跟随的幕僚大都弃他而去。赵烈文姐夫周腾虎推荐他入幕。曾国藩为此还拿出了二百两银子的聘请费用。

初识赵烈文，曾国藩感觉这个人书生气太浓，纸上谈兵的话太多了，加之赵烈文当时年纪很小（赵烈文生于1832年，此时23岁），因而对其并不十分信任。曾国藩命初到的赵烈文先参观驻扎在樟树

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想让他先见识一下。没想到，赵烈文一来就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

“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听罢很不高兴，因为曾国藩最不待见说大话的书生。赵烈文可能也看出了曾国藩的态度。碰巧在这个时候，赵烈文的老母生病，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怎么挽留就准许了。

就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驻樟树的湘军部队大败的消息。曾国藩开始对赵烈文刮目相看。之后赵烈文母亲病故，赵烈文回到老家守丧，一待就是五年。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青年，咸丰十一年时，曾国藩专折奏调他进入军营。此时，赵烈文才真正开始了在曾国藩门下的幕僚工作。这一年他刚满三十岁。

两年后，也就是同治二年，由于兵法对策的出色，就连在攻打南京城的曾国荃都曾多次向曾国藩索要赵烈文辅助他。赵烈文在日记写了这样一件事：

“示知沅帅（曾国荃）欲烈赴其营，前面请之，昨又屡函来说，相国（曾国藩）问烈意如何。”赵烈文当时回答说：“我赋性疏拙，不谙世务，到那里恐怕对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还是不去为好。”曾国藩却坚持要他去，赵烈文只好以缓几天再答复为借口，告辞而出。过了两天，赵烈文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请欧阳兆熊向曾国藩转达此意。想不到第二天欧阳兆熊回话说：“曾公还是想请你去一趟。曾公还说：到金陵后，是去是留，悉听尊便，或者往返金陵和安庆两处，也无不可。”意思是赵烈文可以“身兼二职”，同时做曾家兄弟的秘书和“高参”，由此可见曾氏兄弟对赵烈文是如何器重了。

在此后一年半左右，赵烈文见证了曾国荃围困天京（今南京）的所有细节，期间也与曾国荃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尤其在湘军大破天京城后，赵烈文眼见有些官军统领在城内肆意杀戮掠夺，十分痛心，感叹“此地不可居矣”。曾国荃处理完几件大事之后，害怕赵烈文向曾国藩反映问题，赶紧约见赵烈文，并“色甚忸怩，有读书太少，义理不能制血气”的道歉话，在那么忙乱的时候还不忘张罗着请赵烈文吃饭，可以想见，赵烈文在曾国藩那里是何等的受重视。



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驻樟树的湘军部队大败的消息。曾国藩开始对赵烈文刮目相看。



❖ 拜师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湘军军中大部分幕僚都希望凭借军功被推荐做官。曾国藩心里也斟酌着赵烈文的人生选择去向。同治四年三月的一天，赵烈文与曾国藩聊天，谈到将来打算，赵烈文坦诚地说：“余云烈出处之计，本无成算，荷相国及少帅盛意，未敢牢拒。然仍愿追随相国……”此前，赵烈文已经被曾氏兄弟奏保“以直隶州仍留浙江补用”。一个月后，曾国藩要北上，赵烈文要求从行，然而曾国藩希望他不再鞍马劳顿，跟随自己再次受罪，希望他能够出仕，赵烈文此时依旧没有答应。

送别曾国藩的这一天，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奉命给赵烈文送来一副曾国藩的书法，落款称他为：“弟余其相爱，可谓诚挚。”感动处，赵烈文再也忍不住，就跑去找曾国藩拜师。赵烈文说：过去我也想拜您为师，可是害怕别人说我“徒以功名之会”，所以不敢跟您太过昵近，现在我们要分别了，这些嫌疑没有了，我平素之愿可以说出来了。曾国藩感动地答应了，离别的时候赵烈文非常伤感，曾国藩亦面有凄色。

离开曾国藩的日子，赵烈文回到老家赋闲，开始在故乡虞山脚下筹建自己的书屋。过去，他跟随湘军四处漂泊之时，不忘到处购买书籍，至彼时已蔚为大观。他给这个书屋取名“天放楼”。两年后，赵烈文收到曾国藩的信，让他继续来这里工作，于是赵烈文又一次来到了他十分想念的老师身旁，也就是在同治六年，他们师生二人的感情极其亲切，朝夕共处的这段日子，开始了毫无保留的谈话。在他的日记里，多见的是“涤师（即曾国藩，曾国藩号涤生，其弟子及下属均尊称他涤师。后同）来久谈”等等字句。有时候曾国藩心情不好总要找他倾诉，遇到问题也跟他讲。这段日子里，赵烈文成了曾国藩的精神依靠，虽为师生，情同父子。

❖ 预见

细心研读《能静居日记》会发现，曾国藩与赵

烈文彼此价值观非常契合，聊天中，往往由曾国藩开头，然后赵烈文再与之对答。从传统文化到宗教哲学，从时政军事到臧否人物，谈话内容十分广泛。由于互相认可，谈话都是发自内心，毫无掩饰、敷衍，属于典型的性情聊天。这在曾国藩的交际圈里弥足珍贵，赵烈文成了曾国藩最激赏最珍惜的弟子。有时候谈至感动之时，赵烈文会潸然泪下，连曾国藩也会被感动得“师亦为之闵然”。

一日，曾国藩心情忽然抑郁起来，于是来找赵烈文聊天。曾国藩说：“昨天收到严厉的旨意，说捻贼到处流窜，全无堵截，各帅都被斥责，曾国荃也被摘去了顶戴，交部议处。”圣旨的措辞极其严厉，过去从来都没有，曾国藩担心带兵的将帅们不能很好克制，恐生兵变。曾国藩“神气凄怆”地说，恐怕还要北上，可是现在他精力颓唐，也不再是能掌控大局之人，现在只能期望早点死去。说完，赵烈文一时竟找不到安慰的话，只是劝老师安心休养几日，不要以境遇累心。接着赵烈文又劝慰了一番，看到老师艰难，赵烈文回到屋里竟然为此失眠一夜。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曾国藩这大半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有一回曾国藩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他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在众人看来，曾国藩的功绩自然是依靠对太平军作战的胜利而得来的，或以为这就是其精力花得最多之处，却不懂他与世俗文法战的消耗其实是“十之五六”。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政治系统、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官场和军中的各种潜规则。可见，当时的赵烈文目光已经触及到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

更令曾国藩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以曾氏为首的湘军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

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国藩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

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

几日后，师生二人聊天，谈及了一个最重大的话题，那就是关于清朝兴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曾国藩再一次蹙着眉头问赵烈文。

赵烈文平静地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时至今日“天下”治理已经发生了太多败坏问题。只是由于皇上在民间仍是权威的代表，中央政府才得以勉强维系，尚未分崩离析。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此番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

曾国藩一惊之后，继续深入探讨：“然则当南迁乎？”

此番询问也有来由：中国历代政权绝大多数都是在黄河流域建都的。但也有政权因为战乱，迁都南方，留得半壁江山。

赵烈文的看法是：“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意思是，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接着赵烈文又详细地说出了一些看法，最后曾国藩愈加绝望：“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隕”，寄望赵烈文能重视当朝的恭亲王的“聪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断”，以此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

翌年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訢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直隶总督之职位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终于曾国藩说出了“两官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此时的曾国藩彻底相信了赵烈文的判断。此系后话。

❖ 出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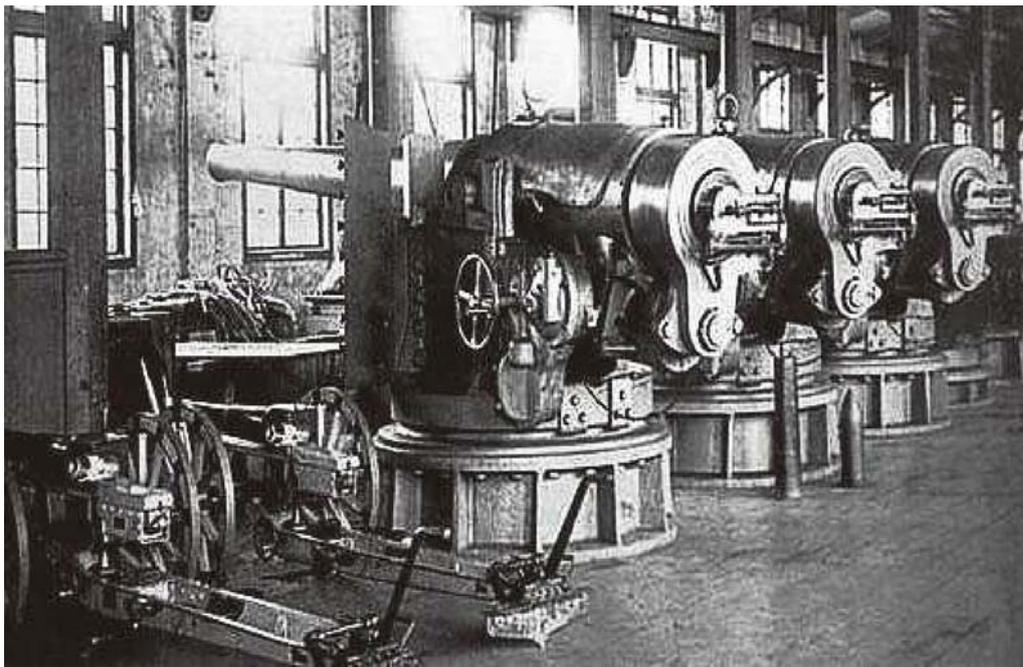
曾国藩对赵烈文人生走向极其关心，由于赵烈文家族庞大，生活压力和经济来源全都来自于赵烈文幕府工资，曾国藩为赵烈文生活艰难多次“蹙眉”，他深知一旦自己年迈，赵烈文恐无保障，所以想让他出来做官，以此彻底摆脱这种幕僚的不稳定状况，并企图说服他：“否则竟去做官，家世令长，且惟

此可以历练人才。足下天分绝顶，世间学问事理有虚实二宗，无虚则实，有时而窒碍不行；无实则虚，又无所附丽。论虚处则足下当世无敌，惟实处讨探未尽，再能勉力，便为全才。”曾国藩对赵烈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外人看来，赵烈文身份虽然卑微，在曾国藩的眼里，他的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君子，是“天分绝顶”，也是有可能成为全才的人。

然而，赵烈文却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做官未必能了负累，我现在一个幕府人员，可是请我办事的人还这么多，更何况做官？爱钱无以对知己，不爱钱无以了一身，更何况我一旦当官，大家都知道我会打着您的威望旗号，就算那些高级官员没有意见，可是跟我同辈中的人能不侧目吗？所以用做官去谋划生计，真非我所想。

两年后，曾国藩北调直隶总督，赵烈文跟着北上，几经劝勉后，赵烈文勉强出仕。

同治八年，曾国藩保举赵烈文署理广平府属之磁州。获悉之后的第二天，赵烈文亲自去找曾国藩，



1870年，江南机器制造局炮厂炮房。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等军用品。

力陈磁州属肥缺非初任所宜，不适合自己去担任，希望找一个偏远贫乏的地方去给百姓办点实事，以此报答老师。曾国藩坚持不同意。在此之后的几年里，赵烈文又转任易州知州。

在他并不漫长的仕途时间里，他对百姓非常爱护，为政清廉，查案、断案迅速公平，是一个典型的晚清良知官员。在同治九年的三月里，他在为官所在地带领民众开凿水利，深得民心；他劝当地游手好闲的人要勤耕作、戒赌博，通常一直忙到午后才找个地方休息、吃午饭。吃的都是自己带的干饭小菜，有的村民给他送来一壶热水，他都要付钱。赵烈文这些为政品德，在晚清官员大多糜烂腐坏的时代显得非常可贵，果如曾国藩曾经所预料的那样“伊必一好官，能做事。”自此赵烈文与曾经的师友多以书信来往，全力安心工作。

同治九年，赵烈文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对话“涤师复任两江，李合肥（即李鸿章）移督畿辅，可为怪事。并闻江都马新贻被刺（曾轰动一时的“刺马案”）而死，尤为可詫。”

几天后，李鸿章见到赵烈文。在称赞了赵烈文的工作能力后，李鸿章说：“足下文学优雅，然我向以足下为办事之才，今事理明白如此，我见果不谬，可惜往年不肯至我处，若早来，彼此有益多矣。我自愧幕中未有造就一人，皆我无才德之故。”赵烈文听了这话自是表示谦逊感谢。李鸿章接着又说：“磁州大道首站差使如何？足下初仕，曾老夫子即畀（给予）以盘错之任，想有所见，然亦大胆矣……”通过这段对话，李鸿章似乎透露出一种嫉妒的意味，并且对曾国藩如此“重用提拔”赵烈文有所腹诽。紧接着用其“听取汇报”式的问话跟赵烈文沟通了几个问题。赵烈文对答后，遂向李鸿章问起曾国藩南下日期。于是就有了曾国藩与赵烈文二人最后一次短促的会面。

❖ 与曾国藩诀别

次日，赵烈文起了大早，匆忙去追赶曾国藩一

行。见到曾国藩后，赵烈文先是表达了对曾国藩六十寿诞的祝贺，继而便以为官一年无所政绩表示惭愧。曾国藩却称赞说：官声极好，足见有才。接下来，曾国藩叮嘱赵烈文说：“素性高尚又最多情，做此小官，既不能展抱负，而我又要南下，不能履行过去你我约定，现在竟然不能为足下摆脱奈何？”

在别人眼里赵烈文这个职务极其耀眼，让很多人嫉妒，在曾国藩眼里，赵烈文做的是“小官”，不能真正施展他的才华，可见他对赵烈文的看重。

赵烈文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去我跟随老师您，都是因为追随您的杖履是种人生乐趣，没有奢



他并不漫长的仕途时间里，赵烈文对百姓非常爱护，为政清廉，查案、断案迅速公平，是典型的良知官员。在晚清官员大多糜烂腐坏的时代显得非常可贵，果如曾国藩曾经所预料的那样“伊必一好官，能做事。”



望老师还有南下任职的机会。现在学生既然有了工作职责，过去一年工作压力很大，内外贡献都不大。当初老师奏调学生为政，也是勉励我整饬吏治，现在一点成绩也没有，看到老师南下我就要南下，这样会让别人以为结党营私成为笑话，而且在仕途上也没有这样的政体，我现在因老师为个人的融入让老师多次为难，这也不是我当初的愿望。

师生对答间，彼此一番感动。几天后，看着恩



曾国藩书法。

Tips

赵烈文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也有涉猎。著有《天放楼集》《能静居士日记》54卷。著述是研究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历史的核心资料之一。

师曾国藩远去南下的背影，赵烈文写下了“十六年来徐别泪，三千里外抵归程”的感伤诗句。

同治十一年二月的一天对于赵烈文来说无异于是最痛苦的日子。这一天他得知恩师曾国藩在江都官署病逝。

赵烈文在当天日记这样形容自己感受“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都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这个噩耗对于赵烈文来说实在太突然了。

由于相隔千里，公务在身又不能亲身前往悼念，接下来的几天中，赵烈文因为过度悲伤成疾。这段日子，赵烈文打听询问着老师去世详情。在得知曾国藩去世前并未遭受痛苦，“吉祥善逝，安坐含笑”后深得安慰。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这样深情地回忆着与涤师最后分别时的场景：“忆前年送行，师尊于车马纵横之中，送烈至门，坚辞不可，怆然而别。情景犹在目前。每一念及，心如糜割。”

十月之后，赵烈文已经苦于官政，要辞职，于是向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报告，李没同意。就在第

二天发生了一件让赵烈文更震荡灰心的事情。同治皇帝因患天花去世，“午刻至督署上谒，则已接凶问，于初五酉刻上宾矣。疏远小臣，无涕可挥，惟觉心中震荡不宁而已。”当他再次求见李鸿章时，李鸿章正闭门谢客，听说是赵烈文来了，就让他到内室说话。当时李鸿章非常不安，赵烈文安慰了他几句后，又提出辞职，李鸿章非常真诚的加以挽留。赵烈文坦率地跟他说：“余云烈辈在世，譬一草芥，自揣无益于人，胡为久恋栈豆……”在此之后的不长时间，赵烈文终于获准辞职，飘然回乡，经历了大格局之后，他知道距离大清王朝“陆沉”的时间越来越近，目睹了所有希望都破灭后，他终于飘然回到江南，开始回归书屋、旅行、照顾家人……

历史苍茫如雪，透过并不显赫的人物，从小人物视角，窥看处于乱世中晚清那些风雨飘摇的片段历程，也许会对历史有一种不一样的体察。这其中有些当时那些重要人物在这个变局中的焦虑与无奈，还有一段关于幕僚与政客之间、师友之间平实而真挚的情谊，可供后人回味。^①

智利伊基克, 为何有20万太平军后裔

文 | 泓景

在伊基克, 超过 20 万人有华人的血统, 他们竟然是当年太平军的后裔。只是, 清代的太平军, 怎么会远涉重洋, 跑到遥远的南美大陆去了呢?

去

年4月2日, 一场8.2级强震袭击了智利城市伊基克。这座城市位于阿塔卡马沙漠北部的关塔哈亚山麓的一个半岛上, 是智利北部太平洋岸港市, 塔拉帕卡第一大区和伊基克省首府, 距首都圣地亚哥1800公里。

难以置信的是, 伊基克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这里不仅拥有南美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华人天堂”, 将近 1/4 的当地人口拥有华人血统, 华裔是商业中的重要角色。

在伊基克, 处处可见中国面孔的影子, 虽然由于长期混血, 已与纯种华人有所区别。但中华痕迹还是不少: 如当地人称弟弟为“塞罗”(细佬), 把儿子叫“崽”, 女儿叫阿米(阿妹)等。又比如,

当地语言中餐馆叫“其发”(广东话吃饭), 馄饨被称为“完蛋”(浙江话馄饨)。祭祀祖先时, 许多伊基克人也同智利土著有明显不同, 他们会祭祀祖先的牌位, 早期的直接用汉字书写, 现在的牌位也有用西班牙语书写的。

更有意思的是, 有华人血统的伊基克人会过一个叫“包巾节”的节日, 这也揭示了他们的由来: 每到7月的某一天, 伊基克华人就带上各种颜色的头巾, 这样的做法是仿效他们的祖先——当年的太平军。

在伊基克, 超过 20 万人有华人的血统, 他们正是当年太平军的后裔。1999 年建成的一家伊基克博物馆, 还收藏着那些远赴南美大陆的太平军



1879年, 5月21日, 硝石战争中争夺伊基克之战。

人使用过的三角旗。

清代的太平军，怎么会远涉重洋，跑到遥远的南美大陆去了呢？

❖ 太平军残部的隐秘去处：避走海外

1948年，首批同盟会会员、曾在1918年参与护法运动的政治家冯自由，出版了一本书籍《革命逸史》。此书是他自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等编写的。

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史上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这本《革命逸史》也被认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书中在讲述洪门（又名天地会）之源流及派别渊源时，不经意提到这样一句话：“其后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诸部将亦多远赴美洲，重张旗鼓。”

这句话不经透露出太平军残部一个鲜为人知的行踪，也为不少史学研究者所关注。

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学者罗尔纲教授也曾提过，天京沦陷后，太平军中确实多有走避海外。这里说的海外，泛指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当时都是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

1947年出版的《上海洪声》月刊，在其创刊号也透露，“失败之后，起义之洪门弟兄，不能容身于国内，于是数万弟兄赴美洲，平南王黄德滋率领数万弟兄赴澳洲（平南王建立之洪门会所，尚存于澳洲大金山），黄仲涵之父率领数万弟兄赴爪哇，其余多赴南洋各地，从事开发工作。”

那么，究竟有哪些太平军出奔美洲？他们在一个陌生国度又是如何安身立命？这留下的一个个问号，勾起了不少国人的兴趣。

❖ 沦为“契约矿工”

1864年年初，进入第13个年头的太平天国已



留下来继续抗清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到处都在剿杀太平军残部。在这种情形下，不少流亡的太平军便想到逃去清廷的法外之地。



然有了摇摇欲坠的迹象。当年1月，江苏的淮军在枫泾击败太平军，嘉善、平湖、乍浦和海盐的太平军全部投降，拉开了太平军全线败退的序幕。

六月，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于天京，终年五十岁。几个月后，曾国荃的湘军便一鼓作气攻破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结束，“天京”也被改名换姓，由曾国藩改回江宁。

就在闽粤沿海一带，一支太平军余部从福建漳州突围而出，慌不择路，向西逃窜。一路上，清廷的湘、淮两路大军紧追不舍；沿途的督署团练设伏打围，迎头出击。数万太平军且战且退，一路上损兵折将，犹如丧家之犬，苦不堪言。

这支部队曾经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麾下的一支虎狼之师。漳州城沦陷后，军帅翁德容带残部突围而出，却既不见援军，也不知侍王李世贤身在何方，一路疲于奔命。

留下来继续抗清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到处都在剿杀太平军残部。在这种情形下，不少流亡的太平军便想到逃去清廷的法外之地。

香港因毗邻广东，是出亡的理想落脚点和桥头堡。曾担任清朝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就曾经以开设商铺为掩护，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琅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后来当上了警察，而后在九龙红磡开设广济堂药店。

还有个出路，就是去当“猪崽”，即到国外当“契约矿工”。这支太平军余部中约一万多人选择了这条生路。他们带着自己的亲属家眷，坐了几个月的船，被运到南美一个地方当起了硝石矿工。

这个地方，正是前文提到的智利伊基克。伊基克所属塔拉帕卡大区，该区原属于秘鲁。这是一座被沙漠和海水包围的城市，它的另一个外号叫做“旱城”，西临太平洋，东靠阿卡塔马沙漠，海拔5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脉成为了伊基克和周边国家玻利维亚、阿根廷以及巴拉圭交通往来的巨大障碍。这座城市显然并不是柳暗花明的世外桃源。

❖ 异国土地上的二次“起义”

劳工生活并不容易。当时南美各地的许多矿上充满了折磨和压榨，不少苦役病死，甚至有人选择自杀。

对于逃亡至此的太平军，劳工的生活更是非人的。每天要干苦役14个小时以上，时常忍饥挨饿的同时还要忍受矿主无端的打骂和虐待，一切就要逼至崩溃的临界点。

终于，他们的命运在1866年迎来转折。这一年，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为争夺南太平洋沿岸阿塔卡马沙漠硝石资源与鸟粪产地摩擦不断，战争一触即发。混乱中，不堪折磨的太平军们酝酿着发动起义。

伊基克地区正处在秘鲁、玻利维亚、智利三国交界地带，长期以来，为了争夺丰富的矿产资源，秘鲁和玻利维亚结成盟友，与智利之间的征战不断。

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混乱之中，这批太平军获得了机会。1867年3月，伊基克的数千名太平军，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发动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起义”。有过实战经验的他们很快就抢夺了枪炮，活捉了来不及逃走的洋人矿监，占领了整座矿山。

起义者推举湖南人翁德容和广东人陈永禄为领袖，以太平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了整编。由于担心秘鲁军队卷土重来，翁德容当即排兵布阵，命令陈永禄赶快收集所有缴获的枪弹，带领一千人快速下山，靠近伊基克镇，阻击来犯之敌，只准佯攻，且战且退，只留下两老弱病残的太平军镇守矿区后方大营。自己则带着五千将士拿着铁锹钢钎，备足碎石，埋伏在山谷两边的森林之中。

不久，山外枪声一片，秘鲁数千人马气势汹汹地扑过来。等他们全部进入山谷，翁德容一声令下，碎石就像雨点一样砸向敌阵，打得他们猝不及防，一个个丢盔弃甲。这时，陈永禄又带着人马回戈一击，山谷两边事先埋伏下的将士们猛然扑向敌阵。一时间，秘鲁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翁德容带着数千将士乘胜追击，打死两名秘鲁军中的将领。

这一仗下来，据说，秘鲁方面的2000印第安雇佣军被生擒，同时缴获长枪1000多支、火炮2门，太平军的三角旗插在了大洋彼岸的异国土地之上。

事后，太平军接洽上智利军队的司令西拉皮佐将军，表示愿意帮助智利对付秘鲁和玻利维亚军队。西拉皮佐听说伊基克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事件后，喜出望外，连忙上报智利政府，并派人带来了智利总统的亲笔信，承诺给予所有的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以智利国籍，并表示战争结束后将伊基克交给太平军和他们的家属管理。

这封信让这支太平军看到了希望，命运就此改变。

❖ 伏击战一战成名

西拉皮佐将军任命翁德容为少校，陈永禄为上尉，将太平军武装成智利第6边境纵队“褐衣军”，让他们协同智利军在秘鲁塔拉帕卡省的作战，配合智利军队在港口登陆，占领莫克瓜，一同攻取伊基克市。

1868年，“褐衣军”按智利军队的要求展开军事行动。不过，他们没有按照当时智利军事顾问的要求按西方军队的编制进行改编，而是采用太平军之前的方式建立了两个军，并设立师帅、旅帅、两司马等太平军官职。

由于可利用的火器不多，于是“褐衣军”就在当地开始打造类似太平刀这样的冷兵器。他们还自行配备了许多三角形的旗帜，用螺号代替军号。同年6月，“褐衣军”开始攻打秘鲁南部城市塔克纳。500名太平军打扮成当地的印第安人混入波内达要塞，一举俘获了300名秘鲁军人和要塞司令。

接着他们又与闻讯赶来的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激战。“褐衣军”派出300名先锋引诱玻利维亚骑兵部队到一处森林，然后展开了伏击，打死了70多玻利维亚军人。随后，约有1000名太平军头戴黄色和红色头巾，身穿褐色服装，操着各种武

Tips

南美太平洋战争：又称硝石战争、鸟粪战争，是1879年—1883年智利同玻利维亚、秘鲁争夺南太平洋沿岸阿塔卡马沙漠硝石、鸟粪产地的战争。最终智利获胜，玻利维亚和秘鲁被迫割地。

器冲入玻利维亚军队中。这支玻军约有4000余人，其中有2000多的印第安雇佣兵，仅操着十字架，根本敌不过作战经验丰富的“褐衣军”。

几番攻势下来，玻军很快溃退，约1000名印第安雇佣兵投降，“褐衣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们夺取了4门大炮和15面军旗、大量的军用物资以及200余匹战马。

这场对阵中，“褐衣军”也伤亡不小，有400多人阵亡。“褐衣军”的主帅翁德容由于沉痾已久，积劳成疾，在这次战斗中从马背上摔下，伤重不愈。陈永禄依照军帅遗言，带领全体“褐衣军”在他们当初第一步踏上美洲大陆的伊基克海港上，为翁德容举行了盛大的海葬。西拉皮佐将军代表智利政府前来劳军并参加了葬礼，他授予翁德容智利国会勋章，擢升陈永禄为上校军衔，并给予所有阵亡太平军高额抚恤金。

这就是著名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这也让“褐衣军”一战成名。

❖ 太平盛世政策在他乡开花结果

1879年，为配合智利军在帕科查港登陆，陈永禄指挥着“褐衣军”在莫克瓜再次同秘鲁-玻利维亚联军展开激战。

他们仍采用太平军典型的作战方式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虽未大获全胜但给敌人制造了恐慌。玻利维亚军的一位军官说“这些带头巾的褐色人群在射程外摇旗呐喊，等到靠近时又不见了。他们打仗时锣鼓喧天，搞出许多噪音，好些印第安雇佣兵以为被伏击了，纷纷逃跑，连长官也阻止不了。”

这其实是太平军惯用的惊心战。由于“褐衣军”的军事行动给秘鲁-玻利维亚联军以很大的牵制，根本无暇应对帕科查港的战事，以致智利军顺利登陆，伤亡轻微。

在莫克瓜战役中，“褐衣军”首次与智利军并肩作战。西拉皮佐当时记载：“这支军队没有西方军队的纪律，但却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纪律，他们配备了许多三角形的旗帜，用螺号代替军号，他们的战士有拿各种武器的，但更多的是使用两把东方式的短刀（太平刀）”。

接着“褐衣军”又在塔克纳和阿里卡两次战役中配合智利军队彻底打败了秘鲁-玻利维亚联军。至此，智利军队占领了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太平洋沿岸全部硝石产地，玻利维亚失去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并实际上退出了战争。1881年1月，智利军队攻占秘鲁首都利马。1883年，秘鲁与智利在利马北部安孔城签订条约，结束“硝石战争”（又称南美太平洋战争）。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由此，伊基克也随之划分给智利。

随后，智利政府信守承诺，将伊基克赠给太平军余部，成立一个自治镇，但要求他们解除武装，成为平民。“褐衣军”首领陈永禄爽快地答应了，原太平军将士们在他的带领下解甲归田，融入当地的普通生活，与当地人通婚，大力推行太平天国曾经提出的建立太平盛世的理想政策。洪秀全做梦也没想到，他提出的设想中的某些部分竟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了。

100多年过去了，伊基克已发展成为南太平洋之滨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伊基克这座城市与中国太平军之间的牵连。历史有时超出人的规划和设想，充满了戏剧性。①

百年前，西方人的中国漫游（二）

立德夫妇：扁舟过三峡

文 | 绿衣

1859年起，英国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是一个商人，同时，他还是一位学者、一位旅行家、一位走南闯北、记录中国的先锋。他的《在华五十年集锦》《穿越长江三峡》《到峨眉山及以远》《远东》《穿越云南》等，都是对那段历史的详细记录。而立德的夫人也是位多产的作家，在中国20年间出版了10本书，她还是最早的重庆妇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们的三峡之旅，第一次驾驶蒸汽轮船走通川江，堪称壮举。

清代，湖北宜昌海关平善坝检查站。平善坝位于西陵峡口里10千米处。图/FOTOOE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于1883年4月7日在自己日记中写道：

“我就地站在河水切割成的一个岩石平台（这样的平台有许多）上观看忙碌的苦力队伍为庞大的帆船船队装货卸货，帆船上满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各种物产。一队队搬运工人，辛苦地背着未压实的棉花的白色巨大坤包，登上长长的阶梯，十分引人注目，远看就像一大群蚂蚁背着自己的蛋一样……眼前的情景与自己这许多日子身临其境的宁静的大自然景色又形成了强烈对照。”

此时他刚刚结束在三峡上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旅程。三峡的雄浑、艰险和三峡上纤夫的坚韧令他感慨万分。而他本人其实也值得赞扬——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他是极少数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乘坐小船穿越长江上游的欧洲人。



1859年，19岁的英国曼彻斯特人立德跟许多同胞一样，来到中国淘金。他先在香港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次年，只身到上海，参与到与太平军作战中。1861年，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参与屠杀太平天国士兵。立德还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授予立德游击官衔，从三品。此后，他娶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女儿阿绮波德为妻，开设立德洋行，成为上海富商。

立德的夫人阿绮波德自小崇拜哥伦布，渴望冒险。她和立德一起，几乎跑遍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她生性好探险，又热情过人，曾积极支持中国的妇女天足运动，还为此拜见过李鸿章和张之洞，写过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他的生平和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

正是这样一对在中国西人圈子里以胆大、好冒险著称的夫妇，几次筹资造船，试图完成用轮船逆流而上穿越三峡，从宜昌最终到达重庆的旅程。他们既是充满冒险精神的商人，也是那个时代的探险家。

❖ 首次三峡行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规定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商埠，并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抵达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此居住，开设行栈，待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样，能否驾轮船逆流而上行抵重庆，就是打开西南的关键。立德虽然在上海经营洋行，投资商业，但他一直想进入中国西南部，尤其是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那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有眼光的外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和洋货销售市场。因此《烟台条约》一签订，他马上准备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



立德一直想进入中国西南部，尤其是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那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外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和洋货销售市场。因此《烟台条约》一签订，他马上准备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



1883年2月，他将孩子留在上海，和热衷中国社会活动的妻子一起搭轮船到汉口，时值枯水季节，汉口到宜昌方向轮船停驶。他们改乘木船逆流而上，经过约40天的艰苦航行，于3月18日抵达三峡的东部入口，经过这次勘察旅行，立德认为将洋货销往四川是完全可行的。他在给英国驻北京代办的信中说：“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还说“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无意义。”

一路沿江上行，沿途所经历之地，立德都对水势、地形进行仔细观察，他的日记中几乎逐日记载，逢滩必述，每遇到一个险滩都仔仔细细描述水势以及纤夫和船长的应对。比如在宜昌往上的一个河段，他记载道“这一河段宽3/4英里，完全像一个山间湖泊，看不见出口；小船艰难地前行，这时已靠近‘湖’的顶端，河流似乎完全消失了。突然，山峦出现一道裂口，瞧！这就是大江，缩至400码宽，在陡峭的石灰岩峭壁之间奔流，远处，两边的山崖似乎要合拢起来，大江似乎流不过去。在随后三个小时中，峡谷的全景逐渐展开，任何笔墨都无法描述其全貌之美丽动人。”

他也常常记载两岸的风景：“归州以上河段有其独特的迷人景色，山坡上开辟的片片梯田一直延续到山顶，村落散布在树林和竹林中”，“离开曳滩那扣人心弦的场面后，我们进入一段宽阔河面，两边是高约2000英尺的陡峭深红色山峰，一片片碧绿的麦田点缀其间，较缓的山坡上的村落颇像阿尔卑斯山的村庄，盛花的果树和常绿的树环抱周围。”在他笔下，三峡两岸的风光秀美怡然，令人向往。

他甚至常常上岸步行，考察沿江的官道和山间小道。他发现前者年久失修，成了帝国丧失治理能力和进取精神的象征，而后者险峻则数次令他在山间陷入进退两难的绝望境地。当地水手回头寻找他，牵着他的手，才将他一步步从峭壁上重新带回停泊在江边的帆船上。

与中国传统文人墨客对三峡的描述偏重景观不

同，立德很关注人，他的笔下不断出现纤夫拉着船在峡谷中行进的画面：“纤夫们用号子声协调时间，每走一小步胳膊都要前后甩动，向前弯着身子，手指头都几乎触到地上，当纤夫们向前行进并处于这种姿势时，又长又粗的纤绳盘绕成一卷，放在岸上，走到前面去的人迅速解开自己的索结，往回跑站在队尾重新系上索结。80或100人协同劳动时喊声震天，几乎盖过急流的咆哮声，而且常常是五六艘帆船的纤夫都同时拉纤，一队接着一队，一方面是峡谷中庄严的静谧，另一方面是险滩上充满生气的喧闹声。”

船过西陵峡时，他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些地方河槽正中间出现成堆的岩石，小山般的破碎岩石连小羚羊爬起来都有困难，可是倒霉的纤夫却要在上面爬上爬下。主河道水要相对宽和深，但帆船宁愿走靠近岸边的较窄的水道，因为这里可以不停地拉纤……”而在西陵峡的懒洞滩，立德记录下一艘满载棉花的船的底部被撞出一个大洞，搁浅在河滩；在秭归附近的新滩，立德的船上滩失败，被冲进激流，拉纤的纤夫中有两个被拽倒，拖过岩石，身负重伤，后来一名纤夫在送往岸上的时候死去；在云阳附近的一处险滩上，他们的船又一次失去控制，被冲下激流，与下面的一只小船相撞，幸好没有大的损坏；一次，一个纤夫一脚踩空，掉进激流，还好被救起……立德深深地惊叹于纤夫身体的灵活，对三峡水系、山势的熟悉和他们淳朴的性格。

那段辛苦旅行费去了整整三个星期，立德夫妇和船员备尝艰险，才于4月7日抵达目的地。虽然艰苦，但他心怀感恩“我虽孤独，却满心欢喜感到能在扬子江游历真是我的运气。因为将来汽船不可避免要通航，无所不贪的环球游客必将破坏这迷人的美景。如果坐汽船匆匆而过，还没有时间欣赏细节，一处景观还没在脑海留下印象，就被下一处景致抹掉，那还不如不浏览。”

行程结束，立德将自己的日记整理为一本书，记载整个行程以及三峡地理状况、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可开发的商业机会等等。立德也因此次三峡

之旅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

◆ 利川号：轮船的川江首航

完成第一次乘帆船的三峡之旅后，立德夫妇下定决心要开发三峡地区的航运。

1884年，他们回到三峡，从事汉口到宜昌的客货航运，并试图向政府申请准许直接通航到重庆。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恐慌，因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基本都是与长江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旦现代轮船在这里通航，势必会对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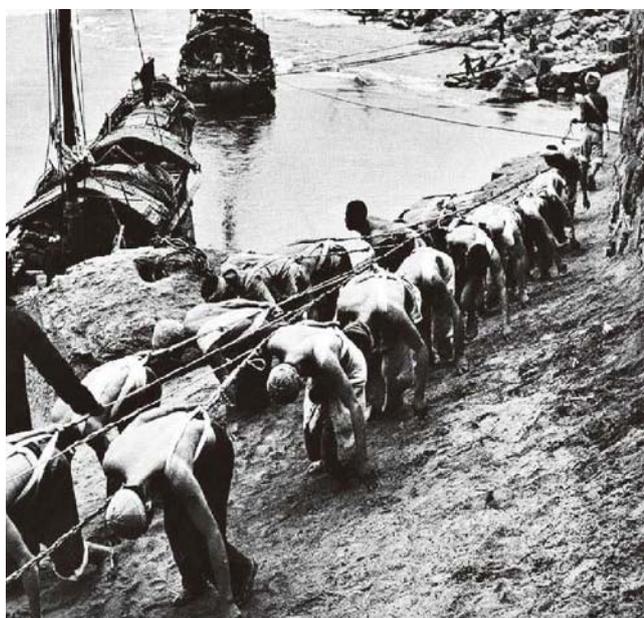


“利川”轮试航重庆，宣告川江轮船航行时代到来。虽然其目的是获取大西南资源，扩大英国商品市场，但也客观上推动了川渝地区的商业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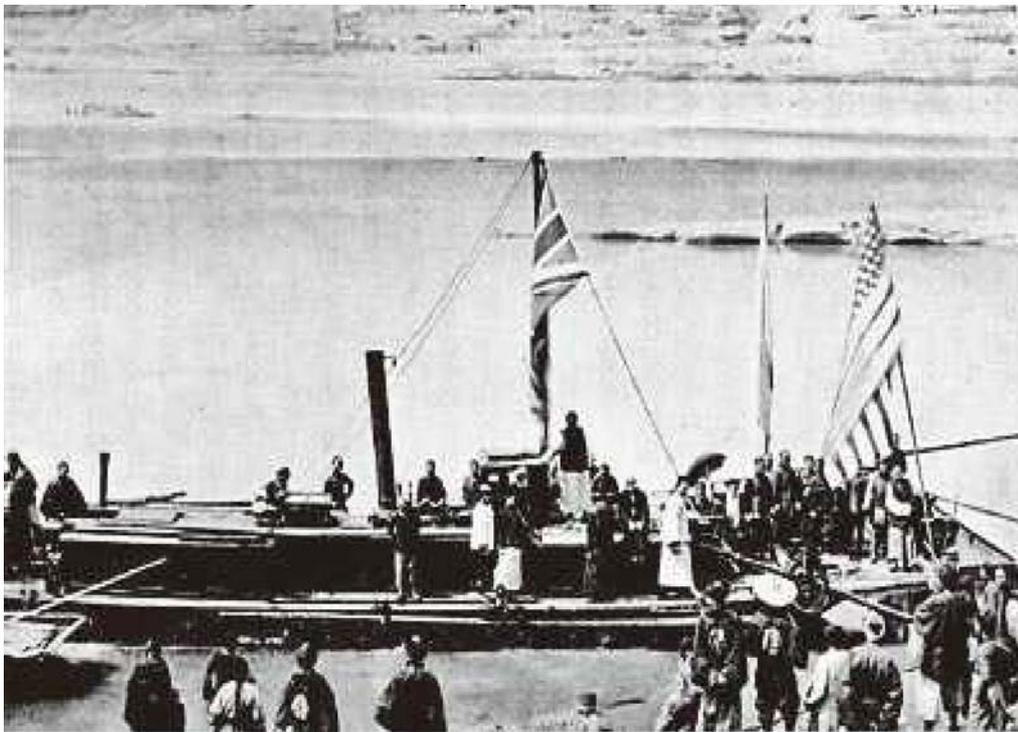


地的传统行业造成打击，船工、纤夫，甚至船老大都将面临失业或者破产。因此，立德第一次从宜昌到重庆通航计划流产。

立德具有典型的英国探险家的精神，坚韧、轻易不放弃。由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受到挫折后，立德并不死心，花重金聘请英国人浦南田率测量队，深入由宜昌到重庆的水道，绘制航线图，并在沿江安设标杆、浮标，炸毁江中险滩暗礁。直到甲午海战之后《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其余列强根据“最惠国待遇”逻辑，也获得同等权利，立德马上订了一艘适合川



本组图为 20 世纪初期，长江三峡沿岸的图景：水流湍急，江边取水，纤夫拉船，商品交易等。



1898年3月，立德驾驶“利川号”从宜昌抵达重庆。

江试航的轮船，取名利川。

1898年2月，在重庆开埠8年以后，距立德第一次三峡之行15年以后，他终于再一次启程，准备从宜昌驶往重庆。这一年，立德58岁，他的妻子53岁。

立德自任船长，立德夫人则负责船上人员的生活安排。他们所驾驶的利川号是三峡航道上出现的第一条蒸汽机船。立德夫人不仅用文字记录了沿途的人文风光，还用当时中国内地非常罕见的照相机拍下了当时的风土人情。

据《宜昌志》记载，2月15日，立德自任船长、大车，驾驶“利川号”离开宜昌。因马力不足，在滩险水急地段如新滩、滚子洞、曳滩等处，立德花高价雇请船工拖拉。过兴隆滩时，雇用的纤工竟多达三百余人。

《巫山志》记载，2月19日，“利川号”进入巫山县境，行至万县剪刀峡，忽碰暗礁，船底洞大如桶，满船惊慌。立德临危不乱，组织人员堵塞漏洞，后顺流到水势平缓处，设法修补，幸免于沉没。

立德此行不仅面对凶险神秘的川江水道，还遇到川江两岸人民的阻截。在巫山，川东船户向江面上抛置大量稻草捆、杂物，绞住“利川”轮的车叶子，使它在巫峡中僵卧了整整4天。而据《云阳志》记载，在曳滩，“利川”深夜遭火矢袭击，火球像蝗虫般飞到船上。幸扑救及时，未酿成大难。在乌龟沱，“利川”被船户包围，仗着船体坚固，马力强大，撞沉渔船两只，致死六人后，冲出重围。随后船户渔民在上游郭家沱邀集数千人执篙持桨，欲与“利川”死拼。云阳官府闻讯派出兵丁，驱散群众。可见当时民间力量对洋人开通川江航线的反对态度。

为免犯众怒，再遭袭击，船过万县，凡经大码头、大城镇，立德便穿上官服，带上盛装打扮的夫人，登岸拜会地方官员。立德还与沿途各袍哥堂口龙头大爷笼络关系，利用其扫清障碍。3月9日清晨，“利川”轮驶抵重庆。在渝的英、美、日领事组织中外人士上百名，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重庆地方政府众船列队江中，张灯结彩迎候。驶抵朝天门码头时，迎候者鸣锣放鞭炮，上万百姓拥到江边观看。

至此，“利川号”成为了长江航运历史上第一艘从宜昌穿过三峡抵达重庆的现代轮船。立德夫妇在轮船上做完感恩节礼拜仪式后才下船。此前，他们已在重庆陕西路买下房子，随即办起商行，经营猪鬃、山货等进出口贸易。随后，两人永久租赁重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堡一片地皮，创办立德洋行。立德洋行老建筑位于现在重庆的上新街新码头34号，石雕大门、别墅、仓库等均在，立德在重庆经营时间颇长，影响不小，重庆有的老人至今还能述说一些有关立德的传说：

江北龙王碛，来了立洋人。
开家煤炭厂，铁路要修成。
刚刚才动手，打死三个人。
袁官来验尸，命价一封银。

随着立德首航川江成功，大批外国商人涌至重庆，开办各种公司。太古、怡和等外商，争相在川江上办起轮船公司，因其快捷，收费便宜许多，沿江船帮饱受冲击，生意一蹶不振。因洋纱大量涌入，传统土纱价格大跌。在外商纷纷收购下，四川重庆猪鬃和各种土货价格大涨。据当时数据显示，“利川”轮驶抵重庆一年后，仅猪鬃价格便陡涨了27%。

“利川”轮试航重庆，宣告川江轮船航行时代到来。虽然其目的是获取大西南资源，扩大英国产品市场，但也客观上推动了川渝地区的商业贸易，1898年以来，重庆以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获得一股新鲜空气与活力，加速了重庆近代化历程。

❖ 立德之后，三峡之变

在立德之后，虽然不少外国人曾游览长江，但真正走过三峡的少之又少。1888年，法国驻天津外交代表阿尔伯特·阿马德曾乘船游历、拍摄了三峡；1910年代美国裕中公司负责从中国信阳至成都线路勘测的工程师GA凯尔也拍摄了不少长江三峡壮景，在《绝版长江》一书中可以看到；1917年西德尼·戴维·甘博到达重庆、四川成都、理县、遂宁、汶川、湖北宜昌等地，他的照片里也拍摄了很多长江上船夫的生活；1920年是英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溯江而上，拍摄了很多照片，1926年出版图书《扬子风景》；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冒险考察西陵峡；1946年，美国《生活》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来到三峡拍摄了三峡风光，比如奉节夔门和白帝城、滟滪堆、夔门景观、峭壁之上险峻的古栈道、高唱号子的纤夫等等。

这些外国游览者、摄影师来了又走，三峡岿然不动，又安立了几十年。直到三峡大坝修建，这里的自然景观发生巨大变化，立德看到的三峡、走过的三峡已不复存在——位于西陵峡中部的三峡大坝的坝前水位常年保持在145米以上，由此向西660多公里的航道两岸，高峡和峭壁已经消失，水上航行不再惊心动魄、耗时长久，而是变得略显沉闷无聊。两岸的景色不再是陡峭的悬崖，湍急的水势，而是浮现在水面的一个接一个的山顶，两岸的群山间则是持续扩张的城市。

三峡的通航时间也大大减少，1898年初，立德夫妇驾驶“利川”号蒸汽轮机木船从宜昌上溯至重庆，实际航行时间为11天，加上通过各种关卡时耽误的时间和修理船只的时间，总共耗时21天。而如今，乘坐滚装船从重庆到宜昌的下水航程只需要36个小时，上水航程耗时也不过50个小时。立德生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这种速度。①



厚历史 Thick History

清朝邮政的光影记忆

厚历史版块编辑：蔡丽萍
邮箱：2010025743@qq.com

文 | 石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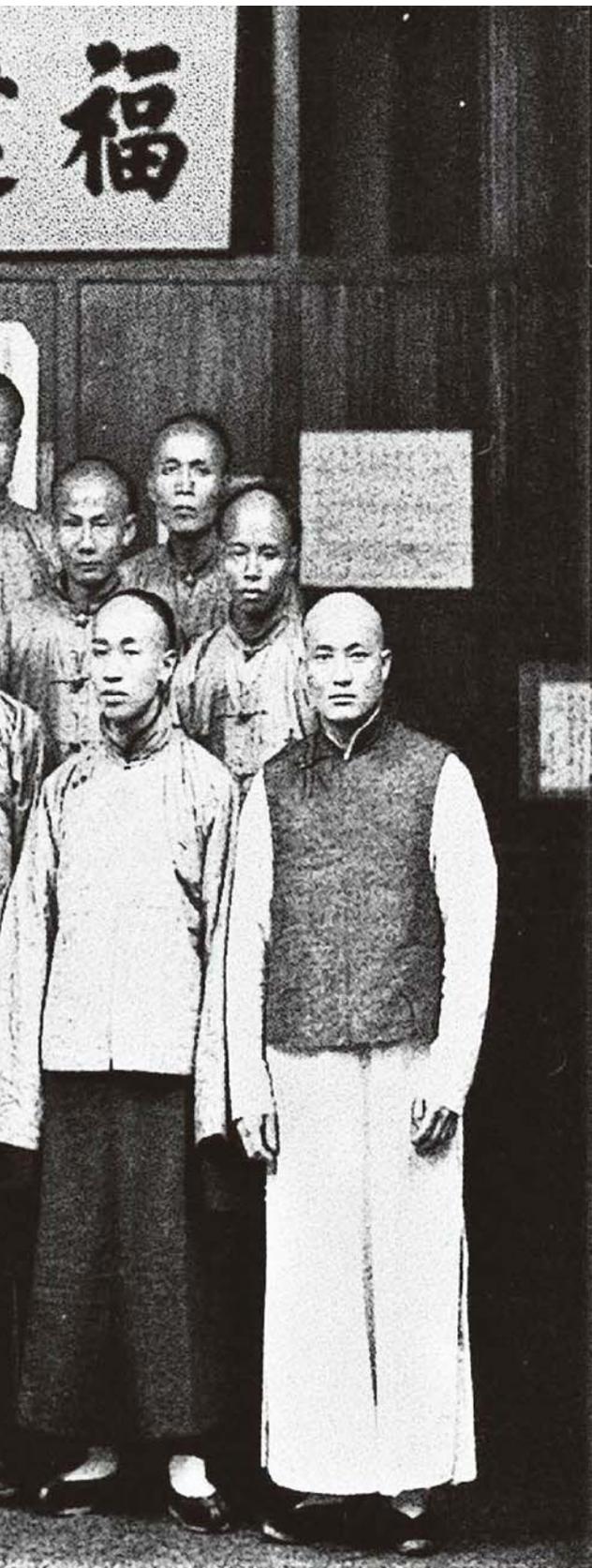
清代官场中活跃着众多的绍兴人，他们担任正官的幕僚，俗称“绍兴师爷”。师爷们不仅协助官员断案、收税、管账，还促使了“民信局”的诞生。绍兴师爷重视乡谊，虽分散在各省各级衙门中，但经常书信联络，结成帮派，久而久之演变成了初期的民信机构。绍兴师爷为何不通过清政府的驿站寄送信件呢？

原来清沿明制，在全国的战略重地、水陆要冲皆设立邮和驿。邮，负责传递公文；驿，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和通信工具，兼具招待所的性质。在明代二者是分设的，至清朝，政府下令将邮、驿合并，以提升工作效率。但传统邮驿，只负责皇室和政府的公文往来，间或为一些高级官员传递信件，但是不为普通百姓服务，这也使得民信局有其生存空间。

清代后期，封建统治日趋衰落，传统的邮传制度也面临崩溃，王韬、郑观应、冯桂芬等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立西式的邮政制度。迫于形势，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并诞生了中国第一张邮票——龙票，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起初，大清邮局设于总税务司署内，归英人赫德掌管。1906年清政府设邮传部接管全国邮政事务，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及通商口岸设立分局，使得邮政业务与总税务司脱钩，中国人自己掌握了邮政主权。

尽管大清邮政服务系统已经很完善，然而百姓们却并不买账，商人、百姓更热衷于通过晋商等设立的票号寄信、汇款、寄包裹，使得大清邮政与票号之间竞争激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的邮政陷入瘫痪。历史步入中华民国，邮政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①

约 1906 年，福州，福建省城邮政局成员合影。图 / FOTOE





	02
01	_____
	03 04 05

01

1910年3月3日，甘肃，官方信差。图/莫理循/FOTOE

02

19世纪末期，上海的大清邮局。前身为清光绪二十二年开办的大清邮局，光绪二十九年正式立为朱家角邮寄代办分局，是华东地区最早的邮政机构。图/吴雅/FOTOE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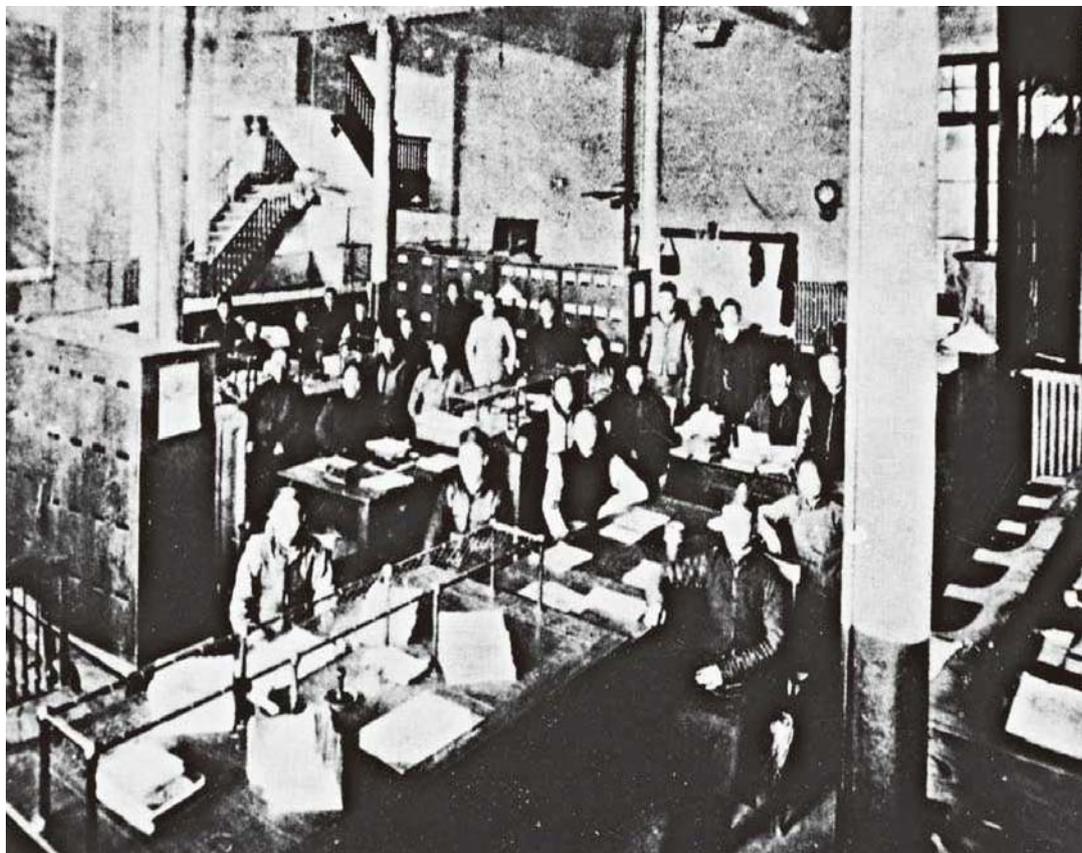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纪念邮票”印样（共九幅）。图/王琼/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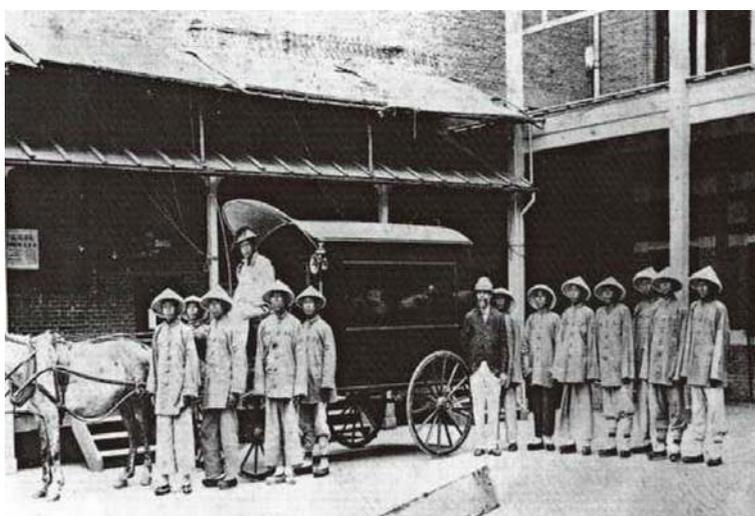
04

清朝邮政第一张普通邮票草图。据此草图将会成正稿付印。图/王琼/FOTOE

05

清末中国明信片：上海，会审公堂衙门，着装法警与用绳索连着的戴枷候审犯人。图/FOTOE





01	
02	04
03	

01

1861年，英国在上海成立客邮局邮政局，取名为大英书信馆。此后，美、法、日、俄、德等纷纷效仿，设立各国的邮政局，发行邮票。客邮局直到1922年才撤消。
图 / 吴雅 / FOTOE

02

清末北京大清邮政局。图 / FOTOE

03

清末，驿站。图 / FOTOE

04

清末，在邮局寄信的民众。
图 / FOTOE



吉田茂： 日本的丘吉尔

文 | 刘占青



吉田茂。

日本作为二战的亚洲策源地，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在给他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得本国遭受了重创，满目凋零。然而，日本人在一片废墟上经过23年的顽强奋斗，到了1968年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国，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的二次崛起。而奠定日本崛起的就是曾任日本首相前后长达七年之久的吉田茂。美国总统尼克松称他是“日本最黑暗时刻的一位脾气暴躁、性格粗野的领袖。就是这位狡黠而爱抽雪茄的前外交官，使日本摆脱了军事上战败的困难局面而在经济上取得胜利……人们说他是日本的丘吉尔。”

❖ 反战的外交官

吉田茂出生在东京的一个政治世家，他的生父竹内纲曾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吉田茂自幼就过继给了大商人吉田健三郎，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

190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吉田茂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开始了其长达四十年的外交官生涯。吉田茂有着“中国通”之称，先后在中国的沈阳（奉天）、天津、济南等领事机构任职，也曾以外交随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吉田茂的大学同学广田弘毅组阁时，有意让吉田茂担任外务大臣，但由于吉田茂被军部看做是亲英美派外交官，遭到了激烈反对，不得不充任了英国大使。在任驻英大使期间，吉田茂坚决反对日本与德国结盟，成为驻外使节中唯一的唱反调者，后来被迫辞职。

辞职后的吉田茂，迅速成为反军部的代表人物，他不赞成日本对美作战，甚至打算策划政变，提前结束日本的对外战争。1945年4月，由于吉田茂反战，遭到了警察的逮捕，在被关押了40多天后得以释放。这段反战经历为吉田茂成为战后日本首相增添了政治筹码。

二战后的日本到处弥漫着衰败的气息，在战争中大约有 185 万人死亡，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生产停滞，失业人口高达 1300 万，国民经济损失超过了 1057 亿日元，相当于 1946 年日本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绝大多数城市变成了废墟，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食物匮乏物价高涨，人们的游行抗议声不断。而与颓废的经济社会形势相比，日本的政治外交形势更为严峻。

作为战败国，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丧失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独立和主权，麦克阿瑟成了高居于天皇之上的“太上皇”。事无大小，日本人都要向占领当局请示后才能实施。

为了清除日本的法西斯势力，麦克阿瑟在日本政坛除了逮捕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高官外，还掀起了整肃运动，一大批战前战中担任政府官员的人被排斥在担任公职人员之外。

1946 年初，日本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由鸠山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但由于鸠山一郎属于支持军国主义人士，也在整肃的名单之列，不能够担任日本首相。他不得不请自己的好友吉田茂出任首相一职。之所以选择吉田茂，主要由于吉田茂是亲英美派并且是一个反战人士，且在战后的两大短命内阁——东久迩内阁和币原喜重郎内阁担任过外相，与麦克阿瑟多有接触，能够获得占领当局的认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吉田茂的首相职位来的突然而又轻松，这里面更多的是运气成分。毕竟他既非自由党党员也非党首，更没有参加过竞选活动，完全是一个靠政治环境垂青的幸运儿，因此吉田茂常常戏称自己“是被雇佣的总理大臣”。

❖ 重经济轻军事的首相

吉田茂刚一上台，就面临一个棘手的经济问题——粮食危机。1945 年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多灾



1945 年 4 月，由于吉田茂反战，遭到了警察的逮捕，在被关押了 40 多天后得以释放。这段反战经历为吉田茂成为战后日本首相增添了政治筹码。



多难的年份，战争早已让日本伤痕累累，偏又祸不单行，出现了特大洪水加上台风的袭击，粮食大规模减产。到了 1946 年演变成了粮食危机，每天都有人因缺乏食物而死亡。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到处寻找粮食。甚至当时天皇外出巡视的专列，也被随行人员从地方索要的米菜装满，全国都被饥饿的恐惧笼罩着。

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状况，单靠力量薄弱的日本政府是无法解决的，尽管吉田茂的前任曾多次向美国人提出了援助请求，但美国人就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为了获得美国的粮食援助，吉田茂迟迟不组阁，跟麦克阿瑟玩起了心理战。他对手下人说：“最好等麦克阿瑟元帅答应供给粮食以后再组阁”。由于政府停摆，各项事业处于瘫痪状态，老百姓的不满声此起彼伏，纷纷到占领当局门前示威。眼见这种被动局面，麦克阿瑟赶紧召见吉田茂，承诺：“我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期间，保证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并很快拍电报给华盛顿要求对日本进行粮食支援，最终在美国人的粮食援助下，日本艰难地渡过了粮食饥荒。

粮食问题解决后，吉田茂开始思索日本未来的发展之路。经过反复摸索权衡，他为日本确立了以经济复兴为中心，以轻武装的国防政策和对美追随外交为两翼的治国方略。这套治国思想作为政治遗产被以后的历届日本领导人所遵循，即使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今天依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之所以要重经济轻军事，吉田茂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量做出的。从历史上说，“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时期确立的基本国策，然而直到二战结束，日本的领导者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强兵之上，穷兵黩武，到处扩张侵略。虽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掠夺了不少的经济财富，但二战的失败，让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80 多年所创造的财富毁于一旦，国家的尊严地位尽失。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也是让吉田茂所警醒的，因此吉田茂对“强兵”有着特殊的排斥。另外，吉田茂认为：“无论是‘纳粹’或法西斯，都是由于国家贫困引起的。‘民主’是富国的产物，要实现‘民主’，首先要让国民吃饱，让国民就业，让国民的生活安定提高，这是至为重要的。”

要想发展经济，就得有资源、资金，而这两大要素对当时的日本来说都十分的匮乏，单靠国内是无法实现的，只能把视野投向国外。而环顾世界，最有科技、军事、经济实力的就是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所以为了获得美国人的资金、技术以及安全保护，吉田茂积极和美国人搞好关系，在外交上紧跟美国。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为了围堵社会主义中国，把日本变成遏制新中国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美国对日本的策略由削弱防范变成了扶植支持。特别是在1951年9月4日，除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日本同48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和约，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同时日本又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式确立了日美同盟关系。这两大条约的签订为日本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空间。

与美国结盟是吉田茂一大外交理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获得美国人“免费”的军事保护，使日本不用在军事上花费过多的投入，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发展经济上。不过随着朝鲜战争的愈演愈烈，美国希望日本重整扩大军备，能够承担起更多独立的防御责任，甚至能够出兵作战。

为此，美国方面要求日本在三四年内组建一支包括800架飞机3万名空军，100艘舰艇1.35万名海军，10个师团32.5万人的陆军部队。然而对于美国人这项提议，吉田茂委婉地加以拒绝。他曾给美国官员用了一个形象的“瘦马理论”进行阐述：“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来决定兵力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仍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

吉田茂生平 +

1878年9月22日

出生于日本东京，生父竹内纲，后过继给富商吉田健三郎当养子。

1906年7月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同年9月到外务省工作，开启职业外交官生涯。

1907年

被任命为日本驻奉天（沈阳）总领事的见习领事官。

1912年

任日本驻安东（今辽宁丹东）领事。

1918年

任日本驻济南领事。

1928年

任外务省次官。

1945年9月17日

出任东久迩内阁的外相。10月币原喜重郎组阁，吉田茂留任外相。

1946年

任日本自由党总裁，同年5月组成第一届吉田内阁，兼任外相。任内按美国占领军指令进行农地改革，制定《日本国宪法》。

1948年3月

任民主自由党（1950年3月改称自由党）总裁。

1948年10月~1954年12月

连续4次组阁，先后任首相7年多。任职期间，签订《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957年2月

加入自由民主党，任顾问。

1967年10月20日

逝世。

01
—
02

01

1954年11月5日，美国纽约，日本首相吉田茂（右2）与（从左到右）美孚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创办人约翰·D·洛克菲勒、参议员J. W. Fulbright及Alexander Wiley交谈。
图/东方IC

02

1962年5月3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访问美国时与肯尼迪在白宫会谈。

的瘦马负荷过度的重载，他就会累垮。”

早在商谈签订《旧金山和约》时，吉田茂就给谈判人员定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禁止日本自身重整军备。不论从和平宪法来说，还是从日本的经济能力和国民的情绪来说，都绝不可以重整军备。”这条原则，不管美国人如何要求，吉田茂就是不妥协。因此当时和日本进行重整军备谈判的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顾问杜勒斯说吉田茂是“懒得重整军备的老狐狸”。吉田茂反对重整军备并不是没有看到军事对日本的重要性，只是在其看来与发展经济相比，军事的发展要排在后面，不能让重整军备拖了发展经济的后腿，奶油比大棒更重要。所以在吉田茂时代，日本的军费开支都是相当有限的。

事实证明吉田茂这条“重经济轻军事与美结盟”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它使得日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经济发展上，加之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得当以及日本国民的勤奋、敬业，迅速实现了财富的高积累，使得日本重新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

吉田茂深知，再有能力的领袖人物都有迟暮衰老的一天，再辉煌的业绩都可能是昙花一现，因此培养接班人很重要。为了让自己的政治理念得到支持贯彻继承，吉田茂十分注意栽培年轻人，并成为了他们从政路上的导师，像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铃木善幸、大平正芳、宫泽喜一等后来的日本首相都是吉田茂派的成员，一时间有人称之为“吉田学校”，以至于“吉田虽死，治国理念犹存”，不得不让人佩服吉田茂的睿智和深邃的战略眼光。

行文至此，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德日两国是不幸的，出了战争狂人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人，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在战后最艰难的时刻出现了阿登纳和吉田茂这样的力挽狂澜者，他们重塑了国家形象。两人都是在近古稀之年成为了国家的领导者，都领导国家获得了重生，并为国家开创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发展之路。①

活跃在东北的近代海军武装

文 | 潘前芝

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曾经活跃着一支近代海军武装。它拥有当时中国第一艘环球航行的巡洋舰、第一艘航空母舰，实力一度全国最强。然而，时代所限，它的命运，虽盛极一时，终难免消亡的命运。

❖ 前身：建立吉黑江防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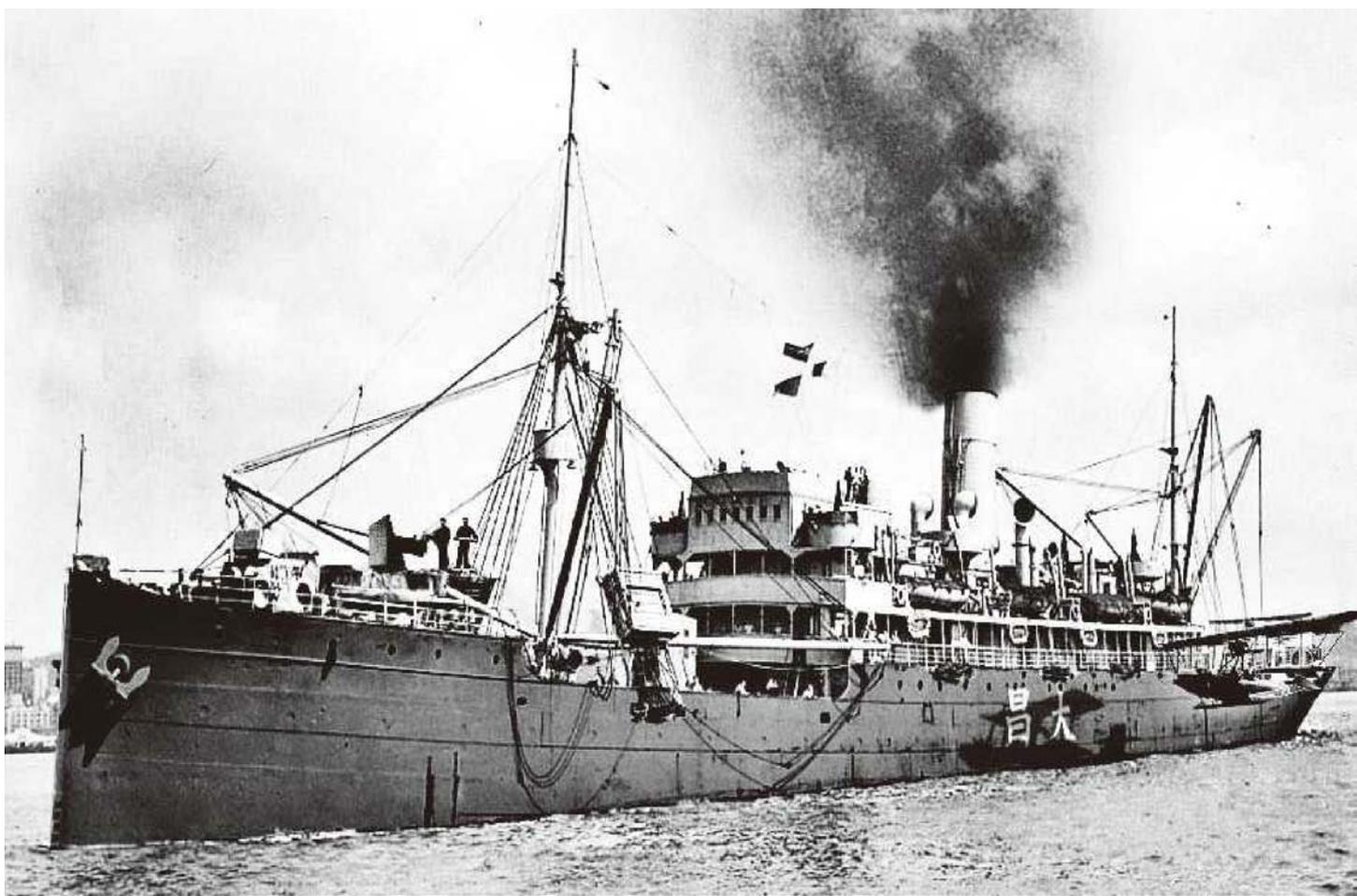
1919年8月，北洋政府海军部为加强东北境内的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航务管理，着令王崇文负责筹备吉黑江防筹备处。王崇文经过

考察调研，以巩固国防、保护航运为由，正式起函呈请海军部建立吉黑江防舰队。王崇文还拟制了江防编制及陆战队配置办法，并呈请以林志翰为陆战队队长。舰队成立后，王崇文被任命为江防司令，设江防公署于哈尔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秘书等处室。

同时，经海军部讨论，决定由上海海军总司令部公署所属第二舰队拨调“江亨”“利捷”“利绥”“利川”4舰，以“靖安”舰长甘联璈为队长，统率4舰经海参崴北上，1920年5月，抵达哈尔滨。

4艘舰艇中，最大的炮舰“江亨”，日本制造，

伪装成“大昌”号商船的“镇海”号舰船，按商船样式在两舷间漆上船名“大昌”二字。



550吨，是航行于长江内的浅水炮舰，续航力和耐波性不强。其余3艘，也是长江内航行的浅水炮舰，吨位比“江亨”还小。这4艘舰构成了吉黑江防舰队的最初阵容。此后，王崇文以“松黑乌三江，绵长六千里，四舰不敷调遣”为由，向中东铁路借了一艘巡船，改名“利济”，并向当时的戊通公司添购了3艘商船，编充军舰，将商船之原名“江宁”改名为“江平”、“同昌”改为“江安”、“江律”改为“江通”，各配以小炮及重机枪，编入军籍。至此，吉黑江防舰队最终建成，共有舰8艘，计2070吨，在松花江内段巡逻，以保护航行商船的安全。

吉黑江防舰队成立后，直接隶属北洋政府海军部。当时的海军部是个空架子，无权无钱，连薪金都发不出来，实在顾不上吉黑江防舰队。所以，舰队的日子并不好过，补充训练更无从进行。三年欠饷达10个月，地方政府又不管舰队的军费支出，所以，每到节日，江防公署只得将库存的兵员皮衣拿出来典当，以解燃眉之急。

欠薪导致江防舰队的官兵人心浮动，寻求解困之计。这为张作霖的介入并接管提供了机会。

❖ 成军：张作霖一手创建

张作霖一开始对海军并不感冒。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战败，他乘火车仓皇出关，经秦皇岛时，被萨镇冰率领的海军第一舰队从海上炮击，损失惨重。经此刺激，张作霖有了建立海军的想法。

逃回奉天后，张作霖宣布脱离北京政府，成立东三省自治政府。正好，王崇文在赴京途中，路过奉天时与张作霖取得了联系。张作霖立即派自己的总参谋杨宇霆与王崇文进行商谈。

1922年8月，张作霖以“江防舰队既驻在东北三省境内自应归三省管辖”为由，向北洋政府提出接管吉黑江防舰队。很快，北洋政府便回复同意。至此，吉黑江防舰队正式归属奉系军阀，成为东北海军的基础。

实际上，张作霖在此之前已经成立了航警处，

管理三省江海防务，委任具有留日背景的沈鸿烈为处长。接管江防舰队后，他授意沈鸿烈对江防舰队进行改编和完善，将吉黑江防司令部扩充为东北江防司令部，所有水警的招募饷械，均由总司令部负责。王崇文仍担任江防舰队司令。

然而不久，张作霖就以经费报销不实为名撤了王崇文的职，改派“江亨”舰长毛钟才代理舰队司令。接着，对各舰舰长也进行了调换，原吉黑舰队舰长仅保留2人，其余舰长和江防司令部的官员都换成了东北军嫡系，奉军掌握了舰队的控制权，东北江防舰队正式建立。

为解决舰艇人才问题，1923年4月，张作霖在葫芦岛创办了东三省海警学校，设航海将校学员班和学员班，凌霄任校长。该校在体制上完全仿照日本海军，教材也多译自日本，在科目上设航海、轮机、枪炮、国文、英文、数学、化学、测量、鱼雷、通信以及陆战等科目，同时还设有军需、医务等部门。航警学校经费由东北保安司令部供给，不作预算，实报实销，经张作霖批准即可。学校的老师及士兵的薪饷较陆军也更为丰厚，学生入学后除服装、学习用品由学校配给外，每月另给大洋三十元。

随后，购买军舰也被提上了日程。1923年7月，在航警处处长沈鸿烈的积极推动下，奉军向烟台政记轮船公司购入2500吨级商船“广利”号，改名为“镇海”。之后的5年时间里，他们又先后通过购买和改装的方式，获舰3艘，分别命名为“威海”“定海”和“飞鹏”。以这些舰船为基本力量，张作霖又成立了东北海防舰队。尽管从实力上看，舰队中的4艘舰艇，大小不均、老少不一。但不管怎样，一支海军武装算是建立了。

作为配套建设，1927年，张作霖在沈阳设立了海事编译局，除编译出版中外有关海军及海事的资料和书籍外，还负责刊行《海事》和《四海》两种杂志，介绍海军、海权、海运等知识，向国人倡导向海洋发展的思想。1928年，张作霖在青岛成立了海军工厂，专门负责修理东北海军大小舰船。次年，在工厂下面又成立了附设的无线电工厂，使东北海军各地机构及军舰都装上了无

线电台。

当时的东北海军负责人沈鸿烈还通过兴办实业为东北海军开辟财源，补贴军费。他任东北航警处长时，根据中苏订立的有关新协定，把帝俄修筑东中铁路时为运输沿江一带建设材料而制备的船舶、码头、船坞、宿舍等资产接收过来，设立海军江运处负责管理和经营，又将经营不善的戊通行业公司改组为官商合办的东北航务局，沈鸿烈自任董事长，把海军江运处管理的轮船投入联营，发展成拥有200多艘船舶的东北联合航务局。这两个机构，对东北海军在经费、人员、物资上颇多支持，1928年节余29万余元，1929年节余31万元，这在民国海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东北海军还办有农场，用拖拉机开垦稻田，积累资金，为海军的伤残病老人员措办福利。

❖ 壮大：兼并渤海舰队

1926年春，奉军正式成立东北海军司令部，同时，吉黑江防司令办公处改组为东北海军江防舰队部。这标志着东北海军正式建成。正式建军的东北海军，沈鸿烈任总指挥，尹祖荫、凌霄分任江防和海防舰队长。同年，东北海军成立了水上飞机队，由黄社旺任队长，在葫芦岛等地设有水面飞机的陆上场地，将“镇海”改为飞机母舰，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军航空兵部队。

东北海军的建成，使奉系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海军。但彼时的东北海军实力比起闽系等海军还是稍逊一筹，直到1927年兼并了渤海舰队后，奉系海军才一举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海军。

渤海舰队原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1917年所率的南下护法舰队蜕化而成。程璧光于1918年2月被刺身亡后，舰队分裂。1922年4月，时任广州政府海军司令的温树德取得舰队领导权。后温树德背叛孙中山，率舰队驶往青岛，改称渤海舰队。温树德本人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舰队司令兼青岛督办。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胜出，奉

系将领张宗昌出任山东省督办兼省长，迫温树德去职，改立鲁军将领毕庶澄为渤海舰队司令。渤海舰队归入张宗昌麾下。1926年夏，渤海舰队所属的“海圻”舰因年久失修，在旅顺口船坞进行维修。沈鸿烈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旅顺，待“海圻”舰一进船坞，马上集合“镇海”“威海”“定海”三舰于旅顺，对“海圻”进行监视，又买通日本人，不开闸放“海圻”走；同时，又对“海圻”舰上的官兵进行物质引诱。因渤海舰队归鲁后，



张作霖一开始对海军并不感冒。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战败，他乘火车仓皇出关，经秦皇岛时，被萨镇冰率领的海军第一舰队从海上炮击，损失惨重。经此刺激，张作霖有了建立海军的想法。



军饷也不能按时拨给，面对东北海军的利诱，“海圻”舰官兵很快同意归顺。“海圻”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巡洋舰，由英国制造。“海圻”的归顺，使东北海军实力大增。

1926年，因军饷问题，渤海舰队内部纠纷不断。沈鸿烈在取得张宗昌的支持后，以平乱的名义率“海圻”“镇海”“威海”3舰，“带有新式飞机两架，停泊前海暗行监视”。同时，沈鸿烈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先补发给渤海舰队一个月的饷金，又通电渤海舰队各舰长“限五日后答复，若不听调动，最后用武力解决，亦所不惜云。”沈鸿烈所带飞机，每日升空绕飞一周，以示威胁。

01 | 02
03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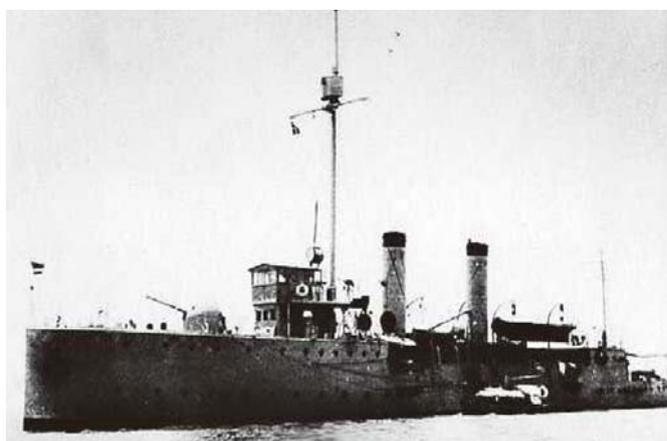
张作霖。

02

从渤海舰队并入东北海军的“永翔”炮舰。

03

民国海军部。



渤海舰队内乱平息后，张作霖为统一海军起见，将东北舰队、渤海舰队所属舰船打乱混编，将“海圻”“海琛”“肇和”“镇海”等实力较强的几艘大舰编为海防第一舰队，担负远海任务，舰队长为凌霄，驻青岛；“永翔”“楚豫”“江利”等较小的几艘炮舰编为海防第二舰队，执行近海任务，舰队长袁方乔，驻长山岛。江防舰队仍负责吉黑江面的巡防，舰队长仍为尹祖荫。至此，渤海舰队正式直接隶属东北海军。渤海舰队番号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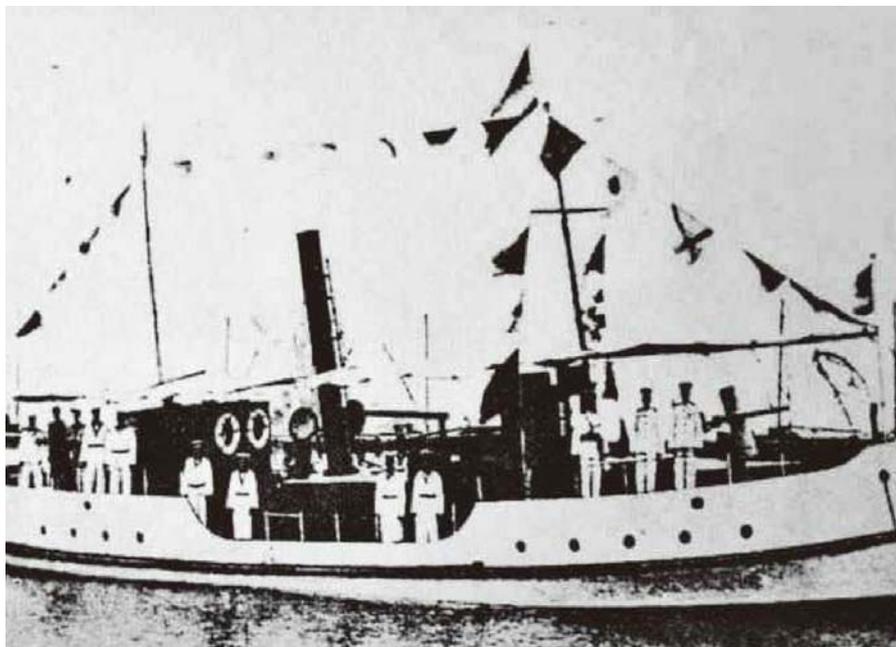
兼并渤海舰队后，东北海军军舰数量大增，大小舰船 20 多艘，占到全国海军军舰总数的 77%，实力迅速增强，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东北海军成军后，大大小小也打过几仗。比如南下袭扰东南沿海，扰乱北伐军后方，破坏海上军运，与已易帜归附国民革命军的闽系海军之间的战斗。

1927 年 3 月 26 日，东北海军的“海圻”“镇海”两舰在沈鸿烈率领下，首次南下袭击吴淞口。

为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海圻”舰伪装成意大利三个烟筒的同型舰，“镇海”则按商船样式在两舷间漆上船名“大昌”二字。

战斗发生在早上，江上晨雾朦胧，太阳尚未升起，两舰灭灯驶过“海筹”舰侧方约800米时突然集中火力猛轰。“海筹”没有戒备，受伤20余处，水兵亡9人。其他舰船急忙起锚上驶。“海圻”偷袭得手后立即掉头快速驶向长江口外。28日凌晨，“镇海”在长江口，碰见由闽来沪的“江利”炮舰，即用舰上两门主炮攻击。“海圻”听见炮声也发现了“江利”，便掉过头来快速截击。在两舰夹击下，“江利”被迫投降，抛锚后，用舢板把炮门和枪支送到“海圻”舰上。“海圻”派大副带武装水兵20余人登上“江利”，监押“江利”起锚。“海圻”在前，“江利”在中，“镇海”殿后，一同北上。这一仗是旧中国海军之间第一次舰队对舰队的交锋。东北海军偷袭成功，闽系海军受重创。此后，双方又爆发过几次战斗，但规模都不大。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海圻”“镇海”在长江口附近抛锚，吊放水上飞机到海面。飞机起飞后飞到上海高昌庙上空投下几颗小炸弹，因有薄雾，命中率不高，投在了郊外，没有造成损害。当时的报纸称：“淞沪一带屡被惊扰，间且侵及苏、浙、闽三省口岸，炮火轰攻，出没靡定”。



❖ 衰亡：源于内耗

1929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召开海军编遣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把全国海军编为四个舰队：以福建系的海军为第一、第二舰队，直属中央海军部；广东系海军为第四舰队，归陈炯明指挥；东北海军编为第三舰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管辖，不受制于中央海军部。其时，东北海军虽在名义上被编入全国海军序列，但东北海军以没有国民党组织为由，拒绝悬挂国民党党旗。这支部队仍然是以独立的地方军队形式存在。

“九·一八”事变中，同江战斗中损失惨重

01	02
----	----

01

东北海军的“海燕”号炮艇，大沽造船所建造，1917年完工，曾作为张学良的游艇，抗战爆发被日军俘获。

02

青岛海军学校。前身即张作霖创立的葫芦岛海警学校，1933年8月搬至青岛，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



的江防舰队被日军诱降。海防舰队因驻泊山东没有遭受损失，但在财源上却受到很大影响，官兵的军饷供给出现问题，由此引发连续的内乱，以“崂山事变”和“薛家岛事变”为标志，东北海军在接二连三的内耗中走向消亡。

“九·一八”之后，沈鸿烈经张学良同意，撤销了东北江海防总司令部，组建东北海军舰队司令部，沈鸿烈任司令，其余舰队编制不变。重新组建后，沈鸿烈把舰队的人事和行政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沈鸿烈的大权独揽，引起了凌霄、方念祖等下属的不满。凌霄与时任青岛市长的胡若愚关系不错。胡若愚答应辞职后保举他当市长。未几，又传出蒋介石将任命沈鸿烈接任青岛市长。凌霄认为是沈鸿烈挡住其升官之路，怀恨之情日增。1931年12月初，沈鸿烈到崂山视察在那里训练的舰艇。刚到下清宫就被凌霄等人软禁起来，迫使其称病辞职，由凌霄代理司令。由于凌霄发动的崂山事变只是少数人的密谋，大部分亲沈鸿

烈的下级官兵并不知情。所以他们闻讯后，“海圻”舰副长董沐曾、“海琛”舰副长李信候等人立即组织人员控制了各艘舰艇。董沐曾派“海圻”舰上的上尉队长关继周率兵前往下清宫将沈鸿烈救出。

沈鸿烈获救后，为表示宽宏大量，安定军心，仅将凌霄等为首的数人资遣他去，并没有追究其余同党责任。救他脱困的董沐曾等人也分别予以提升和奖赏。然而，自恃有功的关继周等东北派青年军官因没有达到跃居要职的愿望，对沈鸿烈的奖赏并不满意。关继周屡次要求沈鸿烈在市府为其安排要职，沈鸿烈都“未允所请”。沈鸿烈再次成了矛盾焦点，东北派青年军官由亲沈转为反沈，又引发了第二次内讧。

1933年夏初，董沐曾准备对“海圻”“海琛”“肇和”三舰进行人事调整，将关继周等东北派青年军官调任到其他舰，以便全面控制三大舰。消息走漏，关继周迁怒于沈鸿烈，决定趁沈鸿烈到舰上检阅训话之际，将沈置于死地。6月24日，沈鸿烈到“镇海”舰向集中于此的各舰舰长进行训话。担负刺杀任务的“镇海”舰二副冯志冲以舰值日官身份带小火轮到码头接沈鸿烈。回航途中，沈鸿烈的卫兵发现冯志冲举止反常，在冯志冲拔枪之际，一拳将其打入海中。冯志冲落海后连开数枪，都未击中沈鸿烈。

冯志冲被捕后，停泊薛家岛的东北派军官，齐集“海圻”舰开会。大多数人认为事情败露，急需采取保命措施。“海圻”舰副长姜西园乘机煽动开走“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反沈南下，得到大家同意。翌日，东北派军官得知冯志冲已被枪决，便将三大舰驶泊崂山，通电迫沈鸿烈去职，后率舰南下投奔了广东粤系陈济棠。

三舰是东北海军的主力，其叛逃对东北海军的打击是沉重的。沈鸿烈本人的威信也受到严重打击，只好引咎辞去海军司令和青岛市长之职。此后，东北海军被中央海军收复正式编为第三舰队，“东北海军”的番号也被取消。^①



美国“原子安妮”核大炮试射时的壮观情景。

魔鬼的大炮

——美苏冷战中的疯狂兵器

文 | 匡济

美国与苏联曾经有过持续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漫长争霸，起于二战胜利，终于苏联解体。争霸虽烈、矛盾虽深，双方却并未有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发生，故而名为“冷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第一个就在于双方手中都有核武器，这是争霸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因素，也是双方比拼的主要焦点。你造一颗原子弹，我要造两颗；你造氢弹，我也要造……在这种“核武竞赛”的紧张氛围下，一种号为“冷战魔炮”的疯狂兵器，带着恐怖杀气，来到了世上。

❖ 缘起美军内斗

核武器是人类有史以来破坏力最为惊人的兵器，也是最具威慑力的兵器，但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怎么运载、怎么发射，简单讲，就是如何扔到敌人头上去。

用轰炸机运载投放，是核武器发明之初唯一的打击方式，如当年对日本广岛、长崎的核打击就是用两架经过改装的B-29“超级空中堡垒”战略轰炸机施行。这种方式风险颇大，万一遇到敌方战斗机拦截，后果不堪设想。故而美国一直积极发展其他打击方式，考虑的额外方案除了新兴的导弹外，还有传统的大炮。

准确的说，是巨炮。当时海军庞大的战列舰上装有口径超过400毫米的巨炮，能将差不多一吨半重的炮弹打到四十多公里外。而轰炸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虽自重四吨多，但核装药只有数十千克，其余都是弹体、起爆炸药，将其缩小精简到一吨半难度很低。

照此逻辑，空军之后，能打核弹的就应该是

海军了。答案却是陆军。

原来美国并无独立空军，那是一直附属于陆军的航空兵，不料二战中表现出色，加上制空权战略思维的影响，战争结束，这支航空兵就独立成军了。以前的自家下属，摇身一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同僚，美国陆军自然有想法。何况战后经济不太景气，大批军人复员，军费缩减，各军种之间都要挖空心思、编造名目从国会那儿争夺“口粮”。空军依靠其核打击王牌，屡屡得手，陆军如何咽下这口气？

陆军又有什么兵器能打核弹？大炮？陆军的大炮口径至多不过240毫米，只能将一百多公斤重的炮弹打到二十公里外，想用其来打核弹，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过当时美国陆军在巴拿马运河部署有一种406毫米巨型岸炮，性能与海军巨炮差不多，奈何体积过于庞大，接近五百吨重，装在一个大型钢筋混凝土炮台上，根本就无法机动。

焦头烂额之际，一种从纳粹德军那里缴获来的兵器让陆军眼前一亮——K5型列车炮。

所谓列车炮，就是用列车作为运载工具，拉着大炮四处跑。德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十分注重发展铁路，连带着将其作为重型炮兵的机动方式，先后研发多种列车炮，K5是其中极为优秀的一种。自重两百来吨，以两台十二轮机车即可进行机动，最大射程超过一百五十公里。这种火炮曾在二战意大利安齐奥战役中给美军造成严重伤害，被称为“安齐奥·安妮特快”。

时间紧急，也就无需另起炉灶了。1949年，美国陆军的核打击研究组将这种列车炮作为改造对象，正式启动核大炮计划。其负责人罗伯特·斯



瓦特兹在五角大楼一处房间中进行封闭式研发，两周就完成了改造方案，然后又转战该项目的承包商新泽西州皮卡汀尼兵工厂，在兵工厂的专家协助下，继续进行几周的封闭式研发以作完善。

即便这位斯瓦特兹是火炮天才，这种神速也未免有些太过头了，但在陆军高层看来，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斯瓦特兹拿出来的方案不过就是对德国人的K5稍加改动，最大的“手术”也只是把那两辆十二轮铁路机车换成了两辆八轮牵引卡车，再削减削减重量，去除了铁路上用的那些框框架架后，“减肥”到了八十多吨重。

因为这层血统上的关系，“诚实”的美国陆军将此炮唤作“原子安妮”，意为“安齐奥·安妮特快”在核武器时代的加强版本。

炮造好了，就看配套的核炮弹了。陆军的核炮弹研制工作紧随核大炮，在1950年展开，大约用了三年，号称研制成功，编号为MK9，近三百公斤重，以“原子安妮”的能耐，能打到三十多公里外。至于威力，由于重量的原因，只有轰炸广岛之原子弹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对于大炮而言，这也很是惊人了。以当时的火力标准计算，“原子安妮”一炮，相当于陆军四千门155毫米重炮齐射！

号称成功，并非真正成功，还必须得上战场检验，没有战场？那就上试验场。

1953年5月25日，当地时间上午八点半，第一门“原子安妮”被拉到设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靶场，开始第一次试射。此次试验代号为“Grable”，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中的第十次，也是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

至于观众方面，那也是重量十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陆军部长……军方大人物之外，还有七十多名国会议员，至于记者和普通观众更是多达三千余人。历史上一门大炮的试射有如此盛大场面，还是前无古人的头一回，就差总统驾到了。

但那位负责试射的炮手，陆军中校唐纳德·哈里逊，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他也不敢激动，因

为要去拉动那开炮绳的人是他，那可是装的一枚核炮弹，刚刚出厂，从未试射过，要是质量不过关，炸膛的话……

军令如山，时间一到，哈里逊在军人神经的指挥下，机械的一拉。没有炸膛。

只见那颗极度危险的核炮弹砰然冲出炮口，向预定的目标区域飞去。大约飞行了十一公里后，炮弹在半空中爆炸。

巨大的火球、腾起的蘑菇云、扑面而来的热浪与冲击波、耀眼的光芒……观众一片沸腾。

只是不知如此近距离的核爆炸之下，那飘荡在内华达沙漠上的辐射尘，钻到这些人的身体中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近距离参与此次核试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Arthur W. Radford 后来死于癌症，恐怕就与此有关。

陆军立即宣布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新闻媒体则是大肆渲染美国手中又多了一根核大棒：“以前要用飞机扔原子弹到敌人头上，现在用大炮就能做到！这就是美国的进步！”

但在陆军的死对头，空军眼中，这种言下之意要和他们的轰炸机争个高低的核大炮其实是一个可笑的玩具。别的不说，单单是那八十多吨的大家伙要移动到阵地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试射那天可是直升机引导、大批军车护卫开道，小心翼翼才到了阵地上，这要真到了战场上，敌人还会等你如此慢悠悠地摆好？再说号称三十多公里的射程，试射却只打了十多公里就要提前引爆，莫非陆军心中有鬼？即便真能打到三十公里，相比于当时射程动辄就是三十多公里的苏联火炮也全无优势，搞不好还没打就被人家猛烈炮火给覆盖了。

其实陆军心中还真是有鬼，最大的鬼就是“贵”，太贵了！为了那场引爆眼球的试射，足足花了好几百万美元。正因为下了血本，陆军更不可能放弃“原子安妮”，曾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的艾森豪威尔，对这种军种之间的争斗岂能不知。反正他需要的也只是核威慑力，而不是实用价值，这一点，打起来惊天动地的“原子安妮”完全可

二十门核大炮被量产了出来，平均造价超过八十万美元，这些烫手的山芋一部分被运到欧洲西德，那里是对抗苏联的前线地区。另一部分则被送到韩国，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不久演起了“核讹诈”的把戏。

以胜任，那场面还是很惊人的嘛。

于是二十门核大炮被量产了出来，平均造价超过八十万美元，这些烫手的山芋一部分被运到欧洲西德，那里是对抗苏联的前线地区。另一部分则被送到韩国，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不久演起了“核讹诈”的把戏。

上面的人玩的不亦乐乎，下面的普通士兵和基层军官却苦不堪言。在西德和韩国的日子里，一个这样的大家伙，就得几百人伺候。为了防止被敌人侦测到阵地，每过几天就要拖着它转移阵地，还是在林多茂密的森林里！

最令这些守卫者恐惧的是，以当时武器的发展与战争的演进，一旦有事，这种大炮根本等不到开火的机会。因为从准备到装弹再到发射它至少需要十五分钟，那还是训练时的最好成绩，战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话，恐怕得需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苏联坦克都杀到你面前了！或者是一顿狂轰滥炸，引爆了核炮弹，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根据武器发展和淘汰的基本规律，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不到十年就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时它试射过的地方周围正在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核示威游行，因为当地老百姓担忧他们遭了核辐射。时至今日，还有八门“原子安妮”残存于世，呆在美国多处博物馆中。

❖ 苏联天才怪作

核大炮在美国很不受待见，在苏联却很受重视。当时斯大林已经逝世，在武器偏好上，他酷爱大口径火炮，而接替他的赫鲁晓夫，思维则已经进化到了导弹时代。按理说，赫鲁晓夫应该以导弹的标准，一眼就看穿什么核大炮不过是美国内部斗争的产物，是一种无用的核废物。但军界的惯性思维与政界一样，不是短时间就能转换过来，将军们在强烈建议也造几门出来，加上西方媒体的大肆渲染，造成一种威胁十足的印象，迫使赫鲁晓夫也不得不下令：立即研制苏联的核大炮，而且要比美国的大！

承担此项重任的单位，乃是苏联陆军赫赫有名的格拉宾设计局，其领衔人物格拉宾技术上将是苏联火炮界的权威人物，二战结束时苏军装备的十四万门火炮中，有超过十二万门都是按照他的设计制造出来的。

但即便是专业如格拉宾，对于原子大炮也是云里雾里，没有多大把握。在他看来，要用这种东西发射原子弹，根本就是不懂科学的外行玩笑。但上面不仅要他造一个出来，还要求比美国人的大。

结果他也采取抄近路的方式，将斯大林生前念念不忘却最终流产的“苏联”级战列舰之主炮搬了过来，口径 406 毫米，炮身自重二十多吨。从这两项数据上看，是既比美国人的“原子安妮”口径大，重量又轻了许多，改造难度小得多。

谁知上级的意思是要自行化。也就是要将这门大炮装到一辆坦克底盘上，让其能自行机动，变成一辆自行核大炮。这就难于登天了。

先不说那坦克底盘是否承受得了如此巨大的重量，只算那大炮发射时的后坐力，就知道这应该纯属科幻故事了。

当时苏联最为重型的坦克 T-10，也是预定计划中核大炮的底盘改造对象，自重不过五十来吨，而那 406 毫米主炮发射时的后坐力是多少呢？超过八百吨！

格拉宾还真是天才。他并未以纯粹武器或者



传统火炮思维来对待这个核时代的怪物，而是上升到了国际政治高度：主要目的不是真要造出实战用的核大炮，而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挑衅，那么，只要比美国人的大就行了，至于实战能力，理论上具备即可。

于是，他采取了给核炮弹加装火箭发动机的方式，将核大炮发射时的后坐力大幅度降低到底盘勉强承受的程度，只求能将那核炮弹打出炮膛，剩下的路就靠自己身上的发动机吧。

反正也不可能有什么试射。因为他根本没有把握保证试射时自行核大炮会不会轰然解体，然后伴随核炮弹提前爆炸！

这种实战能力相比于“原子安妮”更加堪忧的武器被加班加点地造了出来，编号 2A3，赶上了 1957 年 11 月 7 日的红场大阅兵。

西方大为震撼。为之起绰号为“聚光器”，意为那巨大到与车身严重失调的炮管能聚集死亡的辐射之光。

他们的情报人员随后探听得知苏联还在研制一种更大的家伙——口径 420 毫米！

苏联内部代号为“273 工程”的此物，乃是紧随“聚光器”而来的核大炮加强版，其 420 毫米口径的巨炮以及核炮弹都在吸取“聚光器”的基础上，经过重新设计优化，并非简单的将炮口扩

大了事，其二十多米长的炮身能赋予七百多公斤重的核炮弹一定的初速，再加上炮弹自身的火箭发动机，号称能打到四十五公里开外，射速方面也颇为出色，五分钟一发。全面压倒“原子安妮”，只是从未上场一现真身。

这种武器不知何时静悄悄地出现在了圣彼得堡炮兵博物馆中。产量则是一个谜，其实真正的性能数据也是一个谜，上面提到的都是公开报道，早有西方专业人士怀疑这种巨大的怪物可能只是一个唬人的模型，所以才会如此保密，生怕漏了马脚。

至于曾经慢悠悠地压过红场，让西方军事观察家们吓了一跳的“聚光器”，也只造了区区四门，不到四年就全部退出现役了。

❖ 恐怖的中子炮弹

“原子安妮”和“聚光器”等核大炮相继黯然谢幕，却并不意味着美苏在用大炮打原子弹这件疯狂事上的谢幕。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将第一代不成熟的试验之作淘汰了，换上更加成熟的进化版本来。

美国在这方面的热情尤其高涨，因为其陆军力量，尤其是装甲部队比不过苏联。冷战高峰时期，

01 | 02

01

黯然退役后放在博物馆供游人观赏的苏联 406 毫米核大炮。

02

现存放在圣彼得堡炮兵博物馆的苏联 420 毫米核大炮。

苏联仅现役坦克就超过五万辆，美国还不到一万辆，如此大的差距，绝非空中优势能够扭转。故而后者认为，若大战爆发，要抵挡这股“红色铁流”，必须依靠前线炮兵发射大量的核炮弹。

于是美国陆军再接再厉，于“原子安妮”之后，继续以重金投入核炮弹小型化的研制中，并在1956年，也就是“原子安妮”试射后大约3年，就发展出了一种口径203毫米的核炮弹。这是为当时美军大量装备的M110自行榴弹炮量身打造，虽然弹重仅百来公斤，爆炸威力却超过万吨TNT炸药，差不多是“原子安妮”的两倍。

此后短短几年功夫，美国陆军又发展出口径155毫米的核炮弹，重量才五十多公斤，装备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营级单位，一旦交战，就有三千多门核大炮可以执行前线反装甲部队的核打击任务，破坏力十分可观。这种核炮弹也引起美国海军兴趣，下了不少订单，装备到他们的军舰上。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种更加恐怖的核炮弹出现在美军武库中，这就是中子炮弹。所谓中子炮弹，简单讲就是一种采用特殊技术制造出来，以专门杀伤人员为目的的邪门核武器。据美国史料称，这种武器的发明者美国物理学家塞姆·科恩，是因为目睹朝鲜战场的废墟，产生了“要终结战争”的念头，进而构想出了一种专门杀人却不会留下太多核污染的中子炮弹来，他称其为“有史以来最为道义的武器”。这位“仁慈”的美国科学家一度想劝说美国总统尼克松用中子炮弹打越战，幸亏尼克松脑袋清醒，没让他得逞！不过中子炮弹在对付苏联“红色铁流”方面的潜力却被美国陆军看中：丢一颗中子弹下去，那些蝗虫般的坦克因为里面的乘员被悉数杀死，进入无人驾驶状态，等待美军前去接受！这多好！

美国陆军相继发展出了口径203毫米和155毫米两种中子炮弹，其上装有密码保险系统，输错密码就自动锁死，无法爆炸。

在武器进步神速的同时，也有不少“核笑话”出现。如在“原子安妮”诞生后不久，美国陆军就拿出了—种堪称历史上最小的核武器——M388核

●●

中子炮弹是一种以专门杀伤人员为目的的核武器。据美国史料称，这种武器的发明者塞姆·科恩，是因为目睹朝鲜战场的废墟，产生了“要终结战争”的念头，进而构想出了一种专门杀人却不会留下太多核污染的武器。

●●

火箭筒。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火箭筒，可以发射一种缩小到二十多公斤的核火箭弹，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小的核武器。爆炸威力接近二十吨炸药，而且辐射量惊人，对付集群步兵有奇效。但要命的是射程太近，最大不到四公里，由此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射手自己也会在“奇效”之下丧命。更要命的是，如此近距离运用的武器，还能等到开火的那一刻？需知当时苏联坦克的火炮射程都超过了五公里，你还只能打到四公里以内，更不用说那些射程达三十多公里的大口径火炮了。明为打人，实则是让人打，还是一个区别于寻常靶子的“核靶子”，伺候它的炮手一定会觉得自己陷入了危险的黑色幽默中。大约美国陆军当时是被苏联庞大的坦克部队逼疯了，才想出这种可笑的自杀式兵器，并顽强地存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退出现役。

美国如此疯狂，苏联又怎能“稍逊一筹”。在陆军力量对比上，苏联本来就有压倒性优势，火炮更是其一贯所长，故而在核大炮的发展上，苏联也是颇为“出色”。其核炮弹装备范围极为广泛，大口径火炮基本上都有配备，特别是为了适应其装甲化、机械化陆军，这些核大炮都实现了自行化，战时将成为“红色铁流”的一部分，伴随冲锋，如有需要，就会边走边打出核弹来。那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

尤其可怕的是一种名为“郁金香”的自行迫击炮，其研制之初，就是以发射核炮弹为必备性能。结果是搞出来口径巨大到240毫米，在自行迫击炮中至今都是世界第一。其所配备的核炮弹爆炸威力相当于两千吨TNT炸药，看似不及美军“同行”惊人，却因为这种迫击炮独特的吊射弹道（曾在车臣战争中将十几层楼高的建筑一炮炸塌），具备一定的钻地能力，对修建在地下的工事有极强破坏力。

幸运的是至今这种钻地核炮弹都没有得到爆炸的机会。当年“原子安妮”那一颗飞了十多公里就匆匆爆炸的核炮弹，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核大炮的发射记录。

但愿那也是永远的唯一。①



香港抗日保卫战： 74年前的战争遗迹

文 | 王残阳

在 中国香港，关于香港保卫战有两个专有名词：一个是“十八日战事”，即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日军在18天内打败驻港部队、占领香港；另一个是“三年零八个月”，即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香港在日本铁蹄下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色统治，港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牺牲与痛苦。

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岁月湮灭了曾经坚固的工事，今日的中国香港街头，除了海防博物馆的展览和各类工地不时挖掘出的战争遗留炮弹外，已经很难寻觅当年香港保卫战的遗迹。然而，人们没有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没有遗忘包括华籍英军、义勇军和东江纵队在内地所有香港同胞的奋力抗争和不屈灵魂。走在香港街头，探访散落在僻静山野的各处香港保卫战遗存，还能感受到74年前日本侵略者发起的那场残酷的战争。

❖ 广福桥：日军铁骑的震颤

在香港新界，大埔林村河之上，有一条红柱绿瓦的行人桥，老人们悠闲地坐在桥栏上，听着粤剧，品着香茗，惬意地享受着午后的悠闲时光。与行人道平行的单车道上，不时有锻炼的骑行者穿梭而过，带来一阵疾风。桥下的河道里，停泊着几艘小船，随着河水轻轻荡漾。

这道行人桥重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看起来丝毫没有历史的沧桑感。只是走近桥身，才能看到上面安装着旧桥拆卸而来的石栏杆，桥头石

上“广福桥”三个字清晰可见。

这里，本应是驻港英军抵抗日军的第一道防线，却成了任凭日军长驱直入、纵横驰骋的通途。

1941年12月6日至7日，即香港保卫战爆发前的那个周末，港督杨慕琦还在出席半岛酒店举办的慈善舞会，政府机关和商行照例休假，驻港英军的乐队为赛马会演奏助兴，部分官兵在球会畅玩橄榄球，很多市民忙于圣诞节前的采购，战争阴云笼罩之下的香港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即将爆发的大战，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日本人已经在深圳河沿线严阵以待，如虎狼之师随时准备扑向香港这块他们覬觐已久的“肥肉”。日军兵力包括华南派遣军（第23军）指挥官酒井隆中将、第38师团师团长佐野忠义中将麾下的三大联队：228、229、230联队，以及北岛冀子雄炮兵团、第一炮兵队、第一飞行师团第45战队，还有新见政一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遣华舰队，合计约4万人，构成了陆海空联合打击力量。

英军的实力则相对较弱，驻港英军三军司令莫德庇少将指挥的陆军主力为由英军和印度籍士兵组成的4个营，包括皇家苏格兰步兵团第2营、米杜息士团第1营、第7拉吉普团第5营、第14旁遮普团第2营和炮兵、工兵部队，共约11000人；为应对战事，英军从香港本地招募平民组成义勇军，主要由英国人、印度人和华人组成，人数为1387人；海军主力为3艘1916年S级驱逐舰、4

1941年12月，香港街头进攻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机枪队。
图/FOTOE

艘浅水炮舰和部分炮艇；空军仅有5架老旧的战斗机可以投入战斗，分别为3架没有鱼雷挂架的角羚式鱼雷轰炸机、2架海象式水上侦察机。

能够让莫德庇少将稍感安慰的是，在其前任驻港英军司令贾乃锡少将向英国政府极力游说争取下，战前不足一个月内，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派遣了来自温尼伯榴弹兵营及皇家来福枪营，共2个营1975人的援军抵达香港，使莫德庇能够指挥的陆军主力达到6个营。然而，这些加拿大士兵大多数为新兵，很多人第一次摸枪，缺乏战斗经验，对香港地形地貌一无所知，他们尚未做好准备来面对一场惨烈的战争。

12月8日，在发动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偷袭行动的同时，日军开始对香港实施行动。凌晨，日本大本营向酒井隆中将发出“花开、花开”的暗号，命令其向香港发动进攻。作战从8日上午的空袭开始，来自广州的日军战机轰炸了香港，停放在启德机场的5架英军战机相继起火爆炸，一艘停泊在港湾的驱逐舰被击沉。

与此同时，日军兵分3路跨过深圳河，快速向香港新界地区进军。驻港英军按照战前拟定的作战计划，直接放弃了深港一线前沿阵地，派出工兵四处破坏大埔公路和九广铁路，并动用蝉号炮舰对岸轰击，企图延滞日军的进军速度。但是由于日军发起突袭，包括广福桥在内的部分桥梁并没有被摧毁，至8日黄昏时日军已占领新界大埔和沙田一带。

20世纪40年代，广福桥还是一道可容一辆大车经过的行车桥梁，日军的军马拖着山炮在桥面上轰隆隆驶过，留下让历史颤抖的回响。

❖ 城门碉堡：“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倒塌

在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香港城门郊野公园，有一条著名的徒步线路——麦理浩径横穿于此，是远足爱好者向往的人间胜境。

走近麦理浩径六段M124标距柱，细心的探访

者就会发现“荒废战壕、切勿内进”的警示标语。经过一番仔细寻找，笔者找到了掩藏在青草丛中的台阶，拾级而下来到一处宽阔的大厅，设有密集的机枪眼、小口径炮的炮座和通风口，周边有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交通壕。交通壕的入口处，刻有“摄政街”“牛津街”等伦敦街名，铭刻着那些曾经驻守在此的英军对故土的眷恋。在一处墙壁上，“若林队占领”的刻字触目惊心。

这里就是城门碉堡的遗迹，是当年驻港英军苦心经营的“醉酒湾防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固守九龙半岛最重要的屏障。1934年至1938年，英军修建了横跨九龙半岛北部的大型防御工事“醉酒湾防线”，以西部的葵涌醉酒湾为起点，穿过金山、城门水库、毕架山、狮子山、大老山，直至东部西贡牛尾海，全长约18公里，沿线遍布地堡、机枪阵地、战壕、水泥掩体等防御工事。因充分利用山峰等有利地形、易守难攻，英国人得意地称之为“东方马奇诺防线”，声称至少可以坚守半年时间。

1938年，英军决定把香港防卫重心退回港岛，并且把“醉酒湾防线”的用途更改为拖延日军推进，不再用以死守，防线因此而停工。直至1941年11月中旬，随着形势趋于紧张，驻港英军才陆续重返“醉酒湾防线”，继续修整工事，熟悉地形，进行备战。英军苏格兰营、旁遮普营和拉吉普营分别驻守防线的左翼、中段和右翼。

1941年12月9日晚，日军228联队抵达位于“醉酒湾防线”左翼中段的城门碉堡前沿。这时，日军收买的当地线人提供了一个绝密情报：本应由120人组成的苏格兰营A连驻守的城门碉堡，当晚只有30多人驻守，防卫较为薄弱。228联队队长土井定七大佐喜出望外，擅自改变作战计划，连夜发动对城门碉堡的偷袭。日军从碉堡上方的通气口向下投掷手榴弹，把很多英军炸死在碉堡内。经过一番激战，日军以较小的代价歼灭守军，至10日凌晨占据阵地。

虽然土井大佐作战有功，但因打乱了日军进

01
—
02

01

1941年10月，香港街头。两个月后，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美国摄影师卡尔·迈当斯拍摄。

02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香港新界大埔北盛街。图/FOTOE



攻部署，受到了日酋酒井隆中将的严厉斥责。228联队下属的第10中队指挥官若林东一中尉因率先攻克城门碉堡观测站，部队自身损伤又较其他中队要少，因此攻克城门碉堡的战功便记在了他身上，被树立为日军攻占香港的功臣。1943年，若林东一战死于太平洋战场上。

74年之后，再观“若林队占领”，依然让人感到阵阵悲痛。这几个字，见证着“东方马奇诺防线”的轰然倒塌。

❖ 昂船洲炮台：香港义勇军的悲壮

夏日的傍晚，穿过一条劈山而建的登山小道，来到了昂船洲西炮台遗址。昔日的威武重炮已经难觅痕迹，只剩下一个圆形的混凝土基座，周围长满了茂盛的杂草，透露出几许孤寂、荒凉的意味。极目远眺，近处维多利亚港两岸繁华、远处九龙和新界的靓丽风景尽收眼底。

扼守维港西面进出口的昂船洲，是驻港英军苦心经营的军事重地。从1881年至1905年，英国军队相继在此兴建了东炮台、中炮台、南岸炮台、西炮台、亚比安炮台及百夫长炮台共6座炮台。到1912年，除西炮台外，其他炮台均遭废弃。1935年英军调整布防，西炮台共设有3门重炮，但1937年有2门转移至其他炮台。香港保卫战期间，整个昂船洲只剩下西炮台的一门6英寸口径的海防炮，应付凶猛来袭的日军。

负责操作昂船洲炮台的，是刚刚从平民中征召入伍的香港义勇军，而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1941年12月10日，当英军指挥官得知城门碉堡失守后，命令昂船洲炮台向城门碉堡开炮，企图压制日军的攻势。然而，义勇军忙中出错，部分炮弹打入了在碉堡南侧金山的英军阵地。此时，占据城门碉堡的日军趁机架设山炮，一并轰向了金山守军，导致金山守军遭遇较大伤亡。

12月11日中午，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下令驻守“醉酒湾防线”和九龙半岛的部队全部撤离，



固守香港岛。由于英军此前已制定了完善的方案，撤退过程大致顺利，在撤走途中还破坏了各类工事和油库、仓库等重要目标。昂船洲炮台继续发炮，掩护英军的撤离，在与日军激烈交火中，大部分炮台设施遭到摧毁。11日下午，香港义勇军破坏了炮台后，乘船横渡维港，安全抵达香港岛。至12日，日军占据九龙和新界的绝大部分地区。

至此，英军原本希望固守半年的“醉酒湾防线”，在交战仅2天后，就连同整个九龙半岛一并落入日军手中。而昂船洲沦陷之后，日军在此

扩建海军基地，建立无线电接收侦听设备，原本威武的西炮台阵地，因为地势高、地盘大、风景好，成为日军休闲娱乐、开展运动的处所。

1941年，日军轰炸下的香港。图/FOTOE

◆ 奥斯本塑像：缅怀一个英勇的灵魂

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公园，环境幽静，绿树成荫，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这里原本是英军占领香港后，最早的兵营所在地。目前的茶具博物馆，是旧驻港英军三军司令官邸。在公园内，

还可以找到旧兵营的界石。

在旧三军司令官邸前侧，树立着一尊持枪的英军士兵塑像。这尊塑像原本安放于原驻港英军奥斯本营区，主要用于纪念在香港保卫战中，为救战友英勇牺牲的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准尉约翰·奥斯本。香港回归祖国之前，这尊塑像搬移至现址。

时光回溯至74年前。随着九龙半岛的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岛，战事延伸至英军固守香港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港深边境；

奥斯本准尉在战斗中数次将日军投掷的手榴弹掷回敌军阵地，但当他捡起最后一枚手榴弹时，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已经来不及抛出去了，奥斯本一下子扑在手榴弹上面，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至少6名战友的安全。

第二道防线为“醉酒湾防线”；第三道防线为香港岛）。作为重点防守的要塞，英军沿着香港岛海岸线，构筑了一圈包括摩星岭炮台、白沙湾炮台、西湾炮台、歌连臣炮台、赤柱炮台等在内的密集工事。驻港英军回撤港岛后，莫德庇少将守军重新编成东旅、西旅两个旅，负责港岛东部、西部的守卫任务。每个旅下辖英军、加军和印度籍士兵各一个营，进入沿岸工事，投入对日军作战。

从1941年12月12日开始，日军和英军隔着维多利亚港，进行激烈的炮战。期间，日军数次派出特使劝英军投降，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日

军还安排了两次试探性的登陆行动，也被英军顺利击退，战事进入短暂的胶着阶段。

12月18日，日军第二遣华舰队在港岛南面出现，佯装从南侧登陆，干扰英军判断。而日军主力则于12月18日晚选择从香港岛北岸的太古、北角等地登陆，向守军实力较弱的印度籍拉吉普营发起猛攻，香港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在当夜的激战中，日军相继占领鲤鱼门要塞、西湾炮台，并向南大潭及浅水湾推进。拉吉普营营长卢连臣中校率领印军沿柏架山道撤退。

12月19日，占领登陆阵地的日军源源不断地向港岛调兵遣将，占领了港岛东部沿海阵地和三座山头，英军东旅向南撤退，旅部迁至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

此时，日军集结优势兵力，向侧翼暴露、防线出现漏洞的英军西旅发起猛攻，进攻目标是黄泥涌峡。这里是西旅旅部所在地，一旦失守，英军西旅将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英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夺，终于于19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230联队占领了西旅指挥所。在旅长罗逊准将率领下，包括秘书和厨师在内的20余人均拿枪应战、向外突围，不幸全部阵亡。加拿大援军最高指挥官罗逊准将，成为在香港保卫战中牺牲的职级最高的指挥官，也是加拿大在二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日军为其英勇抗争的精神所折服，在指挥部前为罗逊准将举行了安葬立碑仪式。战后，港英政府拆掉了这座坟墓，迁葬至西湾坟场。

19日下午3时左右，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A连在毕拿山与日军激战，奥斯本准尉在战斗中数次将日军投掷的手榴弹掷回敌军阵地，作战十分勇猛。但当他捡起最后一枚手榴弹时，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已经来不及抛出去了，奥斯本毫不犹豫，一下子扑在手榴弹上面，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至少6名战友的安全。英国政府向他追授代表最高军事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成为香港保卫战中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军人；港英当局还将九龙塘兵房

命名为“奥斯本军营”，以资纪念。

❖ 赤柱炮台：驻港英军最后的抵抗

在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半岛，临海而建的赤柱炮台气势磅礴，居高临下扼守着东博寮海峡，直面辽阔的南中国海。登上一号炮床，规模宏大的战备工事可藏纳百余名官兵同时作战；远望二、三号炮床，曾经的防卫工事已经改为卫星通讯站，设有成群的卫星通讯天线，是港岛对外联络的通信枢纽。

赤柱炮台兴建于1937年，主要用于防范日军从香港岛南段大规模登陆，3个炮床上各放置一座9.2英寸口径的重炮。这里是香港岛南段防卫的要塞，在港岛防卫作战中，西旅指挥部即在此开设。

1941年12月20日至25日，日军与驻港英军在港岛进行了激烈争夺，英军节节败退，相继丢失炮台山、金马伦峡、马己仙峡、礼顿山等防线，兵力基本龟缩至太平山部分阵地和赤柱半岛一带。最为致命的是12月23日，日军攻陷港岛最大的水库即大潭水库，守卫水库的义勇军第三连全部战死；25日，日军攻陷英军守卫的最后一个水库黄泥涌水库，彻底切断了英军东旅和西旅。此时，城内水源、煤气、电力全部中断，卫生环境日差，传染病横行，日空军不时轰炸，不少市民死亡。

1941年12月25日，这一天在香港被称为“黑色圣诞节”。25日下午，在日军前锋部队抵达港督府前的花园道时，港督杨慕琦宣布英军投降。傍晚，港督杨慕琦、驻港英军三军司令莫德庇少将等港英当局高官乘坐天星小轮横渡维港，来到设在九龙半岛酒店的日军指挥部。酒店因为盟军的空袭而停电，在336房间，烛光映照出杨慕琦惨白的脸色。他成为1781年英军将领康沃利斯向美军投降以来，英国160年历史中首位因失守殖民地而投降的官员。这些港英高官当即被软禁在半岛酒店，后来被关押至多个不同监狱。直到二战结束，解放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无意中在沈阳



在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他们捡起英军遗留的武器，先后参与大小战斗上百场，成为让日本侵略者胆寒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战俘营发现了杨慕琦，他才得以恢复自由。1946年，杨慕琦复任港督。

在港督下达投降命令后，绝大部分英军放弃了抵抗。驻守赤柱的东旅指挥官华里士准将虽然接到了投降命令，但是他却不敢相信，因为此前，他对港英高官反复宣称的“英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深信不疑。他要求进一步确认消息，但是通讯已经中断，华里士准将继续指挥赤柱炮台的3座9.2英寸口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229联队，造成了日军较大伤亡。直到26日凌晨，华里士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旅才宣布投降，并交出了所有的武器。

至此，香港保卫战全部结束。为期18天的战斗中，英军共计有1679人死亡，1042人失踪，10818人被俘；日军则有692人死亡，1662人受伤。英军司令莫德庇受到了日军指挥官酒井隆的鄙夷和嘲讽，因为日军认为，近八成的部队放弃抵抗、向敌军投降，是一个军队指挥官的耻辱。

战争中及战后，日军相继发动了西湾炮台屠杀、慈幼修道院屠杀、赤柱炮台屠杀等惨案，并对香港平民进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投降的英军被关押在赤柱、深水埗等战俘营，数百名战俘受虐致死。此外，运送1816名英军战俘前往日本的“里斯本丸号”被美军鱼雷击沉，1000余名战俘丧生。

❖ 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 东江纵队的传奇

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有一座十二边形的纪念龛，里面存放着为保卫香港而阵亡人员的名册和铸刻阵亡队伍名称的木匾，墙上镶有“英灵不灭、浩气长存”八个醒目大字。

香港抵抗日军侵略的历史，凝聚着华人的不懈抗争，流淌着华人不屈的鲜血。香港同胞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感情，与全体中华儿女一道救亡图存、投身抗战，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的不可



1940年，香港政府宣布进入非常时期，并开始兴建防空洞及撤离居港欧籍妇孺。图/FOTOFE

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历史不会忘记，在整个民族抗战过程中，香港同胞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踊跃为国内的抗争捐款捐物，积极转运战备物资，组成回乡服务团投入抗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历史不会忘记，千余名华人加入了英军和义勇军，英勇地参加香港保卫战。在英军战败投降前，近1000名华人及混血儿士兵被要求脱去军装、混入平民，避免不必要的伤亡。随后，他们有的加入英军服务团，有的还参与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

历史更不会忘记，在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这一支唯一的抗日武装，继续在此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他们捡起英军遗留的武器，先后参与大小战斗上百场，伺机袭击日军据点，夜袭启德机场、炸毁市区4号铁路桥、破坏沙田

铁路隧道，截击日军运输队，伏击汉奸、特务，成为让日本侵略者胆寒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在此期间，港九大队克服重重困难，从香港营救出海、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700多名知识分子。此外，他们还向盟军提供军事情报，营救了8名因日军击落其飞机而跳伞到九龙的美国飞行员，长期支援英军服务团进入香港建立情报系统，营救了包括赖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在内的多名英军战俘，还有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的人士近百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

（本文参考资料：刘深《香港大沦陷》、高添强《香港战地指南1941》和《野外战地遗迹》、高马可《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叶裕《香港行山全攻略：军事遗迹探究（新界及港岛篇）》等。）

酷历史

Cool History

影像记趣

民国时期的 中国体育

酷历史版块编辑：黄弋
邮箱：klsbjhy@163.com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
在许多方面自主或被迫地加速了近代化的
进程。体育事业的发展亦是如此。由于
内忧外患，当时的进步人士普遍倡导“体
育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但随着西
方思想文化的进一步激荡，国人对体育精
神有了更多的认知。民国时期，中国体
育开始向体育竞技、健身、休闲娱乐的
观念转变。

随着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确立，体育开始由学校向社会渗透，现代体育文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不仅有更多的社会精英分子关注中国体育的发展，而且有更多的民众开始关注大大小小的体育运动。

1948年5月，上海江湾体育场，“中华民国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女子跳水比赛。图/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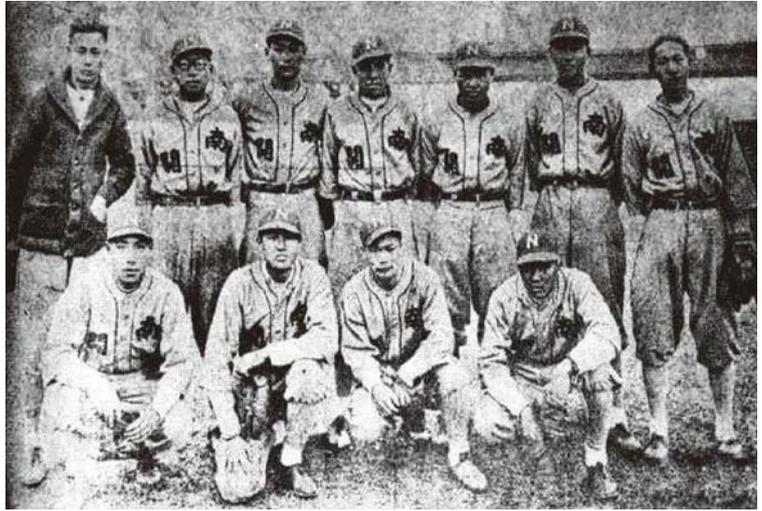


1931年建成的位于南京的中央体育场是当时远东第一大综合性运动场，分为田径赛场、游泳池、棒球场、篮球场（与排球场合用）、国术场和网球场六个部分，另外还有跑马场、足球场等。各场皆有看台，总共可容纳观众六万余人。

1933年，“中华民国第五次全国运动会”在中央体育场隆重开幕，有来自全国33个代表团的2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东北秘密入关的、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奥运会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等人。当时东北沦陷已两年多，他们几经辗转才来到了南京。

在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无论是学校体育，还是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体育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重新翻开民国时期的运动照片，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的中国人在运动中那种自然流露的欣喜与活力。❶



01	02
	03
	04

01

1948年5月29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举办体育舞会，女大学生跳起欧洲上流社会宫廷交际舞。
图 / FOTOE

02

1933年，天津南开棒球队合影。

03

1933年，照片上的一位军人和一位市民正在购“中华民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入场券，运动场的看台上已是人山人海。

04

1935年，“中华民国全运会”女子网球冠军王春青。
图 / FOTOE



01	03
02	

01

民国初年，黑龙江哈尔滨打冰球的市民。图 / FOTOE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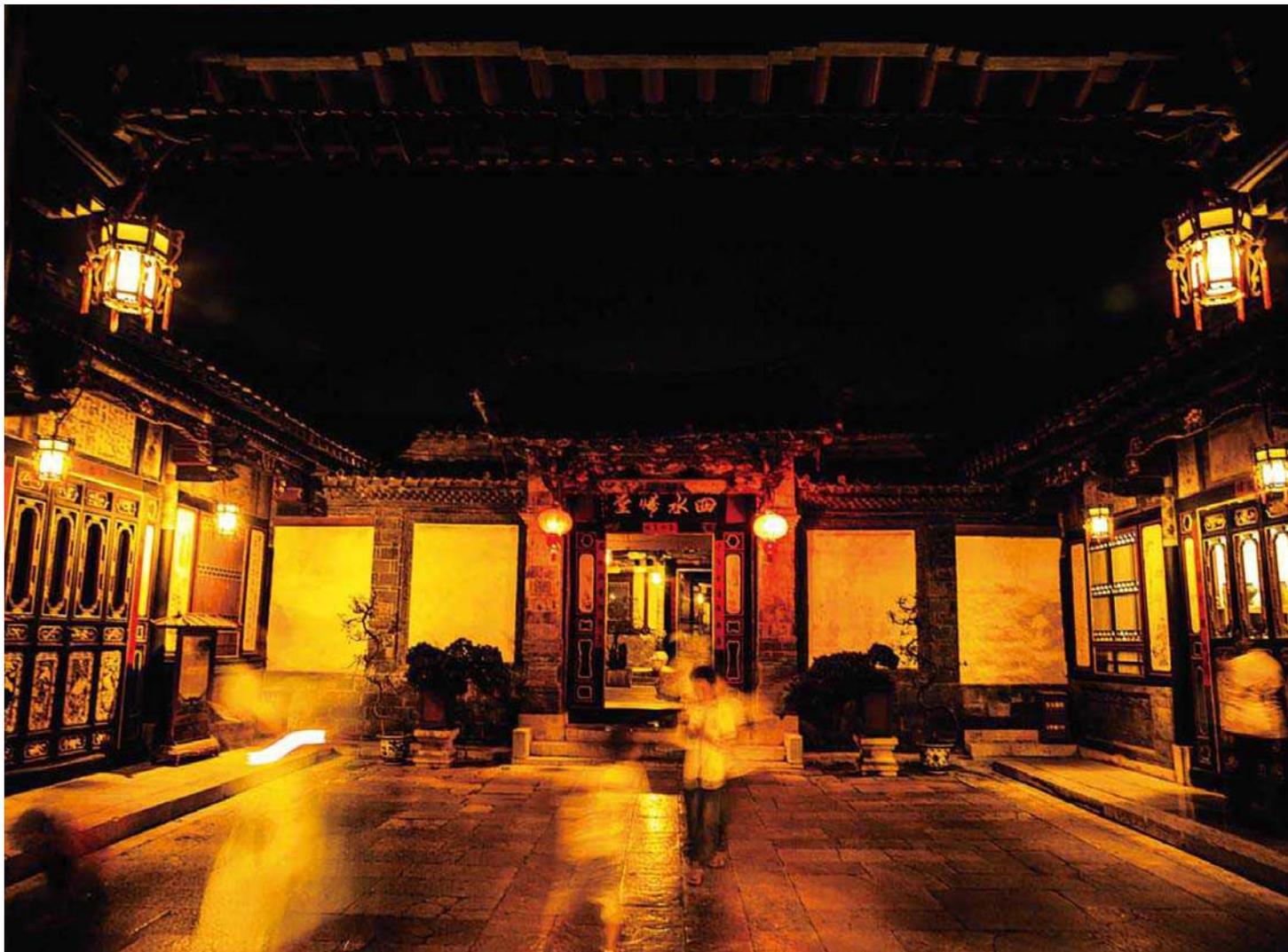
民国时期，蒙古摔跤表演。图 / FOTOE

03

1933年，甘肃甘南当周草原，藏族赛牦牛。图 / FOTOE







建水紫陶的锅中乾坤

文 | 储建兰

西边边陲古城建水，古称“临安”，有十道源于明朝、兴于清朝并流传至今的名菜——雪地金花、山羊脆乳、会乡亲、象芽菜、青儿白娘上金山、云田熟藕、板井大豆腐、桂湖乌鱼、颜洞鲤鱼、汽锅鸡，称为“临安十肴”。其中“汽锅鸡”是用建水特有的紫陶汽锅为饮具

烹炖出来的美味佳肴，为云南省唯一上国宴的一道名菜。

❖ 从汽锅鸡讲起

据当地人讲述，汽锅鸡是古时临安（今建水）



在生坯陶面上书写绘画时，绘画者心中必须有整个陶器，得结合陶器本身的器形进行装饰、布局，让整幅书画和陶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不让人觉得突兀、生硬或牵强。



一位姓杨的厨师发明的。在建水，汽锅鸡做法并不复杂，只要有汽锅、适当的食材，寻常人家都能做。做汽锅鸡，一般先将洗净的鸡块和葱姜等调料一起放入汽锅中，然后将汽锅安放在合适的锅口上，再用面糊、绵纸糊住接口处，旺火蒸四五个小时，最后把葱姜等调料捞出，撒一点点胡椒，汽锅鸡就做成了。做汽锅鸡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往锅里放过水，最后烹煮而成的汽锅鸡却有鲜美的汤。这全得益于用建水当地粘土制造而成且造型独特的汽锅。

云南建水是著名陶乡，盛产紫陶。紫陶的一大产品是“汽锅”。这“锅”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锅，它外观似钵而有盖，揭盖一看，锅中央有突起圆腔通底，俗称气嘴。汽锅不能直接置于明火上使用，下面需有合适的、放入足够水的底锅。底锅通过气嘴给汽锅输送源源不断的、滚烫的蒸汽，将汽锅内的食物烹煮成熟。同时，这些蒸汽又通过气嘴进入汽锅内，成为烹煮食材的水，最后形成鲜美的汤。建水人称这个过程为“炆”，因此，用建水紫陶制作而成的汽锅在建水又叫“炆锅”。

汽锅是建水紫陶工艺品中炊具、煮具的代表器具。“临安十肴”之一的汽锅鸡之所以能深受广大食客喜爱并进入国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水紫陶产品——汽锅独特的取材和制造工艺。

对于建水紫陶的特点，当地制陶艺人的描述是：镇浆制泥、手工拉坯、湿坯装饰、雕刻填泥、高温烧成、无釉磨光。有资料形容建水紫陶“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花瓶装水不发臭，花盆栽花不烂根，茶壶泡茶味正郁香，餐具存肴隔夜不馊”。

建水紫陶曾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中国“四大名陶”，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鲜为人知。

❖ 时间流转里的建水紫陶

建水紫陶并不是新兴工艺品，而属于民间传

统工艺品，工艺制作历史源远流长。建水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末年，而紫陶的制作则稍晚一些，始于元末明初，成熟于清朝。在建水紫陶的原产地建水临安镇碗窑村流传着“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的说法。当地的人们通过这样的说法来肯定建水紫陶的工艺的高妙，透露出内心的自豪。

具体从哪年开始建水有了紫陶制作工艺，已无从考证，就连碗窑村的当地人也无法说清楚了。一次，在碗窑村后的山坡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已静卧几百年的元代古窑遗址。遗址附近的残片堆积层里还混杂着宋代的青瓷、元代的青花瓷和以明代为主的青釉粗陶残片。至今仍在制作紫陶的碗窑村以及村里这些古窑遗址、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残碎的陶片、断碣残碑都还在默默讲述着碗窑村悠久的陶瓷生产的历史。

如今，在世人对传统工艺的再度关注下，建水紫陶也开始重新走到台前：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建水紫陶与江苏宜兴陶、广州钦州陶、四川荣昌陶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陶。1992年，建水紫陶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获得美术大奖。2008年，建水紫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紫陶非紫砂

但是，关于建水紫陶也有不少误解与质疑的声音，如“建水紫陶是否就是紫砂？”又如“部分建水紫陶工艺品已进入产业化生产，是否很容易造假？”

面对这样的混淆与质疑，建水紫陶工艺制作者们总会微微一笑，然后放下手里的活，慢悠悠但从容、自信地回答到：“建水紫陶就是建水紫陶，不是紫砂。紫陶产品目前还没发展到需要造假、可以造假的地步。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紫陶产品也需要耗时几天，需要慢工出细活，急不得。”

也许这不温不火的回答无法立刻说服质疑者，但如果提问者能耐心了解完建水紫陶工艺的整个

2015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古城。这里历经12个世纪建设，至今保存有50多座古建筑，被称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图/东方IC

制作过程，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再是“问题”了。

为什么说“建水紫陶不是紫砂”？这是因为建水紫陶的泥料取自建水碗窑村，是当地特有的五色粘土，收缩率高且粘性好；而紫砂的原料则是石质砂料，收缩率和粘性都不高。除此之外，在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上，二者也有显著的不同：建水紫陶多为手工拉坯，在装饰工艺上采用阴刻彩填，无釉打磨、抛光；而紫砂则多为机压坯，装饰工艺采用阳刻，不打磨抛光。

原材料的不同是建水紫陶和紫砂的根本区别所在。据相关史料记载，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制陶匠人潘金怀改进了建水紫陶的传统制泥方法：将不同的粘土分别捣成细碎的粉末，

筛掉粗砂，把不同的粘土粉末按照特定比例进行调配，再放入缸内加水制成泥浆搅拌淘洗。等含砂的浆泥沉落到缸底，用瓢或者勺舀上面的漂浆倒入另一只缸内作第二次淘洗。反复淘洗五六次之后，让泥浆在封闭状态下自然凝结成泥。这时的泥料已经细腻如膏脂，不掺杂砂粒。细腻的泥料在湿润状态下的可塑性相对较弱，因此，建水紫陶一般不采取灌浆注模的方式制成器型，也不适合于制作大型器件，也因为此特性，成就了建水紫陶可以在器物表面做细微雕刻填泥和无釉磨光的特殊工艺。这便是建水紫陶与其他含砂陶器最本质的区别。

而人们关于建水紫陶是否易于造假的疑虑也可以放下，原因简单明了：建水紫陶的原材料——



01 | 03
02 |

01

云南名菜：汽锅鸡。
图 / FOTOE

02

2015年云南昆明，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展出的建水紫陶精品。图 / 东方IC

03

建水紫陶：撒口尊，云南铁路博物馆。图 / FOTOE



Tips

建水沿革：唐南诏时筑惠历城，汉语译为“建水”。宋大理国时期属秀山郡阿白部。元时设建水州，明代称临安府。清乾隆年间改建水州为建水县。

五色粘土只有碗窑才有，且目前储量足够，能够满足当地建水紫陶工艺制作作者的原料需求。

建水紫陶工艺制作目前已有部分进入产业化进程，作坊渐渐减少，产业园区的兴建使得建水紫陶工艺品的部分生产工序由机器代替。但目前所有的建水紫陶工艺制作坊（厂）都从碗窑特定的泥料生产作坊里购买原材料。

❖ 建水紫陶之金石韵味

购买了原料之后，建水紫陶制作才开始？不，早在选料、研磨、制浆、沉淀成泥时建水紫陶制作工艺就已经开始了。任何一件建水紫陶工艺品的完成都需要历经几十道工序，“镇浆制泥”算是第一道工序，接下来还有“手工拉坯”“湿坯装饰”“雕刻填泥”“高温烧成”“无釉磨光”几道主要的工序。每一道主要工序又分解成好几道小工序，建水紫陶工艺制作者们就这样耐心地、秉持“慢工出细活”精神和习惯，完成几十道工序，做出紫陶工艺品。

“湿坯装饰”“雕刻填泥”看起来似乎只是寻常的建水紫陶制作工序之一，但实际上这两道大的工序一点儿也不寻常。在历代建水紫陶工艺制作大师们的努力下，因为有了这两道主要的工

序而使建水紫陶产品跻身“高雅”工艺品之列，以其鲜明、庄重、典雅、别致的艺术风格蜚声海内外，成为人们喜爱的收藏珍品，并登上大雅之堂，进入我国名陶之列。

刻填工艺使建水紫陶具备了可绘制、可镌刻的特性，也成功将书画艺术转化为紫陶装饰艺术。其他各地名陶，大多从造型和品种上下功夫，而建水紫陶擅长把书画搬上陶器，艺术风格鲜明。“湿坯装饰”“雕刻填泥”就是在湿坯上绘制图像，然后用足刀（足刀，一种以扇骨打磨而成的刻刀）根据绘制的图像进行雕刻，挖去需要去掉的坯泥，形成凹槽，再利用预先调配好的不同色泥进行填充，刮平精修坯面后入窑烧制。对于形象复杂、色彩较多的图像，则需要采用复刻复填工艺和刮泥、绞泥、抹泥等技术展现其细节变化和色彩层次。

这两大工序十分考验制作作者的工艺技术，从书写绘画到雕刻再到填泥，每一步都需要工艺制作作者极致的耐心和精湛的技艺。

在建水紫陶上书写绘画的难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充分考验了书画家对笔的驾驭能力和章法布局能力。建水紫陶的生坯陶面非常光滑，带有弧度，且不会像纸那样会吸墨，书画家在书写绘画时蘸墨多少都要拿捏得当，时刻保证笔的走势跟着陶器的弧度走。此外，在生坯陶面上书写绘画时绘画者心中必须有整个陶器，得结合陶器本身的器形进行装饰、布局，让整幅书画和陶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不让人觉得突兀、生硬或牵强。

雕刻时则需要“刀客”胆大心细，下手稳、准、狠，刀法流畅。“刀客”能做到刀法流畅的前提除了其本身技艺精湛之外还有制泥时的反复淘洗直至粘土变得细腻如膏。建水紫陶制作工艺中的每一道工序都得用心对待，因为一旦有一小步没有走好，整个制作工艺都将受到影响，无法做出预期的陶器。填泥则要求有绘画功底，知道什么地方用什么色，彩填时必须做到刻一道填一道，非常耗费心力与时间。

经过“湿坯装饰”“雕刻填泥”等工序后烧制而成的建水紫陶在装饰上不仅能够表现书画笔

触墨迹的细微变化，还因镌刻工艺而呈现出了自然斑驳、浑朴古拙的金石韵味，给人以无限美的艺术享受。

❖ “雅陶”出建水

建水紫陶发自民间，但充满了儒家审美的旨趣，造型讲究中正、圆融、稳重、匀称之美，形态端庄，缘线自然流畅、大方舒展。纪录片《雅陶出建水》就曾专门记录、展示了建水紫陶的典雅与别致。建水紫陶的“雅”集中体现在其质感之美和装饰之美上。

建水紫陶的装饰之美是集诗文、书法、绘画、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美。传统建水紫陶特别讲究在陶器上呈现出制陶者高超的书画技艺和高雅的文人情趣。哪怕只是一只很小的建水紫陶茶壶，也能呈现出隽永的诗文、典雅精致的书画、恰到好处的布局。

历代文人雅士多有参与建水陶器的书画装饰工作，并以此展现个人的笔墨功力和审美品位。据史料记载，从清末到现代，无数的书画名家为建水紫陶的发展、兴旺和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王定一摹仿断简残篇，以真草隶篆行书于其上，显得古朴雅致。还有刘光烈的板桥体书、王式稷的金文、王克敏和王孝全的花卉翎毛、王宪斌的竹子、王垂书的草书、肖茂园的山水、沈河清的鱼虾、马吉生的菊花、向逢春的山水、人物、梅兰竹菊、各种字体等。

正因为这些书画名家、文人雅士的参与，将书法、绘画、图案再创作于紫陶上，让原本单调的陶器获得了较高的艺术附加值。以陶为纸，使建水紫陶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传承于世。文化艺术的渗入，让建水紫陶挣脱了实用的限制而上升为一种艺术经典。也因为文化的渗入，建水紫陶拥有了另外的生命，于是有了“雅陶出建水”。欣赏建水紫陶，更多的是欣赏建水紫陶承载的文化内涵。

“雅陶”之所以出自建水与建水的地理位置、

建水紫陶器具不上釉，而是打磨抛光。这样的质地更适合多次使用，越使用，越沾了人间世俗气息反而感觉陶器越是圆润、可人。

历史变迁、文化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

建水，位于中国版图的西南一隅，却在历史上一度成为滇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和交通枢纽。南来北往之人多经此地，多元文化在此相融，形成了独特、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中原文化进入建水，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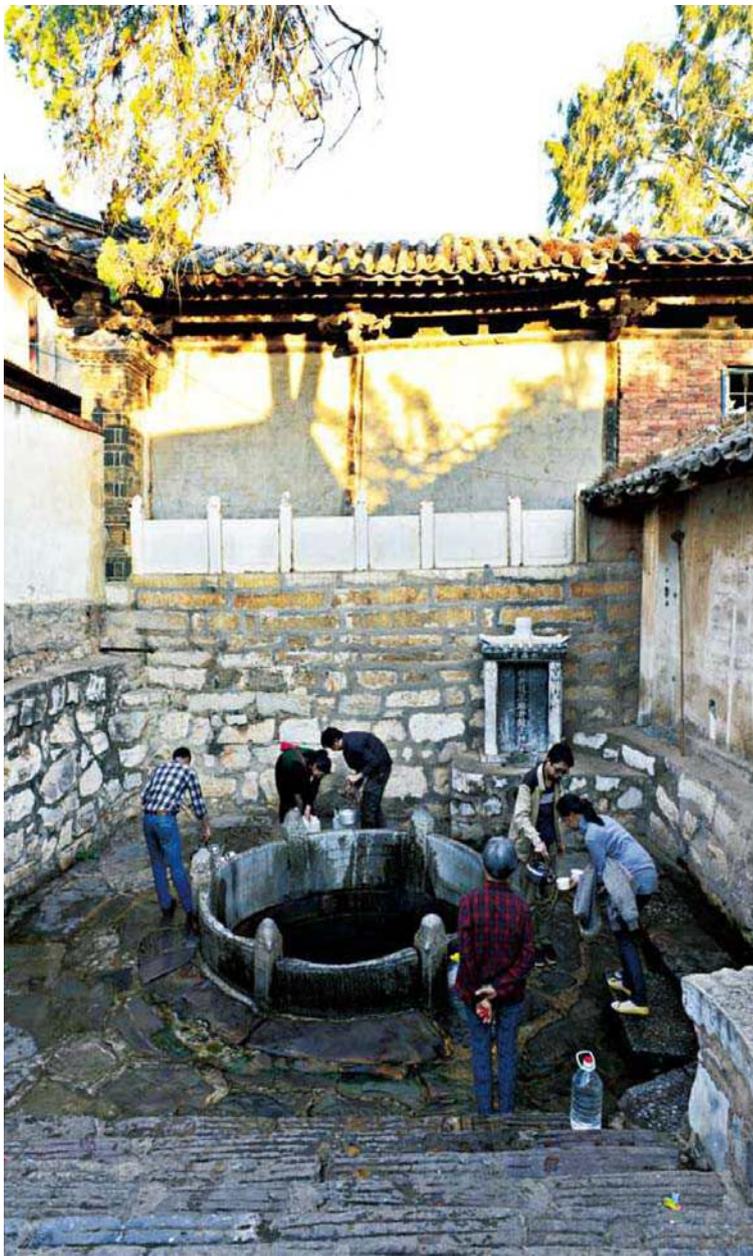
建水历来被誉为“文献名邦”，文教昌盛。据史料记载，明清开科取士，有时云南的一榜举人中，临安（建水）学士就占了半榜之多，于是建水有“临半榜”的美誉。

此外，建水有全国第二大孔庙，由此可见，儒家文化确已在这边陲小城生长、扎根。

多元的文化滋养出了建水独特的文人雅士，为“雅陶出建水”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同时，建水紫陶也成了建水多元文化的载体，作为“媒介”，带着建水的独有的美走向更远的地方。

❖ 紫陶与建水的俗世之美

可是，不管走多远，建水紫陶的根在建水是永远不变的事实。正如不管作为装饰品或者收藏品的建水紫陶变得多么高雅，作为容具的建水紫



明云南建水西门大板井（水井），原凿于明朝时期。图/FOTOE

陶仍是建水寻常人家的寻常物件一样。一位研究建水紫陶的学者曾这样说过：“‘用’是体，而‘用’之本还是‘用’，虽然使用只限于物质的方面，而不能看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但生活却是

物与心的交融。‘用’是对物的使用，也是对‘心’的使用。建水紫陶的出现和存在都是因为‘用’，建水陶造型特征的确立也是因为‘用’，功能和适用是建水紫陶作为工艺的基本性质。”

现在的建水紫陶产品中，茶具是外地人眼中所谓“高雅”产品的代表，也是建水紫陶不同工艺产品中销量不错的产品。但建水人并不会刻意将其誉为“高雅”产品，因为茶具、汽锅这样的建水紫陶器具本就是建水寻常人家的寻常物件。它们安安静静地存在于建水人家的生活里。

建水紫陶器具不上釉，而是打磨抛光。这样的质地更适合多次使用，越使用，越沾了人间世俗气息反而感觉陶器越是圆润、可人。

某种程度上，建水的人们也满足并习惯现世安稳的生活。对于建水，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编撰的《滇略》中有过这样的描绘：“临安之繁华富庶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鱼螺之产，不可殚述，又有铜锡诸矿，辗转四方，商贾辐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悠闲安适的建水人，当然也才有了圆润、中正的建水紫陶陶器。

而在建水，安稳的世俗生活是怎样的呢？

清晨，在阳光尚未透过浓密的树叶铺洒到建水的青石板路上时，挑西门水的人已经起床了，沿街吆喝着：“西门水，西——门——水……”悠长的尾音唤来了一个个拎着瓶瓶罐罐来买水的人。趿拉着拖鞋、睡眼惺忪的人们买完水又踩着清扫完又洒过水的青石板回家去。

夜幕降临时，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家，从底锅里取下炖了大半天的汽锅鸡，拨开柴灰捂着炭火，支上烤架，烘上西门豆腐。等一个个豆腐块儿在炭火的烘烤下变得鼓鼓囊囊、胖嘟嘟时，汽锅鸡也刚好凉到合适的温度。男人们倒上当地酿造的包谷酒，女人调好蘸水，盛饭。孩子们则早已等不及，不顾大人的阻拦偷偷从烤架上抓一个胖嘟嘟的豆腐块儿，蘸上蘸水，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吃完饭，端一个大茶缸，泡上建水的野山茶，一家人边聊天边喝茶……①

有魔力的卡片：以信用之名

文 | 林海

第一张现代意义的信用卡是1950年由美国一家俱乐部为其会员所开发的。在它最初问世的日子里，常常有人聚集在收款台前看别人怎样用塑料片付账。很快，这种便捷支付方式风靡全球，同时也制造着坏账危机。从公元前2000年的两河流域到现代的金融危机，从先贤的排斥到现代人们对信用卡的依赖，关于信用卡的由来和发展，本文讲讲信用卡那些事儿。

❖ 曾经借贷不得收利

假如放在人类历史长河里看，信用卡的历史不但是短暂的，甚至还是有些怪异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非但不鼓励“寅吃卯粮”，还对有偿借贷存在抵触情绪。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和阿兹特克法典中，都有关于借贷小麦和牲畜的条文，明令禁止收取借贷人的利息。

较为例外的情况发生在两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的苏萨地区就出现了有偿借贷。人们可以向商人借金银，也可以贷粮食。国王制定的法律专门规定了借贷的利率，一般商品年利在20%左右，大麦等特殊商品利率则高达33%。借贷商人的办公室甚至搬进神庙，神庙同时也成为放贷机构。1901年12月出土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即包括了债务商人和高利贷方面的规定，甚至规定“欠债到期不还的人，责令其妻子和儿子两人到债主家里充当奴隶三年，第四年恢复自由。”

在古希腊文明中，人们也对有息借贷存在着排斥。柏拉图认为货币借贷生息是可耻的：“不得通过高利贷获得高额利润……应禁止有息借贷。（对于已存在借贷的地方）应该允许得到借贷的人拒绝偿还贷款，包括本金和利息。”他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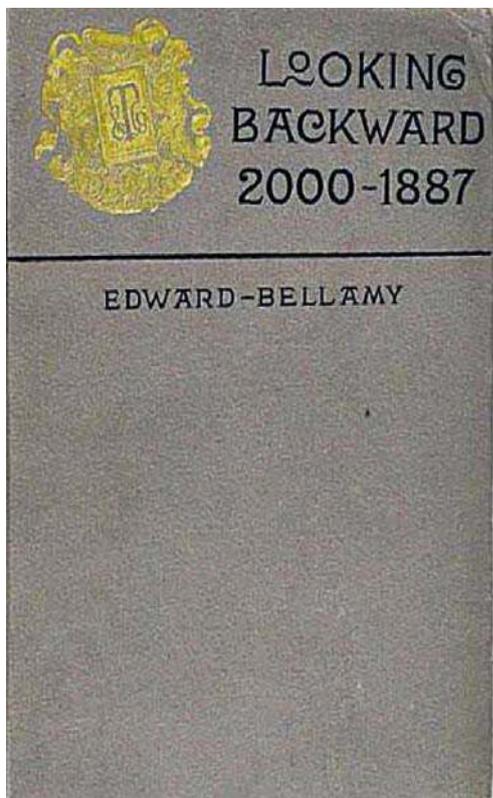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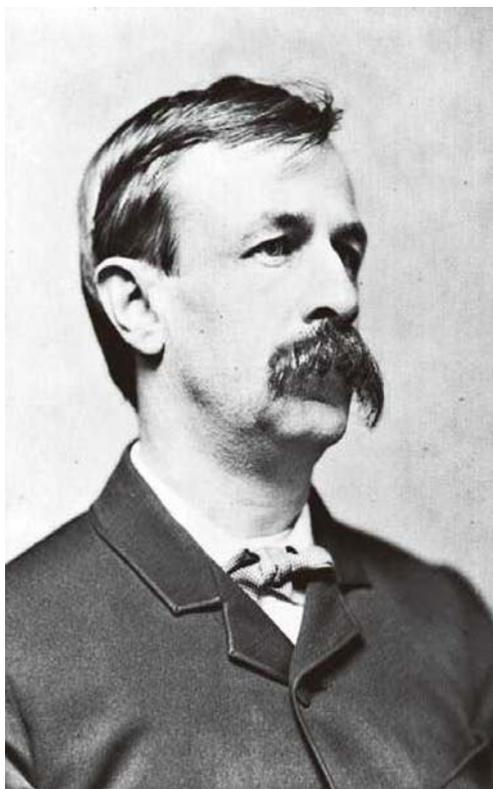
圣殿骑士团曾握有巨大的财富，与几乎所有欧洲君主都有经济往来。英国国王尤其借款无数，其中亨利三世一度将英王王冠上的宝石抵押给骑士团。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利息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放贷生息是不自然的，应该受到谴责。他说：“最为可恶的是高利借贷，人们这样讨厌它是极有道理的，它是用金钱本身来牟取暴利，而非通过金钱的自然目的来获利……利息这一词意味着以钱生钱，它是指钱的自我繁殖……这就是在所有致富方式中高利借贷何以最违背自然的原因。”

然而，商业社会的铁律就是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借贷生息。无论人们如何反对，借贷机制仍然不断发展起来。与借贷制度同时发展起来的，是票据制度。

从神庙或高利贷商人处借款，需要签署一定的凭据。期限届满时，出借方再以这一凭据要求还款。“借据”成为了票据的起源。借据可以转

01
02

01

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拍摄于1889年的肖像照。

02

贝拉米的小说《回首过去：在2000年怎么看1887年》，小说中首次使用了“credit card”（信用卡）这个词。

让。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复杂的支票、汇票和本票等见票支付凭据。其中较为有趣的，是1119年至1307年间由圣殿骑士团发明采用的骑士团票据。圣殿骑士团曾拥有巨大的财富，与几乎所有欧洲君主都有经济往来。英国国王尤其借款无数，其中亨利三世一度将英王王冠上的宝石抵押给骑士团。骑士团发明了一种和现代银行凭单相似的票据，上镶有骑士团特殊记号，持票人可以在各地的骑士团支部取款，为了防止票据被盗，它们还被编制了只有骑士团成员才能解开的一系列复杂的密码。

❖ 赊购缔造美国

票据的流行，使得人们不再携带大额的现金，而法律对有偿借贷的保护，使金融行业更为发达。尽管如此，需要催生今天意义上的信用卡，仍然需要“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

长期以来，人们并不主张负债消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名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更是被人奉为经典。即使在新大陆，人们也没有忘记清教精神。一些牧师将个人债务的有无或多少，与道德程度的高低联系起来。科顿·马瑟牧师告诫信徒们：“要以乌龟爬行的速度进入负债状态，要以雄鹰疾飞的速度摆脱债务。”

然而，在新大陆的现实情况并不如牧师们期望的那般乐观。由于经济上一时难以摆脱欧洲人的剥削，贸易逆差导致大量金银外流。许多家庭都存在负债问题，只能采取赊购的方式，以应一时之需。当时，人们可以在熟悉的店里赊账，写上自己的住址和姓名，便可以先拿一些生活用品回家应急。1个月或3个月内还清，以后就可以继续赊购。这一模式已经与今天采用信用卡“先消费后支付”的形式相似，1个月或3个月的还款期限，则相当于信用卡的免息期。商店会让熟客先赊账消费，再将账单寄到家中，约定好支付时限即可。这种签字赊购的模式维持了很长时间，即使到最

终完成工业化（20世纪20年代）后，许多普通美国人仍然难以摆脱在熟悉的面包店设置赊购账户的诱惑。他们靠着这种熟人之间的信用消费，不断生产出一代又一代的产业工人，并复制出一个又一个小镇与街区。美国历史学家在回顾西部开发和迁移时，甚至这样强调：“正是这种写在纸上的承诺方式，将美国的东部和西部联系在一起。”

❖ 贝拉米：“信用卡”的造词人

所谓的“将美国的东部和西部联系在一起”，除了维持一个又一个小镇居民生存需要的赊购账单，还需要有能确保人们走到哪里都不用携带大额现金的旅行支票。

1891年，美国运通公司推出了第一张旅行支票。这是信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持有这些旅行支票的客人，不但可以不用携带现金出门，还可以在与运通公司有财务往来的商户“先消费后结算”——这与即将出现的信用卡已经十分相似。支票的信用是其支付能力的生命线。运通公司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各大银行纷纷歇业的局面下，仍然一直承兑旅行支票，确保了支票的信用，维护了支付网络的稳定。同一时段，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他的乌托邦小说《回首过去：在2000年怎么看1887年》详细地论述了用卡支付账款的可能。这部小说中，信用卡（credit card）这个词被他一共使用了11次——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这可能是信用卡的另一种起源。

此时离信用卡的出现只差短短的几年了。这是20世纪初叶。生活水平大幅上升的美国人开始“享受生活”。一些昂贵的家用消费品大批量生产，比如缝纫机、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甚至汽车，都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并成为美国人心中美好生活的符号。然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他们尚无一次性支付全额货款的能力。于是，“分期付款”的营销方式出现了。这一制度其实历史悠久。早在1800年，为了填补国库的空虚，美国国会制定了《土地出售法令》，大量出售西部土地。

这一法令即确立了分期付款的售地制度。这使更多的农民能够购买土地，并且敢于向西部迁徙。在家庭用品领域的分期付款，大幅刺激了20世纪初的美国国内消费，并造成了市场的虚假繁荣，并成为20世纪20年代诱发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于是，信用卡的出现、邮寄（或快递）销售以及分期付款成为了共同拖拽这个世界进入消费时代的三驾马车。

1915年，一种标榜“先享受、后付款”的金属卡片出现了。不过，历史上最初发行信用卡的机构并不是银行，而是商家自身。

美国的一些百货商店、饮食业、娱乐业以及汽油公司成为推广信用卡的先锋。为招徕顾客，推销商品，扩大营业额，这些商家有选择地在一定范围内发给顾客一种类似金属徽章的信用筹码，作为客户购货消费的凭证。顾客可以在这些发行筹码的商店及其分号赊购商品，约期付款。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美国通用石油公司在1924年针对公司职员及特定客户推出的产品信用卡。这类金属卡片上有时会写着“信用卡，支付有效”（Credit Cards and Payment Efficiency）的字样——由此，这种被称为信用卡的神奇载体被正式创造出来。不过，这种卡片在此时仍然只能被颁发它的商家接受，而且由于卡片上没有客户的姓名，容易发生冒用的情况。

❖ 魅力之卡与坏账危机同样席卷全球

在这种需求下，由第三方颁发的、代为支付账款的信用卡应运而生。关于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卡的诞生经过，有多种版本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1946年，布鲁克林的银行家约翰·比金斯（John Biggins）发明了第一张银行信用卡，名为“Charg-It”。客户持卡消费后，商家会把账单寄给比金斯的银行，由银行代为支付账款。不过，这种信用卡并不支持透支功能，人们要先在比金斯的银行开设账户存入款项，才能在这一额度内进行消费。

Tips

国际上有五大信用卡品牌：VISA、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卡、大莱信用卡以及JCB信用卡。此外一些地区性的信用卡组织，如欧洲的EUROPAY、中国的银联、中国台湾地区的联合信用卡等。

真正的由银行发行并支持透支消费的信用卡，则一直到1951年才由纽约富兰克林国民银行颁发。在此之前，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张信用卡，并不是由银行制造发行的，而是由1950年建立的一个名为大莱俱乐部(Diners Club)的会员机构所开发的。

关于其由来还有个故事。据说，1949年底的一天，在纽约的梅杰小屋烤肉店里。百货业的名人艾尔弗雷德·布卢明代尔和金融家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就餐后，发现他们的钱包忘记带在身边，因而深感难堪，不得不打电话叫妻子带现金来饭店结账。麦克纳马拉产生了创建信用卡公司的想法。1950年春，麦克纳马拉与他的好友施奈德合作投资一万美元，在纽约创立了“大莱俱乐部”(Diners Club)，大莱俱乐部为会员们提供一种能够证明身份和支付能力的卡片，会员凭卡片可以记账消费。这就是大莱信用卡公司的前身。

信用卡在它最初问世的日子，常常有人聚集在收款台前看别人怎样用塑料片付账。信用卡一度被称为“魅力之卡”。接下来，信用卡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使用人群也越来越多。1952年，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首先发行银行信用卡。1959年，美国的美洲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发行了美洲银行卡。此后，许多银行加入了

发卡银行的行列。20世纪60年代，信用卡得到迅猛发展。不仅在美国，也在英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各国也盛行起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经济发展迅速之地也开始发行信用卡业务。

不过，首先推出信用卡的美国人很快发现了信用卡的局限：持卡人只能限于一定的地区使用，超出范围，信用卡就没人理会了。为解决这个问题，美洲银行率先站了出来，开始和加利福尼亚以外的一些银行签订合同，让别的银行也能准许发行美洲银行卡。

1976年，美洲银行卡改名为VISA卡。这就是VISA卡组织的由来。VISA国际组织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国际组织。可是，VISA卡组织特别霸道，只允许一部分银行加入，还有好多银行被排除在外。于是，这些银行发奋图强，建立了一个组织——MasterCard(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成为全球第二大信用卡国际组织。此后三十年，信用卡开始风靡全球。

与此同时，因滥发滥用信用卡而导致的诚信危机，也像一轮轮风暴一样，不断席卷全球，从200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情况可见一斑。2009年5月，信用卡坏账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其中，美国银行的信用卡坏账率上升到12.5%。而占据美国信用卡市场四分之一的美国运通，坏账率也从9.9%上升到了10.4%。信用卡危机一旦爆发，通常失业潮就会尾随而至。2009年5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26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即9.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在美国总额1.914万亿美元消费者债务中，约有14%将成为坏账。在欧洲，情况也不容乐观，欧洲2.467万亿美元消费者债务中，将有7%无法收回，其中大部分将发生在信用卡消费者最多的国家。曾经被视为魅力之卡的信用卡，或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信用将被重新审视，“待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无处藏身”，然而，或许这正是信用卡重新找回“信用”的开始，人的恐惧与贪念亦将在危机后重新达到新的平衡。^①

川北第一庄：丁家大院

文 | 章夫

地 处四川的刘文彩地主庄园名震海内外，距成都 200 公里开外的川北，还有一个地主庄园默默地偏安一隅，数十年来不为外人所识。

它就是赫赫有名的丁家大院。在川北仪陇县朱德故居，除了朱德旧居和朱德纪念馆这些因为朱德而引人注目的建筑外，最为有名的建筑，应该算是丁家大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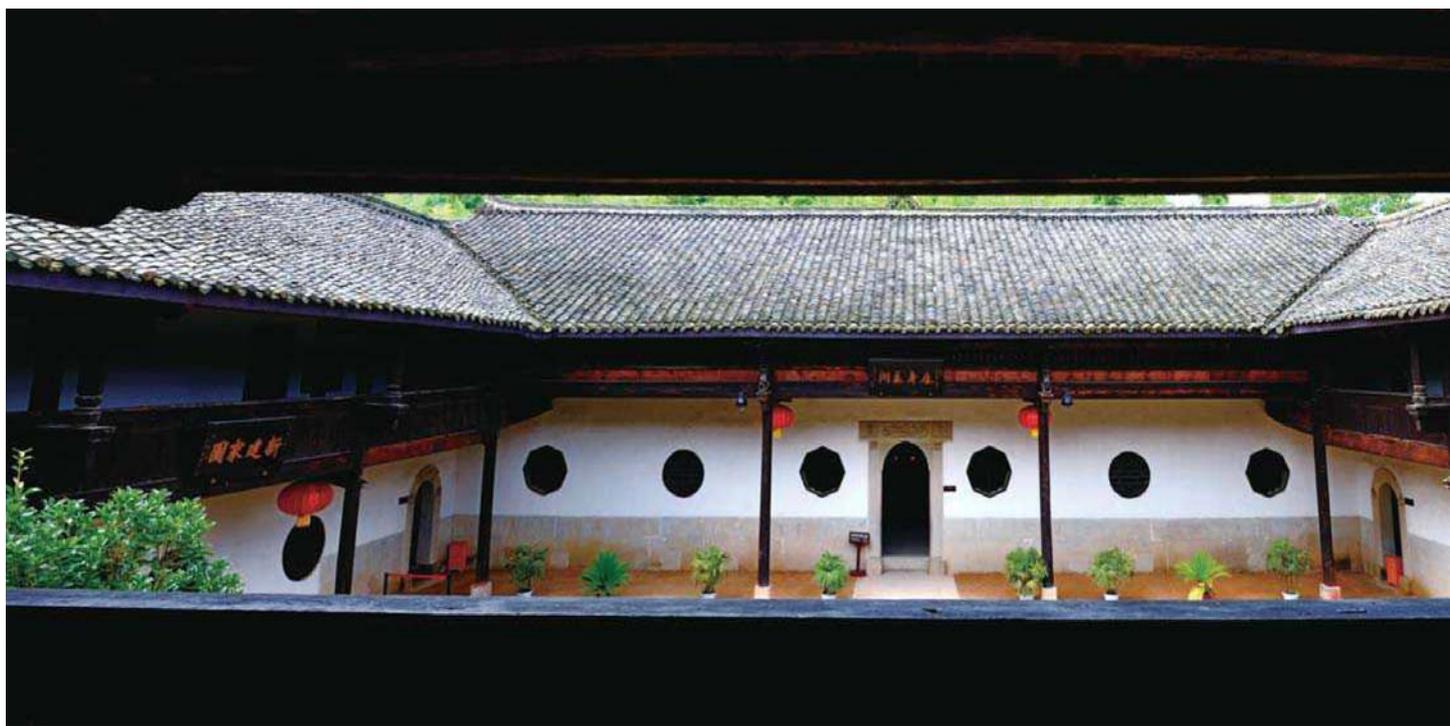
❖ 乍看朴实，实则考究

大巴山所组成的山系，把这片葱郁的土地压得喘不过气来，延绵不绝的大山在这里突然变得缓慢下来，陡峭的高山被一些起伏的深丘所替代，这里便有了一座小山——琳琅山。

四周山峦起伏，阡陌交通，一派田园风光。这样的地势也正是历代风水大师们所寻求的风水宝地，背有靠山，前有绿水，丁家大院就坐落在琳琅山间的台地之上。

从朱德旧居的大门出来，沿缓慢的坡地步行十余分钟，就是丁家大院。远远地，你只会看到

四川仪陇县的丁家大院。图 / FOTOE





据说建筑墙体时，要求工匠每天只筑一板高的墙，主人在筑好的墙上任意掏个小洞，灌上水，经过12小时以上，若滴水不漏，才算合格。



那是一个中国南方典型的四合院，上盖青瓦，土墙作围，院外大大的院坝旁，不经意间淌着一条细长的小溪。初看上去，这样的院子与川北其它院落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体量大一些罢了。但走近一看，却是四合院套四合院，越发生动起来，让人暗叹设计者的苦心——主人是有意保持低调，使这座四合院乍看上去朴实而无华。

表面看似朴实无华，如果仔细考究，却处处匠心独具。

首先说选址，背靠绵绵青山，屋前有一“护城河”相护，“护城河”的水渠长60多米，宽10多米，水深3米多。据说这是一条人工河，与修造的房屋同时完工。有了这样一条护城河，土匪要想从前面和背面攻击，无疑难上加难。

次看布局。整个庄园对外是全封闭的，只有一道大门与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大门坚固雄深，开则有气吞万象之势，闭则有锁钥万夫之强。惟有左边有道路相通，也有门出入。加之屋顶的关键部位尚有瞭望口和射击孔，可谓易守难攻，这也是古代建筑之典型特色。丁氏庄园左边小四合院以外还有一个院子，北面建有三层炮楼，炮楼四面均设有炮眼。院子的其他几面，也有高大的院墙阻挡，临路口有一道院门。常年配备守夜家丁30多人。即使土匪进入了院门，在众多枪炮的围歼下，也很难再攻破庄园的侧门进入园内。或许因为丁氏系客家人，所以安全感是他们选址和布局的首选。

这样的科学布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据传1942年，长期啸聚于仪陇和巴中交界处以彭良栋为首的100多名土匪和以屈新民为首的近百土匪，均瞄上了丁家，在琳琅山麓和轿顶山昼伏夜潜三月之久，运用各种手段多次侦探，玩尽“师刀令牌”，终因不能摸清丁家内情，而未敢轻易动手。

“庭院深深深几许”，丁氏庄园左后侧紧挨房屋修有一碉楼，因为固若金汤，万无一失，有客学专家形象地称其为“寂寞的碉楼”。

再看用料。丁氏庄园坐北向南，一楼一底，整座庄园为土木群体建筑。土木结构的民居在中

国数不胜数，而整座庄园没有一钉一铆，全靠斗拱大梁立柱，纵横交错，相互连结，完整而坚固的建筑，却不多见。丁氏庄园的木材用料均选伐自于琳琅山上的楠柏之木，内花园四周共有庭柱14根，直径均在0.5米以上，通高10米，比普通的大一倍，每根庭柱上都有木刻龙头，栩栩如生。

❖ 庄园探寻

从大院的右侧门缓缓而入，像是进了迷宫，一会儿又钻进了一个四合院，一会儿又出了四合院，且四合院楼上还有四合院。没办法，进入中间那个最大的四合院后，我便登楼居高临下，方一窥庄园之究竟。

大四合院的左右两侧，还分布有四个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均呈“日字形”，院子中间为长方形的水池，一座石桥拦腰跨过水池，桥下流水相连，桥上有屋檐遮蔽，因此不管是从院子中间看，还是从空中俯瞰，小四合院都是“日字形”，石桥和遮蔽它的屋檐充当了“日”字中间的一横。

再往细看，只见院内门庭对称，雕梁画檐，楼阁亭榭布局雅致、巧妙。穿梭其间，整个建筑中西合璧，结构巧妙，布局雅致，出人意料。

遂从大门进入，穿过用来接待普通客人的客厅，便来到最大的四合院。院内四面均为两层楼，北面高于东、南、西面。在二层楼上，外围均设有供家中女眷休憩的行廊，廊中有雕饰精美的挑梁和栏杆，宽阔的行廊可供六七人并行。这些行廊的空间感很好，随便举起相机便是一幅绝好的图画。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丁家人将这四面相通的行廊称之为“走马转角楼”，逢年过节，丁家就会请来戏班，在南面行廊上搭台唱戏，一家男女老少则聚集在北面行廊上观赏。

追求家族融和、耕读传家、诗礼育人、祈求福寿等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时大家族的建筑文化主题。丁氏庄园也不例外，随处雕刻着“喜鹊闹梅”“富贵牡丹”“鸳鸯藕荷”“百鸟朝凤”等纹饰，甚是喜庆。庄园的民俗专家介绍，挑肩梁头及坐

斗均外饰以雀替，镂空有瑞云、荷花、牡丹、仙兽、花瓶等，造型如凤凰展翅，一飞冲天。木柱两边的雀替，除装饰之外，还是分担负荷的构件，古色古香之气十足。楼阁走廊雕栏玉砌，浓妆淡抹；形式自由多样，构思奇特，圆周滑润丰满，浮雕行云流水，透雕玲珑剔透，熔书法绘画诗文为一炉，把主人的思想寄托全部融汇其中。

大小门楣的楹联都由石刻而成，中堂门上刻的是：“美德积三分皇天赐我七分福，良善作一世丹籍注尔五世”；正大门上刻着：“礼乐诗书是传家至宝，精神道德为宴尔金丹”，横批是“耕读传家”。

遗憾的是，那些石刻的楹联在“十年浩劫”遭受人为破坏，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好在多不是生僻字，所以上下文一猜便知。只可惜是那些堪称文物珍品的匾额，悉数尽毁。

❖ 庄园档案

一份小册子上如是记载着丁家大院的全部档案——

丁家大院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6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800 平方米。

系穿斗结构，内有花园、天井、炮楼，外有护城河围绕庄园，共设计有一大两小 3 个四合院，房屋 108 间，门 120 道，土墙高筑达 10 米。

与我同行兼作向导的林品强先生告诉我，无论从建筑结构还是从风水考究，无论从设计风格还是建筑艺术，丁家大院都堪称精品之作。林先生是朱德纪念馆馆长，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书法的造诣可谓了得，他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各种解析让人十分信服。

丁家大院为清末民初客家后裔所主持修建的。清光绪 32 年（公元 1906 年），富甲一方的丁邱南、丁邱毓、丁邱玉、丁邱珍四兄弟在琳琅山脚下选择了一块“吉地”，为了建造大宅院，他们从附近县市高薪聘请了技艺高超的石匠和木匠，从设计、修建到装饰，前后共花费了 18 年的时间。

金铺玉户、重轩镂槛、雕梁画栋、精品铺成、美仑美奂……院中随处可见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鬼斧神工，超凡脱俗，别具一格。从屋檐、斗拱、照壁、吻兽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造型逼真，构思奇特，匠心独具。上百年的时间过去了，铺陈在地上的石料色泽纯白、质地坚硬，而看似普通的土墙体也甚为坚固。直到在一楼看到了丁家大院历史展览，方知晓那坚固的墙体的不寻常之处：选用红色粘土，加有河沙、石灰、瓦砾、柏木条、竹木条，并辅以糯米浆、红糖水、桐油、鸡蛋清，其粘性和墙体硬度皆非普通土墙可比。据说建筑墙体时，要求工匠每天只筑一板高的墙，主人在筑好的墙上任意掏个小洞，灌上水，经过 12 小时以上，若滴水不漏，才算合格，方能往上筑第二板墙，真可谓精益求精。

楼板拼接更是如船甲板，隔音功能强，尘埃不漏。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福建的土楼，其墙体制作原理也大体如此，数百年以后，仍坚固如新。真佩服客家人的智慧。

直到 1925 年，这个民国时号称“川北第一庄”的丁家大院才全部竣工。

❖ 家族往事

如果以此为契机，把丁氏家族作为一个客家人的历史标本去审视，可以看出他们兴家立业的大体路径。对丁氏家族颇有研究的仪陇人李树衷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兹录于下：

公元 1671 年（清康熙 10 年），丁姓第九代祖母刘氏率四个儿子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移居四川重庆府合川县。公元 1724 年（清代雍正 2 年），丁姓十代祖丁尚德率丁达全等四个儿子移仪陇县新丰里（现马鞍场）轿顶山下居住。几年后，又在县南柳坝石笋河一带的李基山、凉水井置买了大片田地。1740 年（乾隆 5 年），丁氏兄弟因家口众多而分家，其他三兄弟分别居于李基山、凉水井。

而丁达全则稳居于马鞍轿顶山下，为求生存，



多个角度所拍摄的丁家大院的建筑细节展示。房柱、檩挂全用刨子刨光，光洁如洗；楼板拼接如船甲板，隔音功能强，尘埃不漏；空中俯瞰，小四合院呈“日字形”。

图 / 章夫

他率四个儿子卧薪尝胆，艰苦创业，在荆棘丛生、藤萝密布的荒山中砍出了明代遗屋三处，稍加修整，作为住房。又将屋周大片荒山进行开垦，筑田造地。将不能开垦的荒山留作放牧和林地使用。所开垦的荒地除主要用于种粮外，相当一部分土地用于栽植桑树，养蚕抽丝，产量逐年累增。

到了清朝末年，每年可缫五把丝，每把重一百两，丁达全不辞劳苦，将生丝运到顺庆府出

售，收入颇丰。与此同时，丁家利用坡地和荫蔽的土地，大量种植土著人不屑于种的苎麻，所收获的苎麻每年都要请几十人背到顺庆府销售，经济效益颇丰。

清朝末年，外无力御侮，内官僚弄权，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广袤农村，灾荒连年，饿殍遍野，打家劫舍之风愈演愈烈。

作为一方豪绅，丁家为求自保，先是联络了

当地的几户富绅组织联防，后来又瞄准了琳琅山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首先在琳琅山顶上修建起房屋 20 多间，建起了花园和室内花厅，植奇花异木，造亭台、水榭，垒石桥、假山，人称丁家花园。后又利用琳琅山坡陡山高的地形地貌，在进出琳琅山的五个山坳口构筑了五道坚固的寨门，每道寨门都有 3 至 5 支步枪把守，寨内豢养家丁 30 人众。寨门上书“琳琅寨”“安乐窝”，寨门两侧的石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天外云峰新壁垒，山巅武曲化干戈。”俨然一处世外桃源之境。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山寨虽好，终不及山下方便，久而久之，丁家 100 多口人吃的、用的都要从山下搬运。收租收佃，上下山寨都不方便，尤其是天旱年景连吃水也要从山下往山上挑，大大增加了生存成本。

一向精于算计的丁家在琳琅山的花园里住了不到三年，便开始策划在山下建一个比山寨更为坚固、安全、方便的家庭堡垒。历时数月，几易其稿，精心谋划，共同策划设计出一个四合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丁家大院。

让丁氏兄弟没能想到的是，他们请的风水先生手艺再高，算来算去，也难以算到庄园的命运如此短暂。由于当时那个时代信息传播慢，而当年的仪陇又相对偏僻与闭塞，加之千百年来一些地主劣绅的眼光短浅，他们的思维仍行进在升官发财的老路上。以为关起门来，一切都安全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

人只是匆匆过客，只有时光是不朽的。幸而丁氏兄弟为后人和客家文化做了一件功莫大焉的事情，他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财，留下了一处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丁家庄园宛若一个客家民俗博物馆。

❖ 仪陇的客家文化

丁家大院紧邻朱德故居，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曾记载自己“就出生在丁家大院



大院楼中行廊里雕刻精美的栏杆。图 / FOTOE

的仓屋里”。如今，丁家大院也作为朱德纪念馆的旅游景点之一，成为到此一游的游客所青睐的景点。只是近数十年来，因为朱德的名气，丁家大院在外人眼里籍籍无名。

这里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神奇的“轿顶山”将富贵之人簇拥在自己身边，“轿顶山”下左边出富人，右边出贵人。丁氏家族住在左边，朱德家居右，是丁家忠实的佃户。

虽然有些演绎与迷信的成分，但到这里来的各路游客都不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站在朱德旧居眺望正前方生长十分茂盛的“轿顶山”，你会不自觉地赞叹自然界的伟大，然后联系到民间的种种传说，时常有所感慨。

同朱德一样，丁家大院的主人也是客家人。

史载，康熙初年四川人口约60万，而仪陇几无人迹。“仪邑自明季之乱，几至靡有孑遗，其逃在山谷者，又值饥饉频仍，人相食，继以虎灾，道无行人，昼常扃户。”清同治版《仪陇县志》记载：“邑中湖南人最多，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谓之老户，盖寥寥无几。”可到了同治年间（公元1871年），仪陇县16.3万多人中，客家人已有2.7万。

据载，仪陇客家人是在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浪潮中，从广东韶州乳源县、翁源县一带迁移过来的，他们相互之间多有亲戚关系。明末清初，包括乳源在内的客家人原居地出现大规模自然灾害和人口膨胀现象。清廷“移民垦荒”政策的倡导，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四川。四川共有30多个县接纳了南迁的客家人，四川也因之成为客家人数占全国第五位的省份。而仪陇客家人则以乐兴乡为中心，在丁字桥、周河、马鞍、杨桥、石佛、武棚、芭蕉等29个乡镇地域上。历经400多年繁衍，如今人口达22万之众，占仪陇县总人口的20%以上。

客家人将发黄的族谱藏在身上远走他乡。作为汉民族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民系，他们是一群“文化流民”，他们打破了安土重迁的精神枷锁，他们永远“在路上”……近代启蒙思想家、晚清著

名诗人黄遵宪曾赋诗赞叹先人：“筭路桃符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一首诗把客家先民远离故土，不断漂泊刻画得入木三分。

客家人长期以来苦于战乱，已经适应了山丘地区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的他们甚至不愿意居住平原。清朝前期仪陇县境内地广人稀，对勤于劳作的客家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据朱氏家谱记载：朱德的祖先仕耀公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从韶州乳源县龙溪枫树坪入川，先在广安州龙台寺务农，于1742年迁址仪陇乐兴梁惠山居住，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再迁至该县东部的马鞍桥，靠佃种田地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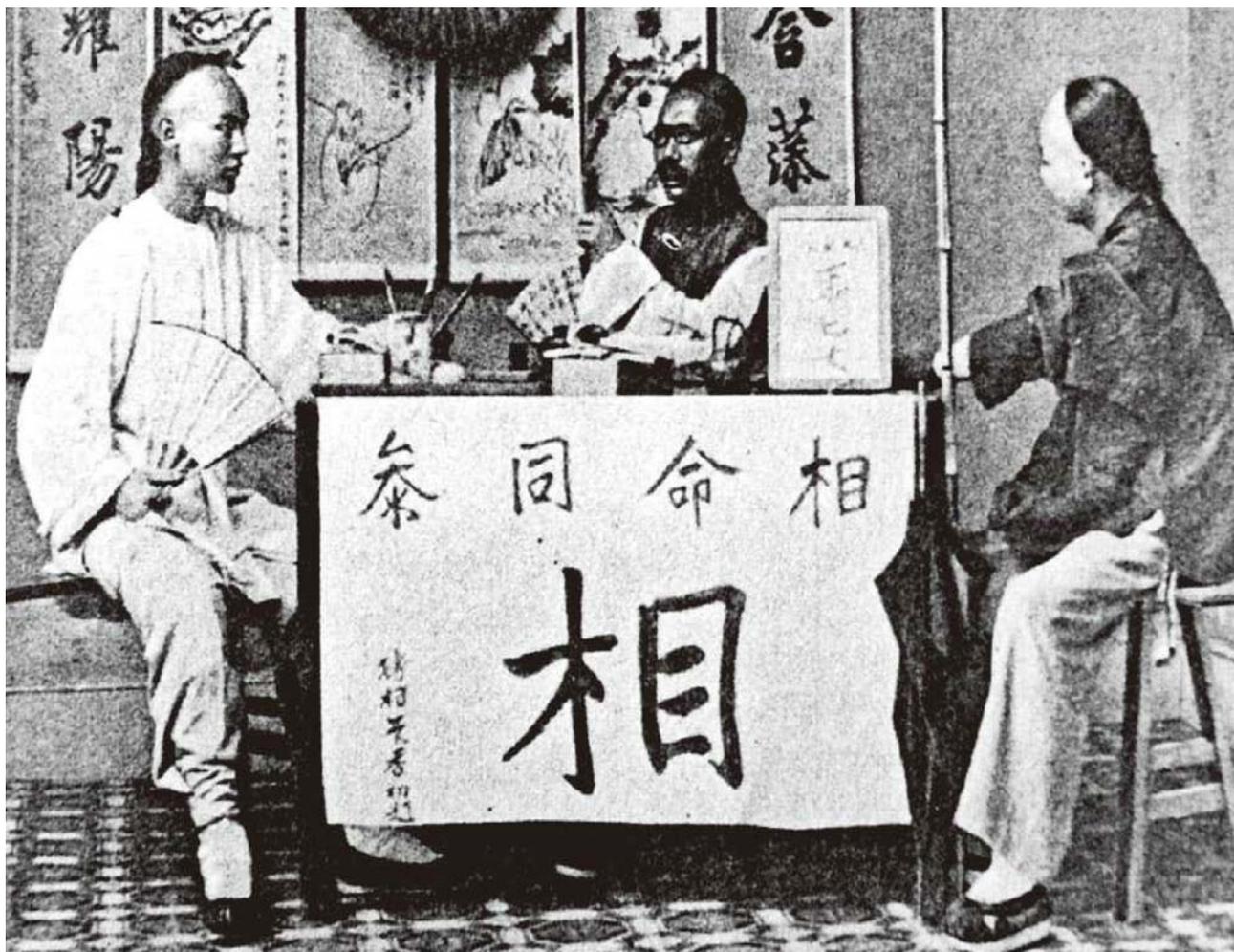
作为四川第二大客家聚居地，仪陇县至今保存着丰厚的“客家文化”。祖辈积累下来的习俗，使他们在年节风俗上保存得更为完整。如春节前的腊月，从杀猪、磨豆腐到煮腊八，继而扫扬尘、贴门神，直到除夕的祭祖、送年守岁、开门炮、开财门、抢金银水等等。到了立春时还要“接春”，元宵要“闹灯”，清明要集中“祭祖”，还必须用客家话。端午节门前必挂菖蒲陈艾、吃新麦包子。立秋要“尝新米”，七月半要再“祭祖先”，中秋要“祭月亮”，重阳称为“九月节”，要请老人吃饭……这些习俗的形成、延续，不难看出与客家人长期的颠沛流离使客家人更重亲情，也更珍惜自然界带给他们的回报。

客家的血缘是流浪的血缘，他们在经历了千年迁徙的苦痛后继续漂泊，翻山越岭，漂洋过海。美国学者亨廷顿在《种族的特性》中断言：“客人这族是中华民族精华。”西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事变，宋代金人入侵，明末满人入侵，清初太平天国影响……从1000多年前筭路蓝缕地一步步走来，客家人像种子一样洒遍这块肥沃的土地。

或许正是如此，在客家人的族群里，才诞生了像朱德一样的伟人与大家，才诞生了像丁氏庄园这样极具智慧的客家建筑精品。穿越历史，我们对人与建筑都有了更深的品鉴。^①

古代官场如何看“相貌”

文 | 李晓巧



古人言：相由心生。并且，古人还常常把人的相貌同命运挂钩，民间所谓的“算命先生”也总拿人的相貌来说事，用来“推算”人的富贵吉凶，以及命运走向。其实，古代官场也很在意为官者的相貌。

中国古代对皇帝的面相都极其称扬，所谓的

“帝王相”隆准龙颜，指的是鼻子丰隆，准头齐，鼻梁挺直，即是“龙相”。最典型的“龙相”被认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吴晗的《朱元璋传》描述，朱元璋“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高高的颧骨，却又大鼻子，大耳朵，就整个脸盘看，恰像一个横摆着的立体形的山字，脑盖上一块奇

清末，上海街头的看相先生。图 / FOTOE

骨隆起，像一个小山丘。”如此稀少怪异的面相，绝非常人所有，所以，迷信观念认为“小和尚”朱元璋当皇帝是顺理成章、上天注定的。

我国唐朝曾明确将相貌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唐中宗年间，当时的皇室权贵肆意侵占老百姓的田产，官员都惧怕权贵势力，只有雍州司田官（管理田亩的官员）陆大同敢于依据法条“尽断还之”，老百姓称赞他是好官，但是，陆大同的头上司害怕引火烧身，就想方设法把陆大同调离岗位。

然而，没过多久，陆大同又转回来任雍州司田官。雍州的“一把手”王晋为维护皇室在自己管辖区的利益极大化，也为了保住自己官位，就貌似诚恳地对陆大同说：“以你的才华和能力，绝不应该只当个雍州分管具体事务的佐官，你为何不想想办法，谋个适合你的更高的官位呢？”陆大同曰：“某无身材，但守公直，素无廊庙之望，唯以雍州判佐为好官。”（刘肃《大唐新语》）——意思是说：我陆大同没有好“身材”，只会公平正直做事，我认为雍州司田官是我最好的官职了！王长官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当时朝廷有“身言书判”的选拔官员标准，“身”就是陆大同所说的“身材”，是指包括相貌在内的长相身段，这能为升官“加分”。按照陆大同的说法，他没有好相貌好身材，所以也不指望当大官。实际上既是堵王长官的嘴，也是对当时官场用人机制的一种嘲讽。

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北宋前期的大将王德用出身行伍，善抚将士，军功显赫，在军队中的威望很高，官至宰相，当时人称呼他为“黑王相公”——他相貌奇伟，面色黑如深墨，在当时朝野是出了名的。于是，在“黑王相公”出行的路上，“以其貌异，所过间里皆聚观”，大家都争着一睹“黑王相公”，情形很轰动。当时有个政府“智囊”苏仪甫，就曾悄悄写报告给宋仁宗说王德用相貌“宅枕乾冈，貌类芝祖（宋太祖）”——意思是说，王德用的相貌非同常人，不是做大臣的相貌，是能当皇帝的面相，将来恐怕会篡权夺天下。后来，御史中丞孔道辅又拿王德用的“帝王”相说事，宋仁宗虽然有些惜才，但还是解除了王德用的兵权，让他担任地方官。王德用很识趣，



按照陆大同的说法，他没有好相貌好身材，所以也不指望当大官。实际上既是堵王长官的嘴，也是对当时官场用人机制的一种嘲讽。



于是夹着尾巴做人，处处低调，后来，又起复为宰相。王德用因相貌与众不同而得“祸”，但好在他善于“解祸”，终于逢凶化吉。

晚清、民国诸多史料记述，瞿鸿禨因为长相与同治皇帝相像而升迁很快，并登上相位。刘体智的《异辞录》记载：“止庵（瞿鸿禨）体类穆宗（同治皇帝）”。《新语林》中也记载：“瞿子玖（瞿鸿禨）貌酷肖清穆宗……孝钦后（慈禧）见之尝呜咽曰：卿与穆宗有虎贲中郎之似，余见卿如见帝，令余悲不自禁。”据说，中年丧子的慈禧见到长相同自己死去的儿子很像的瞿鸿禨，并因此而重用他。在陈瀛一的《睇向斋秘录》中直接就说：“瞿子玖协揆，与穆宗有虎贲中郎之似，为慈禧所悦。由词曹不数年入赞枢机。”

瞿鸿禨也曾笑着对人说：“予之显贵，全凭一付面具。盖孝钦以貌肖穆宗，遂不次超迁，宠极人臣。今予老而失其似，圣眷之衰，或由于此。”瞿鸿禨说这话，虽然有揶揄的成分在内，但也可见，其相貌与他的官职晋升也不无关系。

其实，在历史上，当上皇帝的人极其忌讳别人也长着“龙相”。《资治通鉴》卷182记载：“（李）渊御众宽简，人多附之。（隋炀）帝以（李）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讖，忌之。”——大臣李渊相貌奇异，不同寻常人，于是，隋炀帝就很想找个把柄除掉李渊，吓得李渊“因纵酒纳贿以自晦”，表示自己实在不是当皇帝的那块料儿。618年，李渊接受隋恭帝的“禅让”，成为历史上的唐高祖。

隋炀帝没有杀“相表奇异”的李渊，让他成了“漏网之鱼”。那么，真的把有“龙相”的人杀了，情况又是怎样？

《宋史·卷三》如此记载：“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后周世宗柴荣在历史上还算个过得去的皇帝，然而，他对于长相威严的将领也难以相容，生怕他们威胁到自家的江山，都下辣手给咔嚓掉。尽管如此，柴荣死后，他七岁的儿子坐龙椅没几天，就被赵匡胤拉下台。

历史证明，在中国古代官场，相貌有些时候帮助了某些人仕途顺畅，也使得某些人惨遭厄运，但是，人的命运绝非由相貌决定。①

唐朝人为何以胖为美

文 | 金寅斌

关于这个话题，在探讨之前，有两点需要阐明：一是这个“以胖为美”的程度；二是“以胖为美”的适用时间。

首先，唐朝人的“以胖为美”，不是今日所说的胖，而是一种富态的丰腴，体脂率大概在 25% 至 30% 之间。从唐代流传下来的名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体态丰腴，但无臃肿的感觉。

其次，“胖”并不是有唐一代始终的审美取向的。这里有一个误区，正如大多数人怀念的唐代其实也就是初唐的“贞观之治”到盛唐的“开元盛世”而已，很少有人去怀念藩镇割据的晚唐一样，以胖为美的审美取向也仅是盛唐时期才有的，其余的三个阶段（初、中、晚）基本还是以清瘦为美的。

那盛唐的人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形态是美的呢？以至于流行这样一种审美？

❖ 来自胡人的审美传统

隋唐的统治集团来自汉化了鲜卑人，也就是关陇集团，承袭北魏—西魏—北周一线。鲜卑人属于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是“五胡乱华”中的一大主力。

从东汉末年到隋再次统一中国，中国的北方和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汉人和胡人杂居状态，胡人归化汉人，与汉人胡化是很普遍的，前者主要发生在胡人的统治阶层，后者主要是贫苦百姓，但历史主流还是汉化。但是这一趋势在西魏发生地很微妙，北魏的灭亡就是胡人对汉化的反扑，所以西魏的宇文泰在建国之初，实行了胡化——对鲜卑人部落、血缘和风俗的再强化。于是，来自



于鲜卑人的唐代统治集团，在审美上自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游牧在北方大草原的胡人，在风俗和审美上与中原的汉人有很多不同，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女性以健壮为美，因为与游牧民族的生活相适应的是剽悍、健硕的体魄。

此外，虽然唐朝李氏自托是道教李耳后裔，但是佛教在唐代也是得到了极大地推崇和发展，尤其是在武则天时期，这个从龙门石窟中唐代的造窟数量和规模就可见一斑。佛教中的菩萨造像，都是丰肥而有富态，形体柔美，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互为表里，也对唐代妇女的审美意识产生了极

辽宁省博物馆展品《簪花仕女图》（局部，唐周昉）。图 / FOTOE



西魏的宇文泰在建国之初，实行了胡化——对鲜卑人部落、血缘和风俗的再强化。于是，来自于鲜卑人的唐代统治集团，在审美上自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大影响。

❖ 民以食为天

当然，紧靠国家的宣传和倡导还不行，要有物质基础。

虽然民众富足程度逊于宋代，唐朝国力强盛是毋庸置疑的。唐承隋制，但隋朝太短暂，并且隋炀帝是出了名的好大喜功，喜欢大兴土木，对百姓民生的恢复很不利。所以唐朝建立后，不得像汉代一样，减轻百姓的负担，以期国家复原。所以，才会有其后盛唐这样的局面，那时的人才能有丰富充足的物质条件。也因此，尽管此时的统治阶层提倡“以胖为美”却不至于被后世扣上瘦了天下，肥了自己的自私行为。

那么唐代的饮食是否真的有别于前代呢？虽然中国史书重政治轻社会、重英雄轻百姓，官方记载中，并没有太多对食材的记载，但还是有些只言片语透露出了变化。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饮食上的胡化。王谔在《唐语林》（卷一）中记载了唐肃宗做太子时侍膳的情形，提到肃宗用刀割羊肉，这明显是胡人的作风。相对于中原汉人的面食文化，胡人主要是吃肉、喝羊奶，都是高脂肪和高蛋白的食物。这种饮食结构上的变化，也是“以胖为美”的一个物质基础。

❖ 战乱和基因

社会风尚的鼓励和饮食的支持，的确可以让人无忧无虑地长肉，但是如果本身是长不胖的体质，这些都是无用功。所以，唐朝的“以胖为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战乱和基因。

从汉末到唐初，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战乱，人口由东汉末期的近6000万，经过汉末动乱和三国征伐，到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时人口才恢复到约3500万，到隋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才又恢复到了4500万，是“魏晋以来数百年间中国古代国家所控制的著籍人户的最高额”。但是唐经过隋炀帝的大兴土木和征伐，以及隋唐之际

的战乱，唐初人口只有1235万。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起伏是非常明显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天灾人祸，在战乱年代战争伤亡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出现屠城的现象时，但是更严重的是战乱带来的对生活和生产秩序的破坏，使百姓无法较快恢复生产，由此带来的逃难和饥荒也是不可忽视原因。

但是有研究显示，正常人甚至是较苗条的人，仅依靠水和维生素也可以存活几周时间，其中脂肪就是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就是说，在饥荒来临时，胖子有更大的存活几率，有可能会扛到下一次谷物的收获。胖的人在此时便更显出生存优势。

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影响，“近期的研究发现，个体间约40%~70%体重指数（BMI，常用于定义和评估肥胖）差异都被归因于遗传因素。”众所周知，基因是要遗传的，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那么长的战乱中，胖子基因相较于瘦子基因，更容易得到保存和流传，也就是说，在唐朝人中，胖子基因占得比例要远高于正常年代，人们更容易长胖，也更渴望长胖。

❖ 心宽体胖

然而，为什么物质丰裕程度较之唐代更高的宋代人，没有“以胖为美”的观念呢？不能说宋代没有很多胖子，但是从宋代流传下来的名仕书画中可以看出，清瘦才是主流，也没有那么奔放的服饰和形态。究其原因，宋朝时刻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风险下，百姓忧虑，充满危机意识。

“胖不胖”或许还真与心态有关，中国也有个成语——心宽体胖。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百姓在经历的数百年的动荡后，普遍安居乐业，民众心态乐观开放。

唐代人之所以会有“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或许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这也是其他朝代无法复制的原因。这里既有统治阶层独特示范作用，也有赖以产生的物质和心理条件，更有深层次的基因缘由，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审美取向。^①

波斯人眼中的中国

文 | 纳瓦依



《波斯与中国——帖木儿及其后》

俞雨森 著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定价：40.00元

本书的重点，与其说是“波斯和中国”，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波斯人（乃至伊斯兰世界）眼中的中国”。这为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

作者选取了发生在帖木儿王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五个故事，包括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中国公主”传说、帖木儿朝王子对中国玉杯的痴迷、波斯皇宫收藏中国瓷器的方式、中国的鬼怪形象进入帖木儿朝绘画的途径，以及中国佛教造型与帖木儿朝艺术的关联。这五个故事无一例外地讲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波斯人是如何认知和理解来自中国的人、事和物。他们眼中的中国虚实相生，如作者所说，“是各种情感的聚焦点——好奇、艳羡、渴慕”。这种对中国的理解也未必全然是对现实的反映，其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美化、虚化甚至误读、曲解。可以说，中国之于这一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是他者，但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发展中却从未缺席，始终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一只中国的玉杯启发了撒马尔罕的宫廷匠人，从而开创了伊斯兰世界的制玉传统。

蒙元之后至十五世纪的数百年间，波斯和中国的交流已经超越了一般人概念中的“影响”范畴，而是直接参与形塑了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波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景观。这一点乍看颇近似于十八世纪左右流行于欧洲的“中国风”，但事实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欧洲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东方文化”的认知和浪漫化，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是建立在“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有关东西方差异之上的，“东方”是作为“西方”的对

立面存在的。但是，这一现象并未出现在十四至十五世纪的东部伊斯兰世界。就《波斯和中国》一书所谈的内容看，中国在此时此地的文化景观中始终是作为对照者，而非对立者出现。这一看似细微的差别决定了对待中国的不同态度，后者将中国置于貌似典雅的空中楼阁，以把玩的姿态将其异域化，而前者则全方位地对中国文化、美学、艺术进行接受和吸收。这是否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国力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了解波斯对中国文化的接纳，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全球性”。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曾甚嚣尘上，直到今天仍以各种变异的版本方兴未艾。与之相较，中国对外的文化传播却并未被严肃地讨论，这无疑令人遗憾的。要矫正近年兴起的“言必称西域”的风气，必须正视中国美学在西出阳关的地域曾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融合，进而产生新的活力，是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波斯和中国》中讨论的“瓷厅”，是伊斯兰世界一种专门用于收藏和展示中国瓷器的建筑类型，这种形式显然从未出现在中国本地。这种建筑类型的出现，当然是源于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瓷器的珍视，同时也作为一种炫耀财富的手段成为帝王显示权力的途径。摆放瓷器的壁龛，是典型的伊斯兰式，但瓷器却来自中国。说瓷厅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不为过的。中国瓷器曾外销海外，但是在当地究竟如何使用、收藏、装饰、布置乃至展示，却鲜为人所知。至于它曾刺激并因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更是在意料之外。《瓷厅》一篇有趣地展示了文化传播可能引发的无限可能。①



《晚明大变局》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定价：58.00 元

本书是樊树志五十余年明史研究的积淀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



《父辈的抗战》

张铁柱 曹智 陶德言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52.00 元

本书中，30多位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后代，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回忆，讲述父辈抗日的亲身经历。



《源氏风物集》

[日]河添房江 著 丁国旗 丁依若 译
新星出版社
定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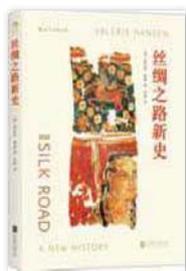
本书将《源氏物语》中角色人物日常用度和用于馈赠的奢侈品，结合人物身份及性格，做了细致的梳理。这是一部以王朝奢侈品为线索，对日本平安朝历史的精辟解读。



《汪东兴日记》

汪东兴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定价：25.00 元

汪东兴从1947年至1976年一直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工作，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本书是汪东兴对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第一次出访苏联和重上井冈山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



《丝绸之路新史》

[美]芮乐伟·韩森 著 张湛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定价：49.80 元

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颠覆了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许多认知。



《大唐贵妃》

王双怀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定价：3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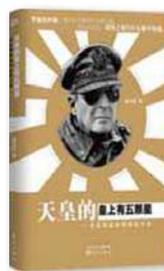
本书通过细腻、严谨的考证，讲述杨玉环传奇的一生。杨玉环为何会再嫁？她与李隆基的爱情是否出于真心的？她是否是唐朝走向衰落的“红颜祸水”？本书将讲述这些历史的疑团。



《遥远的桥》

[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中信出版社
定价：68.00 元

本书记录了二战中最勇猛却最不幸的市场花园行动。这次行动集结了当时最大资源但却失败惨痛，其中让人景仰的英雄主义和令人扼腕的悲惨败局，变成了后世的永恒记忆与教训。



《天皇的皇上有五颗星》

俞天任 著
东方出版社
定价：42.00 元

二战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当局在日本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内幕？日本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为什么靖国神社会被保留下来？本书尝试探讨和解答这些问题。

蜀道如诗

文 | 方北辰

在中华大地的西部，有一条连接蜀地和秦地的千年沧桑古道，这就是习称的“蜀道”。我曾多次在史籍文献中细细读到过它，也曾多次在现场情境中默默注视过它。不断积累起来的鉴赏感触，最后凝结成四个字——蜀道如诗。

蜀道如诗，因为这是一条古代诗人俯仰咏叹的古道。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骚人墨客从这里走过，然后又留下不知有多少的动情诗篇。单说脍炙人口的，诗仙李白的《蜀道难》，起首的“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令人心灵震撼，因此而传诵千载，那是必然的。接下来的诗坛圣手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傲视群侪，其中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四句，又把蜀道的水碧山青，与男女爱情融在一起化作永恒。陆游的七言绝句《剑门道中遇微雨》，虽然篇幅短小，但却韵味悠长，如同一盏蜀中的蒙山顶上清茶：“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蒙蒙细雨之中，蜿蜒山道之间，缓步前行的毛驴之上，略带微醺的诗人，轻轻摇动身子消失在剑门关下的远方，哎，这究竟是诗还是画呀？

蜀道如诗，因为这是一条现今依然风景如画的古道。

历经风云变幻的蜀道，现今还有“活化石”一般的遗迹留存下来。其中最美丽的一段，自然当数现今四川省北部，剑门关一带古蜀道上的精华路段——翠云廊。这里的古道，还能见到当时道路的完整结构，更令人惊讶的是，悠悠古道的两旁，全是高大挺拔的巨大柏树，树干巨大者，要几个人才能合抱，一片浓荫匝地，翠叶参天，绵延起伏，就像绿色的长城蜿蜒伸向远方。哪怕是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也会带来清新的空气和透身的凉爽。这里的景色，最适合套用弘一法师那首《送别》的歌词格式来形容：“长亭外，古道边，高树碧连天。”因为地处偏远，所以尽管风

景如画，现今知道的人并不多；也正因为地处偏远，所以这一大片极为罕见的美妙风景，才得以基本完好保存至今。“不去会后悔”的煽情语言，我认为用在这里是最恰当了。

蜀道如诗，因为这是一条体现中华先民独特文化价值的古道。

蜀道要穿越丘陵和高山两大类地带。在前一类地带上，先民采用了长距离绿化的手段，很好保护了沿途的生态环境，为来来往往的人群，提供了遮荫避雨的清凉世界。剑门蜀道至今还有古柏近 8000 株，总长约 20 公里。其中胸径 1.8 米以上，树龄在 1700 年以上的古柏，据说是蜀汉名将张飞所种，堪称时间最早、距离最长的行道绿化典范样本。在后一类地带上，先民又采用了在河谷的峭壁上打孔，然后架设悬空栈道的手段，从而使得对沿途地理环境的改变，减轻到最小的程度。这是古蜀先民坚强意志和创新精神的极致发挥，又是环境保护和天人合一理念的完美表现。

蜀道如诗，更是因为这是一条曾经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古道。

史载战国时秦惠王继位之后，开凿石牛道通往蜀国，蜀道从此诞生。公元前 316 年，秦惠王派遣大将司马错经由蜀道攻灭蜀国，这条西部中国的第一条干线国道，开始将丰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为秦王朝提供充足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战略大后方。正是在此无比雄厚的综合实力基础之上，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的横扫六合统一天下。接下来，刘邦又如法炮制，利用蜀道提供的强劲能量，从汉中打将出去，先吞关中再出中原，成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西汉王朝。到了大唐，东面的中原一出大问题，在长安的皇帝就想通过蜀道逃往富庶安乐的蜀中去避难，不然白居易如何写得出《长恨歌》？可见统一王朝心脏位于关中的汉唐盛世，蜀道堪称是给心脏提供血液的大动脉，这历史贡献可不能小觑了。

大美无言。至今依然在残阳夕照之下静默守望的蜀道，是文学之诗，风景之诗，文化之诗，更是穿越时空的一部史诗。①